

興大人文學報

Chung Hsing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第七十六期 Vol. 76

中華民國一〇五年三月

重塑香港的可能連結專輯

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興大人文學報

第七十六期

出 版 者： 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
地 址： 402 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
電 話： 886-4-22840316
傳 真： 886-4-22856117
電 子 郵 件： clalib@dragon.nchu.edu.tw
網 址： <http://www.cla.nchu.edu.tw/index.asp?url=41&cno=12>
出 版 日 期： 中 華 民 國一一五年三月(2026 年 3 月)
(原《文史學報》年刊 民國 60 年 5 月創刊 Vol. 1~31
民國 91 年 6 月改名 民國 95 年 3 月改為半年刊)

***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

GPN：2009105233

ISSN：1727－8562

興大人文學報

(原名《文史學報》年刊 第一期～三十一期)

第七十六期

重塑香港的可能連結專輯

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

中華民國一一五年三月(2026年3月)

臺灣 臺中

興大人文學報

第七十六期

發行人：吳政憲

主編：陳國偉

編輯委員：王鈺婷（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皮國立（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丘慧瑩（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林建光（國立中興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周玟慧（國立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
林淑貞（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
侯嘉星（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湯凱喻（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楊乃女（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姓氏依筆劃排序）

專輯主編：麥樂文

執行編輯：洪鈞元 康凱淋 鄭怡玲

刊名題字：陳欽忠

助理編輯：羅家昕 吳玉玲 陳誼芳 詹慧珍

助理：陳敬昌 張瑋翔 林昀萱

專輯主編的話

「香港的故事，為甚麼這麼難說？」也斯在 1995 年拋出的問題，三十年後的今天似乎有了更多「難說」的理由。或許正因如此，有志投入香港研究的學者始矢志不移，堅持說出越來越多皺摺的香港故事。近年香港議題的全球熱潮似有退卻，不過在各個領域學者的熱情投入下，台灣作為香港研究的前沿，仍然活力充沛。《興大人文學報》第 76 期以「重塑香港的可能連結」為專題，徵集各地學人對有關香港的種種知識建構進行思辯，探索連結香港的另類可能。專輯徵稿發布後獲得九篇投稿，共有四篇論文通過嚴格審查。論文作者之中有對香港議題持續關注的台灣學人，亦有到台灣和北美求學的香港青年，他們對小說、電影、以至廣義的書信體散文進行脈絡化的深入細讀，處理了社群想像、社運創傷、歷史敘述等多項議題。

在〈重塑連結的（不）可能：論韓麗珠《縫身》和《離心帶》中的越界想像〉中，黃逸朗重新詮釋了霍米·巴巴（Homi Bhabha）的理論，以韓麗珠分別出版於 2010 和 2013 年的兩部小說，思考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邊界。論者將小說放在後九七的脈絡中，指出當中呈現的香港文化身分形構不再是什麼文化混雜，而是在個人與社會規訓的拉扯中展現。論者的取徑看似抽象，不過若從今天的眼光看來，生產於「甚麼都沒有發生」的 2010 年代的兩部文本似為接下來的十年發出了預警：處身由治及興的新社會，如果死亡是過於封閉的選擇，個人如何繼續劃出邊界將是延綿不斷的防線。

從 2010 年代初跳接到後社運脈絡，余銘湘的論文對香港和台灣作家的後社運書寫進行對照並讀，展示了台港之間相互參照的可能。如果黃逸朗討論的是個人與社會的界限，余銘湘則聚焦放個人與集體的種種麻煩。在〈論臺港文學中後社運書寫的歷史記憶與創傷再現：以《樹的憂鬱》、《變成的人》為例〉中，論者將梁莉姿的《樹的憂鬱》和許恩恩《變成的人》並置，對照兩位分別經歷香港反修例運動和台灣太陽花運動的作家如何透過小說梳理自身經驗，同時應對當下生活的不同挑戰。論者嘗試以世代、創傷等角度來對照文本，並對流行於一時的「台港共同體」論述展開思辯，重新思考台港歷史經驗的對話關係。

沿着文學書寫如何梳理運動經驗的思考，陳木青的論文直面政治犯的獄中書寫。〈鐵窗內外——論《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的異質空間〉以

監獄文學的相關論述為坐標，並以米歇爾·傅柯的「異托邦」（heterotopia）的概念發想，對 2019 年陷獄的政治學者陳健民的「獄中書簡」進行探究。正如論者所指，其焦點不在評鑑文本的文學性，而是試圖捕捉陳健民如何在異質空間中博覽群書，貫穿中港台三地之間歷史經驗的閱讀弧線，透過回顧不同脈絡中改革者的行動，對未來展開想像。

最後讓我們調整一下焦距，從更遠的位置回望過去的香港糾結。陳若怡的〈歷史與根著：以編劇家邱剛健為線索重探香港電影「九七敘事」〉，翻開新近出土的手稿和筆記，重新詮釋電影《人在紐約》（台稱《三個女人的故事》）的原稿。論者不滿於電影史述的慣常定位，希望透過編劇家邱剛健留下的筆跡，審視劇本如何塑造三個女人所銘刻的歷史軌跡，其實投射出多重複雜的離散經驗，而「九七」焦慮不過是其中一道力量而已。

四篇論文各有焦點，論者各自站在不同的立場，嘗試說出一個又一個「難說」的香港故事。這些故事的共同點是若隱若現的歷史意識，在後社運、新常態的條件上，論者繼續推敲文本、個體與社會脈絡之間的可能關係，並以青壯世代的意覺對舊有的定見作深刻反思。謹此向四位充滿熱情的論文作者致意，更感謝每位審查人的精闢建議，以及學報編委會和行政助理的幫忙，讓本專輯得以完整的面貌示人。

麥樂文

興大人文學報第 76 期專題客座主編
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興大人文學報

第七十六期

目次

專輯論文：重塑香港的可能連結專輯

• 重塑連結的（不）可能：

論韓麗珠《縫身》和《離心帶》的越界想像……………黃逸朗…………… 1

• 論臺港文學中後社運書寫的歷史記憶與創傷再現：

以《樹的憂鬱》、《變成的人》為例……………余銘湘…………… 24

• 鐵窗內外——論《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

的異質空間……………陳木青…………… 54

• 歷史與根著：以編劇家邱剛健為線索重探香港電影

「九七敘事」……………陳若怡…………… 87

附錄

• 徵稿簡約

• 撰稿格式

重塑連結的（不）可能：論韓麗珠《縫身》和 《離心帶》的越界想像

黃逸朗 *

摘 要

摘要：本文借助邊界的分析框架，聚焦個人／社會的邊界，透過對讀韓麗珠的《縫身》(2010)與《離心帶》(2013)，探討後九七香港語境中個人／社會關係的變形與再協商。本文提出，《縫身》呈現先破後立的敘事走向，透過徹底拆毀邊界的顛覆性實踐，反而使邊界的意義得以重新被看見，帶出個人空間不應湮沒於社會規訓中的訊息。《離心帶》則在守護個人空間的前提下更進一步，勾勒出一條「離軌」的路徑，嘗試突破社會規訓所劃定的邊界，並將「半空」塑造成一個懸置空間，藉以重新想像個人／社會關係的安置方式。綜觀兩部作品可見，韓麗珠並不將連結理解為無差別的「貼合」，也不把越界想像簡化為對現實的單純逃離；相反，連結與越界所指向的，乃是在受限處境中重新調整關係尺度的嘗試。透過梳理兩部作品對邊界的拆解、轉向與重設，本文進一步指出，韓麗珠藉由文學形式持續思考後九七香港關係結構的斷裂、重組與未竟之處，並以此回應重塑香港連結的（不）可能。

關鍵詞：韓麗珠、邊界、越界想像、後九七香港文學

*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研究系博士生
(收稿日期：114.12.31；通過刊登日期：115.04.23)

一、緒論：邊界與越界

香港作家韓麗珠（1978-）自十四歲開始在報刊發表作品，九七回歸後出版第一本小說集《輸水管森林》（1998）。這一出版時間點也使她的寫作自一開始便與九七前後香港的歷史語境緊密相連。韓麗珠此後作品中反覆出現的空間異化、城市匱缺、失重感與邊界受壓等意象，皆可視為對主權轉移後香港感受結構的持續回應。她在2003年非典型肺炎疫潮後辭去了記者和編輯的全職工作，轉而專注寫作，並自2009年起陸續出版《灰花》（2009）、《縫身》（2010）、《離心帶》（2013）和《裸山》（2025）等多部長篇小說。就創作風格而言，韓麗珠的小說普遍帶有超現實主義色彩，擅於捕捉和描繪蒼涼與異化的景象，常把目光投向不常受到重視的城市內部空間中。個人和社會的關係，是她創作生涯中持續思考的核心命題之一。¹她的書寫往往不以正面再現事件為主要目的，而是把壓力與變動放回日常生活的層面，讓讀者從生活的紋理與身體的感受出發，辨認一種看似平靜、卻其實正在悄然改變的時局氛圍。

這種日常與變動的張力，也可放回後九七的城市經驗中理解。²回歸之後，香港的制度、經濟與城市想像被要求加速對接全球化與區域整合的節奏。在「發展」與「效率」的制度語言之下，許多轉變未必以劇烈事件的形式降臨，卻更常以細碎、綿長的方式滲入生活：空間被重新規劃，關係被重新調度，價值被重新排序。對不少人而言，困難之處不在於「發生了什麼」，而在於明明「什麼都沒有發生」，³生活卻一點一滴變得不再熟悉。正是在這種狀態裏，個人／社會之間的邊界最容易在

* 本文根據筆者的哲學碩士學位論文〈「迷霧時期」香港文學的「邊界」探索（1997-2014）：論陳冠中、黃碧雲、韓麗珠小說中的文化身分〉（2022）中部分章節改寫而成，在此非常感謝指導老師黃淑嫻教授的悉心引導。本文曾口頭發表於2023年7月14-15日韓國外國語大學世界文化創意研究所主辦的「第十三屆國際青年學者人文與文化學術會議」，感謝會議評論人高嘉勵教授的點評和建言。因應是次專輯主題，筆者增補改寫後修成定稿。感謝《興大人文學報》編委會的協助和兩位匿名審稿人的指教和指正。

¹ 董啟章形容韓麗珠的風格帶有卡夫卡（Franz Kafka, 1884-1924）的影子，對她深度探索個人／社會關係的努力和成果予以肯定。參見董啟章，〈「自然懼怕真空」——寫作的虛無和充實〉，韓麗珠：《風箏家族》（台北：聯合文學，2008年），頁5-18。

² 鑑於香港社會在雨傘運動（2014）後出現重大變化，為了更精確地把文本放回時代語境中理解，本文對「後九七」語境的討論，將集中在1997-2014年的範圍。

³ 此處借用了陳冠中小說《什麼都沒有發生》（1999）的小說標題，勾勒後九七（至雨傘運動前）語境中介乎平穩與變動之間的城市脈搏。

不知不覺間被推移：私人空間的尺度縮小，能夠說「不」的餘地變窄，而規範與要求則更容易以「理所當然」的方式進入身體、情感、判斷與生活。

在這種語境下，本文論述的邊界，並不只是清晰的分隔線。它同時是空間的距離，也是關係的尺度，是人如何把自己與外界區分開來、又如何與外界互相牽動的方式。邊界既可能用來阻隔，也可能用來保護；既可能被權力用來分類與規訓，也可能在壓力之下被重新劃定，成為仍可呼吸、仍可思考的縫隙。在邊界的理解上，本文借用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 1949-）對文化邊界的討論。巴巴提醒我們，邊界不必然只是阻隔或終結，它也可以是一種居間性的閹限（liminal）空間，使原先被分隔的事物得以互相牽動，在沒有預設框架之下生成揉雜的可能。而揉雜指向的，往往不是可預判的既定結果，而是一種走向超越的開放狀態，使不同聲音在其中碰撞，並由此帶出新的意涵。⁴循此思路，本文關心的不是邊界作為固定分隔的作用，而是邊界如何在作品中被感知、被撼動、被迫「貼合」，甚至被重新劃定；換言之，本文援引巴巴，主要並非為了抽象地討論文化混雜，而是藉此理解個人／社會之間的邊界如何從既定的分隔線，轉化為一種在壓力下不斷被重組、協商的關係空間。

若從韓麗珠創作發展的脈絡觀之，《縫身》與《離心帶》之所以值得並讀，正在於二者集中呈現了她對個人／社會關係的思考，如何由早期的防衛姿態逐步轉向更複雜的邊界想像。韓麗珠早期小說中的人物，往往透過退回衣櫥、木櫥、牆壁等隱身空間，在個人與社會之間築起一道帶有防衛意味的邊界；及至首部長篇小說《灰花》，這道邊界已不再只是封閉自守的屏障，而開始顯露出流動性，指向個人與社會重新互動的可能。到了《縫身》與《離心帶》，韓麗珠則進一步追問：當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被迫「貼合」，或被「導回正軌」的要求所規訓時，原本用以區分二者的邊界將如何受到衝擊，而個人又如何在受限處境中安置自身，並調整與社會之間的距離。選擇這兩部作品作為討論對象，不僅有助於說明韓麗珠如何延展對個人／社會關係的思考，亦更能具體呈現後九七香港語境中，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邊界如何在規訓壓力之下被重新感知、撼動與協商。

近年有關後九七香港文學的研究，已從不同角度揭示主權移交後香港小說的感受結構與主體處境。有論者從「非常態」與「不完整個體」切入，指出後九七小說常

⁴ 參見 Homi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4), pp.1-18.

藉由異化、殘缺或失衡的身體，折射主體性受損與社會規訓加劇的處境；⁵也有研究從「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的世代脈絡出發，強調韓麗珠等作家如何在城市快速重組與生活感受持續變動之中，書寫屬於後九七香港的經驗。⁶就與本文討論較為接近的研究而言，則有論者從後九七城市書寫與「我城」想像的角度，理解韓麗珠作品中的「消失」命題；⁷亦有研究以《縫身》為中心，從身體與空間書寫、規訓與反抗等面向切入。⁸這些討論為理解韓麗珠小說中的個人／社會關係提供了重要參照。在此基礎上，本文進一步透過《縫身》與《離心帶》的對讀，從個人／社會邊界的拆解、重設與越界想像出發，追蹤韓麗珠對後九七香港關係結構的持續思考，並說明越界想像並非單純的逃離，而是對個人／社會關係尺度的重新調整與再協商。

在《縫身》和《離心帶》中，韓麗珠顯然有意在此前的基礎上作出突破。⁹兩部作品都以個人／社會之間的拉扯為起點，卻不滿足於只呈現壓迫或困局，而是藉由拆解、轉向與重設邊界的越界想像，深化對後九七處境的思考。《縫身》把「貼合」推至極端：在被要求全面縫合的世界裏，個人空間如何逐步式微，又如何仍試圖以裂縫保留一絲獨立性；《離心帶》則把「在軌」的要求推到身體層面：當不協調被命名為病，「離軌」的欲望如何被壓抑、被矯正，又如何在掙扎中轉化為通往半空的想像。若說前者在縫合的壓力下反覆呈現裂縫如何生成與被重置，後者便在「離軌」的推進中追問，離開地面秩序之後，是否仍可能另闢一種安置方式，使越界不只意味著撤離，也同時指向重新配置關係的可能。

由此可見，本文探討的越界，並非單純的逃離，也不是對現實的浪漫化否定。它更接近一種在受限處境中重新調整位置與關係的嘗試。當既有的連結形式逐步收

⁵ 參見黃冠翔，〈「不完整個體」的隱喻：香港後九七與「非常態」敘事〉，《文化研究季刊》第177期（2022年4月），頁1-22。

⁶ 參見鄒文律，〈「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小說中的城市與自然〉，《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第28期（2020年9月），頁519-551。

⁷ 參見劉淑貞，〈「消失」作為一種方法：九七回歸後的「我城」書寫——以韓麗珠的寫作為討論對象〉，《東海中文學報》第43期（2022年6月），頁75-113。

⁸ 可參見符燕鴻，〈無法自控的身體——韓麗珠《縫身》初探〉，《名作欣賞》第14期（2015年5月），頁49-50；梁淑雯，〈無法「把身體放下」：香港女作家韓麗珠小說中的身體書寫〉，《文藝爭鳴》第2期（2018年2月），頁7-13。

⁹ 在創作初期，韓麗珠便展現出對城市中的個人空間的高度重視，在個人與社會之間築起了一道防衛性的邊界。如在《輸水管森林》（1998）和《寧靜的獸》（2004）的早期短篇小說中，每當人物在社會中遇到困難，顯得無所適從時，他們均可退回屬於個人的邊界內，藏匿在形形色色的隱身地點中。及至其首部長篇小說《灰花》（2009），當小說人物面對社會加諸的壓力時，他們不再滿足於消極的隱匿，開始尋求與社會對話和協商的可能。

緊，越界想像便成為重新思考「如何相處」的契機，在文學層面回應重塑香港連結的（不）可能。本文所說的「連結」，並不同於和諧共融或重新縫合的「理想」狀態，而是指個人與社會之間各種關係如何被安排、被要求、並在日常裏被感受的方式。它既包括親密關係與工作生活等層面的互相牽動，也涉及城市空間與公共秩序如何進入個體的情感與判斷，迫使人們調整自身的位置。因而，「重塑連結」在本文中更接近一種關係尺度的重新協商，在不斷收緊的規訓之下，仍試圖保留差異、距離與可呼吸的縫隙，使相處得以以另一種形式延續。下文的討論將先從《縫身》談起，觀察作品如何透過展現縫合與拆毀之間的張力，凸顯個人空間備受壓迫的困境，並在破壞之後重新提出邊界的必要；繼而轉向《離心帶》，分析「離軌」的路徑如何開展，半空又如何成為自創邊界的可能場域；最後總結兩部作品對邊界的拆解、轉向與重設，回應後九七香港文化身分的複雜面向，並進一步思考：在「什麼都沒有發生」的表象之下，文學如何捕捉連結的斷裂與再造，使出路的想像得以被保留、被拖長，並在未竟之處慢慢顯影。

二、縫合與裂縫：邊界的拆除和重設

《縫身》採用雙線並行的敘事結構：奇數章節為女主人公「我」的故事，偶數章節則由「我」的論文穿插而成。女主人公是即將畢業的大學生，生活在一個實行縫身政策的城市。按照城市法例，人們在達到法定年齡後必須接受縫身手術，與另一人的身體連接起來，成為連生人。「我」的故事以倒敘方式開展，開首交代縫身後的生活狀況，繼而回溯「我」從獨身人轉變為連生人的過程。與此同時，論文段落則像一面鏡子，以研究式的語言把故事中難以直說的壓力與矛盾折射得更清楚。兩條線索互為表裏，使縫身不只是情節設定，更成為一個需要被不斷辨認、反覆追問的命題。

「縫」在小說中具有雙重指向，既是縫合，也指裂縫。縫合固然構成作品最醒目的表層主題，縫身一詞本身便指向身體上的縫合與連接；然而，隨著故事推展，讀者便會慢慢發現，裂縫才更接近作者真正關注之處。縫身手術一旦完成，個人／社會的邊界便被制度性地拆除。連生人仍保有個人的意識與感受，卻已不再是完全獨立自主的個體。「我」不再只是「我」，被迫以「我們」的形式存在。「我們」介乎個人與社會之間，由兩個個人組建成一個「小社會」，使個人與社會的邊界變得

含混不清。小說正是在這種含混之中逐步揭示縫合背後的危機，並透過對各種裂縫的呈現，嘗試重設個人與社會之間仍不可或缺的邊界。

小說開篇首先勾勒縫身政策的「理想」藍圖。概言之，政策以「雙贏」作為主要說辭，強調個人與社會可以彼此成就，旨在打造一種和諧共融的個人—社會共同體。這樣的語言之所以奏效，正在於它把縫合包裝為一種自然、合理、甚至值得嚮往的生活方式，使「必須縫合」不以粗暴的命令出現，而以改良式的承諾滲入到民間日常之中。因此，縫身不只是對身體的處置，更像是一套重新安排關係與秩序的規範，透過看似溫和的方式把個人推向集體所期待的軌道。然而，通過記敘「我」在手術後的經歷，縫身政策的真正代價慢慢浮現。個人／社會邊界的拆除並未導向雙贏，反而讓兩者的關係徹底失衡，個人空間面臨完全消失在社會規訓之中的危機。縫身後，「我」不再是此前的「我」，而成為了「我們」的一部分。「我們」意味著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邊界消失，如論者所指出，個人不再是最小的社會單位。¹⁰成為連生人後，「我」雖仍能保持個人的思想，卻身陷一個以共同名義運作的小社會之中，並受制於另一個個人「樂」的制約。

小說在此並不急於把「樂」寫成單純的惡人，而是慢慢呈現這種溫柔的暴力。當「我們」被當作理想形式，社會規訓便能更順理成章地進入最隱密的私人領域。譬如手術後初期，當「我們」站在交通燈前，對目的地方向出現分歧時，「我」與「樂」均遵照《連生人生活指南》中「凡事忍耐，凡事謙讓，爭吵是禍端」¹¹的規條，不願說出真正的想法，爭相成為服從者。這一場景之所以關鍵，在於它揭示出，原本多被理解為公共領域的社會規訓，已悄無聲息地滲透至私人空間之內。正如論者所言，在縫身法例的掩護下，社會規訓的管轄權力大幅提升，擴展到城市中每一個微細角落。¹²「我」與「樂」在不知不覺間成為了規訓的共謀者，互相制約彼此的生活和行為，在壓縮對方個人空間的同時，自己亦失去了個人自由，最終發展成個人與個人的雙輪局面。由此，拆除邊界的後果變得具體，不再停留在理念之爭，而是關乎生活如何被重新安排，甚至連說出真心話的權力都在「和諧」的名義下逐漸萎縮。

¹⁰ 參見符燕鴻，〈無法自控的身體——韓麗珠《縫身》初探〉，《名作欣賞》第14期（2015年5月），頁49。

¹¹ 韓麗珠，《縫身》（台北：聯合文學，2010年），頁166。此後引用只註頁碼。

¹² 參見梁淑雯，〈無法「把身體放下」：香港女作家韓麗珠小說中的身體書寫〉，《文藝爭鳴》第2期（2018年2月），頁12。

需要注意的是，「我們」之中亦存在性別問題。韓麗珠有意藉由對主人公女性身分的強調，更為深刻地揭示個人空間徹底失陷的危機。¹³在小說中，「我」和「樂」雖然各佔「我們」的一半，但關係並不平衡，主導者的角色由始至終都更靠近男性的「樂」。微妙之處在於，這種失衡未必以赤裸的命令或暴力呈現，而往往披上「為你好」、「為我們好」的溫柔外衣，使規訓得以在親密關係之中更順暢地運作，甚至讓退讓看起來像是愛的證明。例如在完成縫身後，身為治療師的「樂」一直勸導「我」放下論文寫作，全心投入助護工作。他在觀察到另一對連生人出現不協調的狀態後對「我」說道：「他們的矛盾，源於各自待在原來的崗位上，而不是處理相同的工作」（168），彷彿以理性分析提出藥方，實際上卻預設了「協調」必須以其中一方的讓步來完成，而這一方更自然地指向女性。所謂「處理相同的工作」，在這裏不只是工作安排的建議，更像是一種把差異磨平的倫理要求：為了避免衝突，為了維持「我們」的和諧，個人（女性）便應主動收起自己的追求。正是在這種話術之下，規訓不再只是源於公共領域的壓力，更以照料與關心的名義進入私人生活，使「我」難以直接說不，因為拒絕「協調」似乎同時意味著拒絕關係本身。

更甚的是，「我」甚至無法按照自己的喜好選擇聆聽的音樂。「樂」以一句「只是無病呻吟而已」（178）全盤否定了「我」所熱愛的地下樂隊，並為「我」開列出一份度身訂造的音樂清單。這種安排表面上像是體貼的「照顧」，實際上卻把感受與品味也納入矯正的範圍。當「我」被要求聆聽什麼、避免聆聽什麼時，「我」所失去的已不只是選擇權，而是那個能在日常縫隙中短暫退回自身、保持獨處的空間。周蕾曾指出，隨身聽時代開啟了一場「聆聽革命」，人們得以在隱密的個人空間中不受干預地享受音樂、自我陶醉乃至短暫「消失」於現實世界。¹⁴然而在小說世界裏，連這種看似微不足道的自由也變得遙不可及。親密關係被改寫成規訓的管道，愛被用作磨平差異的理由，最終讓個人（尤其是女性）的自主空間在「和諧」與「共處」的名義下被逐漸消耗殆盡。

¹³ 韓麗珠在一次訪談中透露，她在書寫《風箏家族》（2008）時開始深入思考女性身分的問題：「寫的時候，想的愈來愈多。以前不會思考女性身份的問題，只覺得人就是人。但這次寫的時候，卻想很多女性身份的事，多了一份自覺，人們對你有期望，你又會因應期望，作出不少選擇。隨著這種身份，又帶給別人另一些東西。因此小說中大部分角色都是家庭的女人。你不難發現，男人都是被敘述者。」李卓賢，〈韓麗珠放一隻風箏剖一個如果〉，《文匯報》，「讀書」版，2008年6月9日。

¹⁴ 參見 Rey Chow, *Writing Diaspora: Tactics of Intervention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162–163.

《縫身》揭示拆除個人／社會邊界所引發的危機後，並未止於絕望，而是透過裂縫的呈現嘗試重設邊界。在小說中，最關鍵的一道裂縫正是「我」的論文。它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為它提供了反對的立場，而是在於它以另一種語言與節奏，讓「我」得以從「我們」的生活裏暫時抽身。換言之，論文的力量不在於宣告式的抗爭，而在於它把注意力、時間與思考重新放回到「我」身上，使「我」仍能在壓力之下保留一個可以命名、可以整理、也可以暫時不配合的角落。當縫身要求的是全面「貼合」，論文卻反過來維持一種必要的距離：它把「我」與「我們」拉開一點點空隙，使個人／社會的邊界不至於在日常協調與互相忍讓中被悄悄抹平。因此，論文不只是一種思想活動，更成為私人空間的具體形態，讓裂縫得以被持續擴寫，並在看似無法撼動的規訓秩序中，重新顯影邊界的必要。

值得注意的是，論文在《縫身》中不僅作為主人公保存私人空間的媒介，也構成了小說重要的反身性裝置。韓麗珠並未單純讓「我」在縫合秩序之中承受壓力，而是安排「我」一邊身處制度之內，一邊透過論文的形式分析、整理並命名縫身的歷史與心理結構。正因如此，論文不只是情節中的書寫物，也改變了小說的閱讀方式：它使《縫身》不僅敘述規訓如何在個體之中運作，也在形式上展示個體如何於規訓之內仍試圖保存一個可供思考與辨認自身的位置。若說裂縫在情節層面維繫了「我」與「我們」之間尚未被完全抹平的距離，那麼論文則在形式層面進一步使小說本身成為辨認、整理並回應規訓的一種方式。

在縫身手術之前，「我」撰寫了〈論文大綱一〉與〈論文大綱二〉，可視為對抗的第一階段。〈論文大綱〉在結構上形成參差對照的效果：一方面，它以研究者的語氣試圖把「縫身」納入可被分析的脈絡；另一方面，它也在不斷的整理與命名中，凸顯個人與社會之間不平衡的權力結構，讓讀者看見社會規訓如何隨時擁有把個人裁定為正常／異常的權力。¹⁵在研究過程中，「我」終究未能完全抵禦來自社會與親朋的壓力，仍與「樂」進行了縫身手術。然而，「我」始終堅持把論文完成，並在手術後繼續撰寫〈個案研究一〉與〈個案研究二〉，構成對抗的第二階段。此時，論文不單只是個人／社會之間的邊界，也成為了「我」與「樂」之間的重要邊界。它從全面「貼合」的要求中切出一道縫隙，讓「我」得以保留不被立刻協調、不被立即

¹⁵ 參見符燕鴻，〈論韓麗珠《縫身》的空間書寫〉，《廣州廣播電視大學學報》第3期（2015年6月），頁85。

消化的部分。正如韓麗珠所言，論文是在主人公能力範圍內較有力的抵抗方式。¹⁶這也提示我們，裂縫不必等同於轟烈的行動，它往往以更持久、更柔韌的方式存在，在被要求放下、被要求配合之時，仍把某些事情留待自己去完成。

然而，論文的寫作並非一帆風順。在強大的社會輿論影響下，「我」多次陷入迷惘，處於搖擺狀態。「我」並非天性堅定，而是反覆經歷自我懷疑，甚至看到妥協如何逐步成為一條看似省力的路。小說的細緻之處，在於它不把抵抗浪漫化，而是把抵抗放在疲憊、孤立與質疑的現實之中，使堅持看起來更像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猶豫後砥礪前行的成果。支撐「我」重新站穩立場的重要因素，是「我」在研究過程中遇到的幾位同樣位處社會主流以外的人物。他們以各自方式守護個人／社會的邊界，為「我」帶來啟示與力量。其中，「我」的論文指導老師腿子教授在體制內努力創造可以容納個人空間的縫隙；親戚紫薇姑母則嘗試在體制外凝聚抗拒屈服的力量。兩人在城市中心與邊陲遙相呼應，共同發出以裂縫對抗縫合的異質聲音。透過這些人物，小說把抵抗寫成一種可被傳遞的經驗。當個體難以單獨承受壓力時，邊緣位置之間的互相照應，便可能成為裂縫得以延續的條件。在這些啟發下，「我」最終徹底堅定信念，決心不惜代價與「樂」分割。值得注意的是，小說把分割寫成一個與縫合對峙的詞彙，當縫合要求全面「貼合」，分割便爭取把個人空間重新拉回可呼吸的距離。分割在此不只是身體層面的分離，更是對規訓語言的一次拒絕，拒絕把個人的差異視為需要被修正的偏差，也拒絕讓「我們」成為一種遮蔽個人聲音的集體名義。

然而，小說並未把分割寫成一條不必付出代價的出路。相反，它更進一步揭示，在縫合秩序已深植於身體與日常的情況下，分割的完成往往必須與毀壞甚至死亡一同承擔。這一點其實早已在「我」論文中的〈個案研究〉埋下伏筆。在那些案例裏，分割固然意味著對自由與獨立的追求，卻同時伴隨極高風險，甚至以生命作為代價。正因如此，故事後段才將這一代價推至極端：「我」在愈來愈清楚意識到自己正被規訓同化之際，最終選擇以服毒的方式完成與「樂」的分割。

隨著縫身時間日久，即使「我」盡力維持對抗意志，卻仍開始出現被社會規訓同化的跡象。這種同化之所以可怕，在於它未必以劇烈痛楚的形式出現，卻以更隱蔽的方式改寫一個人的感受與判斷，使人逐步失去辨認自身處境的能力。小說便以

¹⁶ 參見韓麗珠，〈生命中不能缺失的寫作〉，《讀書好》第42期（2011年3月），頁10。

一個極其微妙、卻令人震動的瞬間，寫出「我」如何在不自覺間轉用規訓的語言。當「我」聆聽紫薇姑母的痛史時，竟忍不住問道：「你為什麼不安於本份，任由自我不受控制地分裂？」（200）這句話之所以令人震動，正在於它幾乎完全站在縫合秩序的立場發問。它把「安於本份」視為理所當然的要求，又把個人對分割與獨立的追求命名為「自我不受控制地分裂」。更值得注意的是，「我」在話一出口後便立刻察覺其中的「質詢」意味，並因此感到驚訝。這說明規訓並不只是從外部施加壓力，而是已經滲入「我」的語言與判斷之中，使「我」在尚未真正作出選擇之前，便已經先替秩序說了話。這一刻的可怕，不在於「我」已徹底改變立場，而在於「我」開始在無意識下以主流的尺度衡量他人，也同時衡量自己。如此這般，抵抗不再只是外在對抗，更變成了一場在自我之中拉扯的內耗。

在這樣的處境下，「我」雖在肉身上仍然活著，卻彷彿一步步走向靈魂的耗損，早已踏進死亡的邊界之內。正是在此，小說安排「我」以死亡作為最激烈的越界方式，留下無法被抹除的裂縫。需要謹慎指出的是，小說並非將死亡浪漫化為輕易的解答，而是把它放在一個壓迫性的結構之中，讓讀者看見，當所有可行的裂縫逐步被縫合，甚至連個人意念都開始替秩序效力時，死亡如何被寫成一種徹底拒絕同化的極限姿態。與其說它是消極的逃避，不如說它是對全面縫合秩序的終極否定，藉由最極端的方式重置個人／社會的邊界，傳達出作者在牢固規訓下仍要守護個人空間的堅定意志。

韓麗珠在一次訪談中指出，縫身的指涉是開放多元的，可以涵蓋任何社會強加於個人的規範。¹⁷若放回後九七的語境，這種強加規範可視為對社會在缺乏足夠諮詢下過於急速發展的批判。在成名作〈輸水管森林〉（1996）中，韓麗珠已流露出對城市急劇變遷的焦慮。九七回歸後，政府進一步加緊現代化改革的步伐，務求在全球化時代鞏固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但急速發展亦衍生樓價飆升、自然空間喪失、社區關係斷裂等城市內部問題。這些問題不只關乎資源分配，更關乎人如何在城市裏安置自己，以及如何在變動之中維持彼此之間可供依靠的關係。進入後九七時期，連同韓麗珠在內，有危機意識的香港人縱然親身體會到急速發展引致的各種問題，卻往往感到無力改變現狀。在缺乏具效率與透明度的諮詢制度下，個人的異議聲音難以有效進入社會發展藍圖與規訓的視域，久而久之在民間形成一種強烈的

¹⁷ 何翹楚，〈一點點縫起的小說——訪《縫身》作者韓麗珠〉，《明報》，「讀書」版，2011年1月16日。

無力感。更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無力感並不只表現為對制度的失望或對現狀的無從介入，更會逐步沉澱為一種日常感受結構：人們明知有所失落，卻未必能有效說出拒絕，甚至往往在尚未意識到之前，便已學會以「配合整體」的語言要求自己與他人。

從這個角度理解，《縫身》所呈現的，正是後九七香港在表面追求協調與發展的語境下，個人空間與差異如何被一步步壓縮，並最終滲入身體、情感與判斷之中的文化心理。正是在這樣的脈絡中，《縫身》提醒讀者，所謂縫合未必能保證帶來更好的共同生活，反而可能以「為了整體」之名吞沒個人空間與差異；但即使城市中的個人空間在社會規訓的制約下持續收窄，我們仍不可主動放棄抵抗的權利，應在可行範圍內致力重設個人／社會的邊界，讓逐漸縫合的世界裏仍然保留各式各樣的裂縫，使人與人之間仍有重新調整、互相照應的可能。

總括而言，《縫身》把個人／社會邊界被拆除的危機推至極端，在全面「貼合」的世界中反覆探索裂縫如何生成、如何被守護，乃至如何以最激烈的方式留下痕跡。這些裂縫不必然帶來可預判的「勝利」，卻使邊界的必要性重新顯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縫身》所叩問的，並不只是裂縫如何留下，更是邊界何以仍然必要。從巴巴的觀點看，邊界本可被理解為一種具有轉化潛能的闕限空間，使原先被分隔的事物在碰撞中生成新的意義。然而，《縫身》所呈現的並不是這種具有開放性的臨界場域，而是邊界在制度命令下被強制拆除、個人與社會被迫無縫「貼合」的極端情境。正因如此，小說才更尖銳地道出：一旦個人與社會之間再無可供退避、喘息與協商的距離，所謂「和諧」便會迅速轉化為規訓的同義詞。換言之，《縫身》並非單純否定邊界，而是在邊界被徹底抹除之後，反過來凸顯其作為個人得以保存獨立性之必要條件。所謂共同體並非必然建立在無差別的「貼合」之上，真正可持續的相處，反而需要保留差異與喘息的空間，使人與人之間仍有著重新調整關係的可能。如是者，裂縫不只是拒絕或破壞，更像是在縫合的秩序裏努力保留下來的縫隙，讓個人仍能在壓力之中與他人互相照應，不致被完全吞沒。接下來轉入《離心帶》時，問題將不再只停留於邊界如何被拆毀和重設，而是進一步追問：在守護個人空間的基礎上，文學的越界想像能否另闢蹊徑，嘗試為「離軌」的個人在社會中另覓安身之所。

三、「離軌」的欲望：邊界的突破與自創

《離心帶》以一種無法預防、亦無法根治的病徵「飄蕩症」為軸心展開。患者一旦發作，身體會失去控制而向上飄升，若未被及時發現並拉回地面，便可能愈飄愈遠，終至消失無蹤。小說以患者「鳥」的故事為主線，她在與情人「白」同居期間病發，其後被轉介予「賣氣球的男人」照料，同時配合主管「尋找失去的人計畫」的「執法者」，追尋飄蕩後失蹤的母親「了」的下落。在治療與調查的過程中，「鳥」對飄蕩的理解逐步改變，並在故事尾聲抵達目的地——半空。如果說《縫身》把個人空間的消失推向極端，那麼《離心帶》處理的，則是另一種更難以安放的感受，不是單純被迫「貼合」，而是感到自己始終不在其位，彷彿無論怎樣調整，也無法順利嵌回社會所要求的軌道。這種「離軌」的欲望，一方面關乎個體對既定秩序的不適，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後九七日常生活中那種持續的淤塞與無力感。《離心帶》試圖追問，當個體已無法再以回復「正常」作為出路，越界想像能否開闢另一條路徑，把原本用來規訓人的邊界推開，甚至另行自創。

韓麗珠自言，創作《離心帶》之際，生命正處於一個淤塞的時期，逐漸意識到自己無法符合社會對「成功的大人」的各項標準，遂衍生出「脫軌」的欲望。¹⁸她其後又發現，這種欲望並非單屬個人，而是一種普遍存在於社會的現象。¹⁹這段創作自述之所以值得放入本文脈絡，不在於用作者意圖替文本定調，而在於它讓我們更容易理解《離心帶》如何把「不合規格」的感受具象化為身體狀態：飄蕩是一種無法消除的內在傾向，反映個人／社會之間長期處於不協調的張力之中。當城市的「正軌」被反覆宣稱為唯一可行的方向，「離軌」的欲望便不只是任性或逃避，而是一種在無力感中仍試圖尋找出口的衝動。因此，飄蕩在小說中並非單純的奇觀設定，而是把個人／社會關係中的壓迫與失衡轉化成可感知的身體經驗，人並非「想離開」才離開，而是在某些條件下被推向失重。飄升既像本能的釋放，也像壓抑過久後的副／反作用，使「離軌」成為一種既被動又主動的混合狀態。

¹⁸ 參見鄧小樺，〈過渡時期的辯證——韓麗珠談《離心帶》〉，《自由時報》，「藝文」版，2013年8月5日。

¹⁹ 參見孫梓評、韓麗珠，〈詩小說對話錄——孫梓評 vs. 韓麗珠〉，《印刻文學生活誌》第115期（2013年3月），頁29-30。

然而，飄蕩雖常以不由自主的方式發生，在社會主流視角中卻仍被定位為疾病，甚至被視為需要被處置的「一股反抗的力量」。²⁰飄蕩者因此被貼上「患者」的標籤，必須接受看管與治療。小說由此建立出兩個看似清晰的分類：「飄蕩症」患者與「健全者」。前者被視為「脫軌」，需要被醫治並導回「正軌」；後者則是「在軌」的，並擁有協助與引導患者的權力。²¹但《離心帶》的關鍵不在於把患者與健全者對立起來，而旨在指出，這道界線本身就是一種社會規訓的邊界。當飄蕩被定義為疾病，社會便取得一種把人裁定為正常／異常的權力，並以「照料」之名擴展管轄的範圍。於是，飄蕩不是被理解為一種可被聆聽的感受，而被重新編排成可被管理的問題。而所謂「正軌」，也不再只是一套「正常」的生活方式，而是背後有著權力支撐的制度語言。

儘管患者與「健全者」在角色設定上看似黑白分明，兩者之間的邊界卻並非涇渭分明。《離心帶》反覆讓「在軌」者產生動搖，甚至流露出與飄蕩者相通的內在傾向，使讀者看見，受困於規訓邊界的，不只是被驅逐到邊緣的患者，也包括那些站在秩序中心、負責看管與引導的人。以「賣氣球的男人」為例，他與社會福利部合作，因病患人數過多而不斷接收轉介個案，扮演看守者與照護者的角色。然而與患者「鳥」相遇後，他的立場逐漸鬆動。他開始承認自己其實無法為患者提供確切指引，甚至以「瞎子」的比喻指向自己與「鳥」的共通處境：兩人都在摸索，所謂「引導」在此不再堅固，反而暴露出制度階級的空洞和脆弱。在故事後段，「賣氣球的男人」照鏡時看見自己與「鳥」的重象，更把這種互相照見推到可視可感的層次：所謂「健全者」與患者的差異，或許只在於一方尚能把本能壓回體內，另一方則不由自主地把它釋放出來。

「執法者」的動搖同樣值得注意。他作為「尋找失去的人計畫」的主管，負責跟進因飄蕩而失蹤的個案，任務在於把失蹤者帶回地面秩序之中。然而小說並未讓他牢牢地站在「在軌」的位置上。相反，讀者常常透過「鳥」的觀察，看見他身體裏那種難以名狀的緊繃。例如在資料室與卷宗之間，他總下意識地把拳頭握緊放在口袋裏，像是在把某種衝動壓住不讓它浮上來；又例如他在聆聽「鳥」的母親「了」的筆記本內容時，表面上仍維持著公事公辦的姿態，但其沉默與停頓卻洩露出一種被牽

²⁰ 韓麗珠，《離心帶》（新北：INK 印刻文學，2013 年），頁 25。此後引用只註頁碼。

²¹ 參見鄒文律，〈論韓麗珠《離心帶》的疾病書寫〉，《文學論衡》第 26 期（2015 年 6 月），頁 72-81。

動的遲疑。這些細節把「健全」寫成一種需要長期維持的姿態。「執法者」之所以能被稱為「在軌」，正因為他必須不斷壓抑那股隨時可能把自己帶離地面的力量。在此，患者與「健全者」之間的差異不再是本質之分，更像是壓抑程度與社會標籤的差別。邊界在此不只劃分群體，也滲入身體，成為人人均需要面對的內在拉扯。

在這種困局下，小說讓人物作出大破大立的嘗試，不再尋求重返「正軌」，而是跳出整個社會軌道的框架，透過「離軌」的越界想像，嘗試突破社會規訓所制定的邊界。然而，「離軌」並非立刻抵達自由，它更像把限制從地面秩序挪到另一個位置。人物不再被必須「在軌」的要求擠壓，卻仍要面對另一套條件與代價。正因如此，「離軌」在《離心帶》中沒有被寫成輕盈的解放，而是一種更為複雜的轉向：它拒絕被矯正，卻也承認出路往往帶著負擔，以及不穩定性。亦言之，「離軌」並不是把邊界一筆抹去，而是把邊界轉移到另一種形態之中。從前，邊界以「飄蕩是一種病」的命名運作，把人推回「正軌」；在「離軌」之後，邊界則轉化為「如何安置自己」的問題。離開了地面的秩序，並不同於立刻擁有可供棲身的新天地；相反，人物反而要在失去既定的座標之後，重新摸索一種能暫時安置自身的方式。

這種邊界形態的轉向，亦在小說的敘事結構安排上進一步推展。《離心帶》同樣採用雙文本並置：文本一為全知敘事者的第三人稱敘事，文本二則為「了」在筆記本上的第一人稱書寫。筆記本的篇幅雖只佔全書一小部分，卻有著引路的功能。它不只是補完情節的附件，亦是一條隱伏的思路，一方面把飄蕩從「病」的社會語言中挪開，讓它不必立刻回到需要被矯正的框架；另一方面也在字裏行間為「離軌」提供了另一種理解的可能，使飄蕩得以被視作出路的方向，而不只是需要被處置的偏差。更重要的是，筆記本本身也像一道可以行走的邊界。它既是「了」的私人書寫，為她保留一個仍能自行命名、整理與追問的空間（與《縫身》中的論文書寫遙相呼應）；同時它又不是完全封閉的自言自語，而是可以被轉交、被朗讀、被聆聽的文字。正因如此，它既能把某些東西暫時從制度的分類與診斷中抽離出來，又能在特定的時刻穿透制度的流程，把飄蕩者的經驗帶到他人面前，甚至牽動那些原本站在「在軌」位置上的人。換言之，筆記本讓「離軌」不只是屬於個體身體的事情，也成為一種可以被理解、被感染、被傳遞的經驗形式，讓越界想像獲得延伸的可能。

若與《縫身》的論文相比，《離心帶》中的筆記本並不以分析制度為主要功能，而更接近對失重經驗的保存與承接。它未必能整理出一套清晰的知識結構，卻使原本難以安置、難以穩定命名的感受得以留下痕跡。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筆記本在

《離心帶》中同樣具有反身性。它不僅是情節中的書寫媒介，也成為小說保存越界經驗、使其得以被辨認的重要形式。若說《縫身》的論文偏向於在規訓內部建立分析空間，《離心帶》的筆記本則更像是在失重之中保留尚未成形的出路想像。

筆記本的四個部分由閱讀筆記、瑪雅斯族見聞、夢境書寫與離家出走後的記錄構成。前兩部分的語調相對克制，像是以客觀的方式陳述資訊與觀察。但這種克制並非完全的中立，而是一種慢慢積累的位移，在不直言情緒的語氣中，飄蕩逐步被賦予另一種價值。進入第三、四部分後，筆記本的語調明顯轉變，從平穩漸趨激昂，到後段甚至直抒胸臆，流露出對飄蕩的強烈憧憬。筆記本中那句「沒有另一個人，另一種目光，無論失重或飄蕩，都是無傷大雅的事」（178），正是邊界轉向的關鍵。它把飄蕩與「目光」扣連在一起，意味著飄蕩不只是一種身體現象，更關乎在規訓視線之下如何生活。所謂「離軌」，首先不是往外逃，而是把自己從那套不斷評估、矯正與命名的目光中挪開，先把感受與判斷的主導權收回來，把邊界轉向到「如何安置自己」的問題。因此，「了」的抉擇並非單純是「不想再回正軌」，而是清楚意識到回「正軌」所要求的代價（長期壓抑自身傾向）已不可承受。她不再讓自己在日間「在軌」、夜間「脫軌」的反覆中拖延選擇，決心徹底向「離軌」傾斜：不再以回復「正常」作為目標，而以越界想像嘗試突破社會規訓所制定的邊界。

如果說筆記本呈現的是「了」如何一步步走向「離軌」的邊界，那麼它在情節中的另一重意義，是成為女兒「鳥」面對飄蕩的轉捩點。「鳥」起初對飄蕩的態度是恐懼與抗拒的。首次病發時，她發出低啞的呼救聲，並迅速學習以繩索、鐵網等方式把身體固定住，甚至讓情人「白」在夜間連人帶網壓在她身上，以防飄走。這些防守性的做法看似理性，卻把關係推向內耗：鐵網令彼此傷痕累累，也暗示「愛」在此被改寫成互相牽制的工具。防守因此並非純粹的保護，而是一種以傷害維持「在軌」的代價。²²其後，「鳥」從「執法者」手中得到「了」在失蹤前遺下的筆記本，並在配合調查的要求下朗讀其中內容。朗讀的過程使「鳥」逐步理解母親的思考與選擇，並產生了強烈的共鳴。²³饒有意味的是，這份共鳴並非只發生在母女之間，在「鳥」朗讀時，「執法者」也被迫聆聽到「了」的聲音，立場也隨之動搖。筆記本因此像一道穿透制度邊界的裂縫，它讓「疾病」的敘事不再只由權力機關講述，而能夠由飄蕩者自己敘述，並藉此感染他人。讀完整本筆記本後，「鳥」向「賣氣球的

²² 參見溫煒鈺，〈香港作家韓麗珠小說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碩士論文，2015年），頁73。

²³ 參見鍾夢婷，〈抵達·軌跡以外〉，《明報》，「讀書」版，2013年7月21日。

男人」提出請求：「把我也放進天空裡去吧。」（188）這句話標誌著她的決定性轉向，飄蕩不再只是必須壓制的病徵，而成為了她願意承擔的抉擇。換言之，「離軌」在此不再是被動形態，而是一種被重新奪回的權利，一種把自我從規訓秩序中抽離、重新安置的方式。

「離軌」後的目的地是甚麼？小說多番暗示飄蕩的終點為死亡，這使《離心帶》延續《縫身》中以生死辯證回應規訓的筆法：當「活著」被規訓為長期壓抑與自我耗損，死亡便可能被重新理解為拒絕同化的決斷姿態。然而《離心帶》最關鍵的轉折，是「鳥」並未把目的地設定為徹底消失，而是停留在半空。半空成為一個特殊的閹限位置，介乎地面秩序與天空終點（死亡）之間，使出路不必等同於終結，而指向另一種仍可延伸的方向。半空提供了一個仍未被既定秩序完全佔領的間隙，讓邊界得以被挪動、被試探，甚至被重新劃定。越界想像也因此不只停留於拒絕或撤離，而開始指向另一種重新安置的可能。半空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為它遠離地面，而是因為它具象地呈現出「出路」想像的拉扯與矛盾：一方面，必須與地面秩序保持距離，否則「離軌」終將被拉回「治療」與回復「正常」的邊界內；另一方面，又必須保留某種可供安置的條件，否則便只剩餘徹底的斷裂與消失。半空因此可被理解為一種自創邊界的實踐，它拒絕被收編，卻也不是就此把一切關係一刀兩斷，而是致力在不穩定的狀態之中試探「仍能如何相處」。

若放回更廣闊的香港文學脈絡中觀察，《離心帶》與西西（1937–2022）的名篇〈浮城誌異〉（1986）似乎形成了一種跨時代的遙相呼應。西西筆下的「浮城」帶著一種隨著八十年代時代張力而生的獨有的無力感，城市雖浮在半空，卻缺乏飛翔的能力，映照著走在回歸路上的香港人在「九七政治」底下無法決定自身命運的無奈處境；韓麗珠則在《離心帶》中藉由半空的想像對「浮城」的經典意象作出創造性轉化，使半空不再只是迷惘和困局的象徵，也可能成為尚未完全成形的出路想像。²⁴然而，小說同時沒有把半空的「浮城」勾勒成煥然一新的新家園。當敘事者形容「鳥」抵達半空後感到前所未有的困乏，閉上眼打算好好睡一覺時，這座新建的「浮城」便帶上疲乏與停頓的色調。這樣的收束不是單純的悲觀，而更像一種刻意的停留。半空的「浮城」在此既像一束微光，也像一個暫時的停靠處。它讓人看見不必回到

²⁴ 關於兩部作品之間的潛在連繫，可參見拙文的討論。見黃逸朗，〈跨越「浮城」邊界的跨時代回應：論西西〈浮城誌異〉（1986）和韓麗珠《離心帶》（2013）〉，《文學論衡》第45期（2025年9月），頁90–102。

地面的希望，卻沒有立刻把前路交代清楚，也沒有把新生活的樣貌描繪得穩妥可握。如此這般，半空的「浮城」既保留了珍貴的想像空間，同時也把不確定性一併留了下來。正是在這種停留與未竟之中，《離心帶》把越界想像推到更尖銳的位置：「離軌」確實使人看見另行自創的可能，但可能並不等於可行，它也許只能被保留在半空的懸置空間之中，被拖長、被延宕，直至浮現輪廓。

若放回後九七的語境來看，這種半空中的懸置狀態，所折射的並不只是個體的失重經驗，更是一種屬於香港的文化心理：當舊有位置已難以安頓自身，而新的秩序又尚未真正提供可供棲身的形式時，個人只能在未竟、延宕與不確定之中拖長出路的輪廓。《離心帶》之所以重要，正因它沒有把這種懸置簡化為純然的絕望，而是在失重之中保留了調整位置與關係的微弱可能。由是觀之，《離心帶》所開啟的，已不只是對既有邊界的防守，而是對另一種邊界形態的想像。相較於《縫身》在邊界被拆除後重新確認其必要，《離心帶》更進一步把越界推向一種生成性的方向。小說中的「半空」既不屬於既有地面秩序，也尚未凝固為另一套穩定規範，而更接近巴巴所說的闕限空間：它不是單純的撤離或逃逸，而是一個尚未定型、仍可安排位置與關係的中介場域。換言之，《離心帶》的越界想像不只是離開社會規訓所劃定的軌道，而是試圖在既有秩序之外，開闢一種協商關係尺度的新可能。若說《縫身》在縫合秩序中反向凸顯邊界之必要，《離心帶》則進一步指出，邊界並非只能被守護；在越界之後，它也可以成為抵抗既有秩序、重組個人／社會關係的臨界條件。

四、結論：重塑連結的（不）可能

綜合本文所論，《縫身》和《離心帶》共同呈現出一種位處城市邊緣的文化身分。這種身分並非僅指向社會的邊陲位置，而是指向一種與主流秩序保持距離的姿態，它在被迫「貼合」與被迫「在軌」之間，拒絕把自我完全交還給既定的價值安排，並以越界想像向其發起挑戰。在《縫身》中，面對強行加諸的縫身法例，主人公「我」沒有如大部分人般隨波逐流，被社會規訓輕易收編，而是在有限的縫隙中嘗試抵抗。「我」以撰寫論文為方法，在個人空間逐漸式微的連生世界中保留一絲獨立性，並以思考與書寫捍衛個人／社會之間愈趨模糊的邊界。及至《離心帶》，小說角色所面對的壓力不再是直接通過法例推動的「貼合」，而是透過更軟性的「疾

病」治療，把不協調的感受與「離軌」的欲望納入醫療與管理的範疇。飄蕩者母女「鳥」與「了」在長久掙扎後，決心擺脫病患標籤，以「離軌」作為方法，嘗試突破社會規訓的牢固邊界。兩部作品因此在不同層面上揭示，所謂邊緣，不必然只是被忽視的非主流位置，反而往往隱含著在壓力之下仍不肯完全被同化的抵抗能量。

至於這種抵抗能量能否轉化為重塑個人／社會連結的契機，兩部作品均刻意保留可供延伸思考的空間，拒絕為複雜的問題提供簡單答案。其中，死亡與出路的張力是重要的一環。在《縫身》中，「我」在完成論文後選擇以自殺的方式徹底從連生世界中解脫；《離心帶》雖沒有明確交代「了」等「離軌」者的最終結局，敘事卻屢次把飄蕩的終點與死亡相扣連。在兩個故事中，死亡無疑均被賦予積極的意義，指向一種不向同化屈服的決斷姿態；但死亡同時具有封閉性，它無法直接提供可延展的生活藍圖，也無法在拒絕之後立刻帶來建設性的新秩序。正因如此，死亡的作用更接近一種極限語言：當個體差異被視為需要修正的偏差，當規訓以共同體之名把人推向全面「貼合」或全面「在軌」，所謂連結便不再是互相照應，而更像吞沒與收編。在這樣的理解下，死亡並非浪漫化的答案，而是把「不可再被如此連結」說到最絕對的方式。它不提供路徑，卻清楚畫出阻礙路徑的結構形狀，使「不可能」不再只是抽象的悲觀，而是一種被揭露出來的規訓現實。正是在此，《離心帶》安排「鳥」最終沒有走向死亡，而是選擇在半空自創「浮城」，才格外關鍵。半空既與死亡相近，同樣指向對地面秩序的拒絕，卻又不等同於終結。它暫時擱置了「答案必須落地」的前提，使重塑連結成為一種在不確定中持續調整關係尺度的實踐。

回顧本文的脈絡，重塑香港連結的（不）可能，正是在裂縫、死亡與半空之間被更清楚地照亮。本文並非將《縫身》與《離心帶》視為兩部彼此孤立的作品，而是透過對讀，追蹤韓麗珠如何沿著個人／社會邊界的拆解、重設與越界想像，持續思考後九七香港關係結構的變形與再協商。一方面，兩部作品都拒絕把連結理解為無差別的「貼合」，也拒絕把共同體的想像建立在抹平差異之上。若說《縫身》透過全面「貼合」的極端設定，反向凸顯邊界作為保存個人空間之必要，《離心帶》則進一步將越界推向生成性的方向，使邊界不再只是防守的條件，也可能成為重新安置個人與社會關係的中介場域。就此而言，本文所嘗試補充的，不僅是兩部作品各自的主題意涵，更是它們如何共同構成一條持續展開的問題鏈，照見韓麗珠如何以文學形式回應後九七香港連結的斷裂、轉向與未竟之處，並由此映現城市文化身分在出路未明的處境中如何被反覆協商與重新想像；另一方面，作品也以其極端的實驗與

懸置的叩問提醒我們，在後九七的隱性社會壓力之下，邊緣性的能量固然能撐開縫隙、揭示問題、發出異聲，卻未必能自然轉化為清晰可循的前路。裂縫與「離軌」所提供的，是不被收編的姿態與重新安置的方向感；至於如何把這種方向感推進為可延展的生活形式，如何把邊緣位置之間的互相照應化為更持久的關係實踐，仍是一道尚待完成的課題。死亡把秩序推到極限，半空把拒絕延宕下去。而重塑連結的（不）可能，正是在這種「極限」與「懸置」之間被照亮，成為我們必須持續思考的命題。

參考書目（按作者或編者筆劃和字母排序）：

- 何翹楚，〈一點點縫起的小說——訪《縫身》作者韓麗珠〉，《明報》，「讀書」版，2011年1月16日。
- He, Qiaochu. "A Novel Sewn Together Bit by Bit: An Interview with Hon Lai-chu, Author of *Body-sewing*." "Ming Pao, dushu (reading)" section, 16 January, 2011.
- 孫梓評、韓麗珠，〈詩小說對話錄——孫梓評 vs. 韓麗珠〉，《印刻文學生活誌》第115期（2013年3月），頁24-44。
- Sun, Ziping, and Hon Lai-chu. "A Dialogue between Poem and Fiction: Sun Ziping vs. Hon Lai-chu." *INK Literary Monthly* 115 (March 2013): pp. 24-44.
- 梁淑雯，〈無法「把身體放下」：香港女作家韓麗珠小說中的身體書寫〉，《文藝爭鳴》第2期（2018年2月），頁7-13。
- Leung, Shuk-man. "Unable to 'Put Down the Body': Body Writing in the Fiction of Hong Kong Female Writer Hon Lai-chu." *wenyi zhengming (Literary and Artistic Contention)* 2 (February 2018): pp. 7-13.
- 符燕鴻，〈無法自控的身體——韓麗珠《縫身》初探〉，《名作欣賞》第14期（2015年5月），頁49-50。
- Fu, Yanhong. "The Uncontrollable Body: A Preliminary Study of Hon Lai-chu's *Body-sewing*." *Masterpieces Review* 14 (May 2015): pp. 49-50.
- 符燕鴻，〈論韓麗珠《縫身》的空間書寫〉，《廣州廣播電視大學學報》第3期（2015年6月），頁82-86。
- Fu, Yanhong. "On Spatial Writing in Hon Lai-chu's *Body-sewing*." *Journal of Guangz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University* 3 (June 2015): pp. 82-86.
- 溫煒瓚，〈香港作家韓麗珠小說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碩士論文，2015年。
- Wen, Wei-ling. "Studies on Hong Kong Novelist Li-Zhu Han (Hon Lai-chu)"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Taoyuan, 2015.

黃冠翔，〈「不完美個體」的隱喻：香港後九七與「非常態」敘事〉，《文化研究季刊》第 177 期（2022 年 4 月），頁 1–22。

Huang, Kuan-hsiang. “The Metaphor of the ‘Incomplete Individual’: Narrative of ‘Abnormality’ in Hong Kong Novels After 1997” *Cultural Studies Quarterly* 177 (April 2022): pp. 1–22.

黃逸朗，〈跨越「浮城」邊界的跨時代回應：論西西〈浮城誌異〉（1986）和韓麗珠《離心帶》（2013）〉，《文學論衡》第 45 期（2025 年 9 月），頁 90–102。

Wong, Yat-long. “A Cross-Generational Response Towards the Transcending Boundaries of the ‘Floating City’: On Xixi’s ‘Marvels of a Floating City’ (1986) and Hon Lai-chu’s *The Body of Centrifugation* (2013).”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ry Studies* 45 (September 2025): pp. 90–102.

董啟章，〈「自然懼怕真空」——寫作的虛無和充實〉，韓麗珠：《風箏家族》（台北：聯合文學，2008 年），頁 5–18。

Dung, Kai-cheung. “‘Nature Abhors a Vacuum’: The Emptiness and Fullness of Writing.” In Hon Lai-chu, *The Kite Family*, 5–18. Taipei: Unitas Publishing, 2008.

鄒文律，〈「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小說中的城市與自然〉，《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第 28 期（2020 年 9 月），頁 519–551。

Chau, Man-lut. “‘Nature Relatedness’ in Fiction of ‘Post-1997 Hong Kong Young Writers’”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28 (September 2020): pp. 519–551.

鄒文律，〈論韓麗珠《離心帶》的疾病書寫〉，《文學論衡》第 26 期（2015 年 6 月），頁 72–81。

Chau, Man-lut. “On Illness Writing in Hon Lai-chu’s *The Body of Centrifugation*.”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ry Studies* 26 (June 2015): pp. 72–81.

劉淑貞，〈「消失」作為一種方法：九七回歸後的「我城」書寫——以韓麗珠的寫作為討論對象〉，《東海中文學報》第 43 期（2022 年 6 月），頁 75–113。

Liu, Shu-Jhen. "Using 'Disappearance' as a Method": I-City Writing after Handover of Hong Kong via a Study of Hon Lai Chu's Works" *Tunghai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43 (June 2022): pp. 75–113.

鄧小樺，〈過渡時期的辯證——韓麗珠談《離心帶》〉，《自由時報》，「藝文」版，2013 年 8 月 5 日。

Tang, Siu-wa. "Dialectics in a Transitional Period: Hon Lai-chu Discusses *The Body of Centrifugation*." *Liberty Times*, "yiwen (Arts and Literature)" section, August 5, 2013.

鍾夢婷，〈抵達·軌跡以外〉，《明報》，「讀書」版，2013 年 7 月 21 日。

Chung, Mung-ting. "Arrival: Beyond the Trajectory." *Ming Pao*, "Reading" section, July 21, 2013.

韓麗珠，〈生命中不能缺失的寫作〉，《讀書好》第 42 期（2011 年 3 月），頁 9–11。

Hon, Lai-chu. "The Writing that Cannot be Missing from Life." *Books4You* 42 (March 2011): pp. 9–11.

韓麗珠，《縫身》（台北：聯合文學，2010 年）。

Hon, Lai-chu. *Body-sewing*. Taipei: Unitas Publishing, 2010.

韓麗珠，《離心帶》（新北：INK 印刻文學，2013 年）。

Hon, Lai-chu. *The Body of Centrifugation*. New Taipei: INK Literary Monthly Publishing, 2013.

Chow, Rey. *Writing Diaspora: Tactics of Intervention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62–163.

The (Im)possibility of Rebuilding Linkages: Boundary-crossing Imagination of Hon Lai-chu's *Body-sewing* and *The Border of Centrifugation*

Jason Yat Long WONG *

Abstract

Abstract: Drawing on the concept of boundary a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personal and the social through a comparative reading of Hon Lai-chu's *Body-sewing* (2010) and *The Border of Centrifugation* (2013), examining the deformation and renegotiation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personal and the social in post-1997 Hong Kong. It argues that *Body-sewing* follows a narrative trajectory of de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through the subversive practice of thoroughly dismantling boundaries, the novel paradoxically renders their significance newly visible, underscoring the need to prevent personal space from being absorbed into social discipline. *The Border of Centrifugation*, while continuing this concern with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al space, moves a step further by sketching a path of “derailment” that seeks to break through the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imposed by society. By shaping “mid-air” as a suspended space, the novel reimagines how relations between the personal and the social might be repositioned. Read together, the two novels show that Hon neither understands linkage as undifferentiated fusion nor reduces boundary-crossing imagination to a simple escape from reality. Rather, linkage and boundary-crossing point to an attempt to recalibrate relational scales under constrained conditions. By tracing how boundaries are dismantled, redirected, and re-established across the two works, this article further argues that Hon persistently reflects, through literary form, on the fractures, reconfigurations, and unresolved dimensions of relational structures in post-1997 Hong Kong, thereby responding to the (im)possibility of rebuilding Hong Kong's linkages.

Keywords: Hon Lai-chu; boundary; boundary-crossing imagination; post-1997 Hong Kong literature

*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論臺港文學中後社運書寫的歷史記憶與創傷再現： 以《樹的憂鬱》、《變成的人》為例^{*}

余銘湘^{**}

摘 要

2014年太陽花學運與2019年反送中運動，是近年來臺灣與香港兩地社會運動的重要轉捩點，不僅激發了年輕世代的政治意識，也深刻影響文學的創作趨勢。當社會運動結束以後，許多書寫轉向運動「之後」的生命經驗，聚焦於創傷記憶、流亡遷徙、世代斷裂與身份重構等主題，逐步形塑出「後社運書寫」的敘事風貌，尤其是在運動過後，「回顧」與「想像未來」之外，「當下」作為敘述維度漸為重要，但在現有研究中尚少被充分探討。

對此，本文即以梁莉姿的《樹的憂鬱》與許恩恩的《變成的人》為主要文本，進行討論，探討兩地文學如何在「後社運」語境中重構個人與集體的關係，進而展現時代精神與文化書寫的多重面貌，以及如何通過時間策略、語言斷裂與敘述形式，重構運動「之後」的創傷經驗、世代記憶與身份認同；同時，兩部作品同樣思考於：當運動結束，理想破碎，個體將如何重新定位自身？而文學，又如何承接這些未竟的情感與歷史？故之，本文旨在揭示文學如何作為一種倫理書寫的實踐，進而展現書寫內部的創傷再現、世代之間的記憶，以及臺港之間政治與文化連結的想像，從而開展出一條更具批判性與跨地域視野的「後社運文學」路徑。

關鍵詞：臺港文學、後社運書寫、歷史記憶、創傷再現、臺港共同體

^{*} 論文初稿曾於「台港研究新視野暨《八方文藝叢刊》學術研討會」上宣讀，承蒙主持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院長須文蔚教授、評論人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鍾秩維教授提供相關意見，後經兩位匿名審查人之細心閱讀並慷慨給予修改意見，特此致謝。

^{**} 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收稿日期：114.08.29；通過刊登日期：114.10.31)

一、前言

2014年臺灣的太陽花運動與2019年香港的反送中運動，作為廿一世紀臺港地區具代表性的兩場社會運動，不僅改變了地方政治格局，也深刻影響了文學、文化與身分認同的表達。這兩場運動雖在地理上隔海相望，卻在語言、文化與歷史中緊密纏繞，使得「臺港關係」與「社運書寫」成為近年來重要的書寫議題。運動退場之後，運動參與者與旁觀者同樣面臨心理創傷、價值幻滅與現實調適的難題。隨著現實逐步收緊、社會氛圍轉變，許多創作者開始轉向內在精神層面的探問與紀錄，書寫那些無法即刻言說的殘留記憶、未竟哀悼與潛伏痛楚，誠如沐羽《煙街》、¹蘇朗欣《觀火》、²林子玄《傷兵不在街頭》³等。這些作品不同於直接再現抗爭場面的文學，而是更為隱微、碎裂、反覆的創傷書寫，呈現出後社會運動時代的精神面貌。

2014年太陽花運動反對《兩岸服務貿易協議》（CSSTA）程序不透明的抗爭，不僅成功阻擋立法院草案通過，也喚醒臺灣年輕世代參與公共事務與制度監督的意識。美國學者吳冠昇指出，太陽花運動之所以能夠達成政策上的實質影響，一大關鍵在於運動期間公共輿論的迅速累積與民意轉變，這使得部分政治菁英不得不與運動力量結盟，以回應社會壓力。⁴同時，何明修和林宗弘曾撰文探討太陽花運動如何作為香港「兩傘運動」的先驅或鏡像之一，其策略、動員型態與佔領公眾空間的方式，在香港的社會運動中被借鑑與適應。⁵這些承繼與傳播，使得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青年與社會運動者，在動員機制、行動結構與社群媒體運用上，顯著吸收了來自臺灣的實踐經驗。例如，運動者傾向使用佔領與集會形式、在公共空間建立領導與溝通機制、抗爭中的象徵與視覺文化，以及強調政策透明性與回應性。雖然兩地政治制度與法律結構不同，但太陽花運動提供了一套可以被模仿與適應的框架，這一框架幫助香港反送中運動更快速動員、擴散訴

¹ 沐羽，《煙街》（台北：木馬文化，2022）。

² 蘇朗欣，《觀火》（台北：木馬文化，2024）。

³ 林子玄、陳湘好，《傷兵不在街頭》（台北：木馬文化，2024）。

⁴ Charles K. S. Wu, "How Public Opinion Influence Taiwan's Sunflower Movement?,"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19.3 (2019.11), pp. 289-307.

⁵ Ho, Ming-sho and Thung-Hong Lin, (2019), "The Power of Sunflower: The Origin and the Impact of Taiwan's Protest against Free Trade with China", in *The Umbrella Movement: Civil Resistance and Contentious Space in Hong Kong*, eds. by Ngok Ma and Edmund W. Cheng.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pp. 279-310.

求與凝聚共同體認同。由此，太陽花運動透過改變民意、創造可操作的抗爭模式，以及推動年輕世代政治參與，成為2019香港反送中運動在策略與意識型態上的重要啟發來源；先後三場大型社會運動之間存在一種間接但清晰的傳承關係，使香港的抗爭者能在既有經驗的基礎上，更迅速地應對北京與香港政府間的權力張力與控制策略。

對此，本文以「後社運書寫」作為討論主軸，其一太陽花運動和反國教運動的對照已有不少研究，其二近年來社運書寫已成為台灣的熱門書寫主題，不單是台灣社運，更包含了香港社運的書寫，尤其是此一批作家作品均牽涉到台港兩地的背景與角色，以及藉由回顧「過去」的社運記憶，對「現在」造成種種的創傷。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梁莉姿《樹的憂鬱》（2023）和許恩恩《變成的人》（2024）皆以「運動以後」作為書寫時間軸，而並非書寫「運動當下」，二人同樣企圖重思社會運動結束以後「尚未被理解的經驗」，尤其是許恩恩在動筆寫下第一篇後，讀到梁莉姿《日常運動》，並為其帶來滿大的鼓舞。⁶前者憑藉該作品不但入圍第23屆「臺北文學年金」獎助計劃，其後更榮獲第48屆文學圖書類金鼎獎。小說以2019年香港社會運動後的時代背景為核心，描繪港人因流亡、求學、移民或婚姻等原因遷居臺灣後的心理狀態與文化適應。透過多位角色的視角，探討流離者在異地面對的文化衝突、內在歉疚與政治分歧等議題，以及角色們在臺灣的生活中，經歷了格格不入與尋求融入的掙扎，呈現出流亡者的複雜心理，甚至港人在臺的日常與記憶錯置，呈現異地創傷的情感延遲與語言困境；其中得獎評語提到「描述臺港兩地人們的日常與心境，細寫個人留在香港或移居異地的諸種考量與艱難選擇，……織入一篇篇流離寓言中，暗示那些歷史烽火、運動遺緒並未化成灰燼，仍持續燒灼不同世代的港人的心。」⁷

至於，後者則獲得2024年臺灣文學獎金典獎蓓蕾獎，小說以2014年太陽花運動為背景，探討了參與者在運動前後的心理變化和生活轉折。小說的敘事結構橫跨不同時空，從2013年到2022年，描繪了主角們在社會運動中的經歷，以及他們在運動結束後的生活狀態。作者以社會學的視角，深入探討了社會運動對個人身份認同的影響，並呈現出角色們在運動後的心理掙扎與成長。《變成的人》不僅是一部關於

⁶ 張馨文，〈從社運組織者及研究者，變成寫小說的人：訪《變成的人》許恩恩〉（OpenBook 閱讀誌：<https://www.openbook.org.tw/article/p-69631>，檢索日期：2025年5月10日。）

⁷ 虛詞編輯部，〈廖偉棠《劫後書》、梁莉姿《樹的憂鬱》榮獲台灣第48屆文學圖書類金鼎獎〉（虛詞：<https://p-articles.com/heteroglossia/4748.html>，檢索日期：2025年5月10日。）

社會運動的小說，更呈現出社會運動參與者在運動後的生活狀態，並反思社會運動對個人生命的影響；其中評審意見提到「太陽花世代目前躍上舞臺的以男性為多，許恩恩這本小說以女性視角，……以『去或留』、『內與外』的衝突為主，分別討論臺港關聯、性別政治，女性情誼以及在運動中產生的溫柔與暴動，心悸與離散。」⁸由此可見，兩部小說所展現的，不只是事件之後的敘述，更是對未竟歷史的記憶再現，藉由後社運書寫進行討論，並非僅止於歷史紀錄，而是一種試圖在裂縫中重建認同、轉化創傷的文學實踐。

目前關於「社運書寫」的研究裡，在臺灣主要以賴香吟、邱妙津為主，其中黃文倩〈唯情與不潔：台灣解嚴後女性知識份子的社運敘事與主體困境——以邱妙津〈寂寞的群眾〉、賴香吟〈翻譯者〉與《其後》為例〉一文，明確將邱妙津的〈寂寞的群眾〉和賴香吟的〈翻譯者〉定義為社運小說。這些作品被視為探討臺灣解嚴後女性知識分子參與社會運動及其所面臨的主體與敘事困境。其中〈寂寞的群眾〉描寫了女性知識分子的成長，但同時呈現了她們受制於戰後臺灣著重個人情感與道德的文化制約，慣於以「唯情」或真誠來認識政治現實。這種思維導致思維上以原則性取代歷史複雜性。然而，作品的進步性在於主人公在對這種抽象性感到高度不安與矛盾下，仍選擇繼續投入社運；而〈翻譯者〉則進一步探討了在社會運動與革命理想退燒後，人際和兩性解放所面臨的「新的歷史困難」。作品中展現了當時女性知識分子唯心的自我安慰與自苦限制的典型性，這體現在主人公的「無言」敘事中。兩篇小說共同敏銳地投射出解嚴後臺灣女性知識分子在參與社會和安頓情感上的困難，這被視為臺灣現代轉型過程中的認識論與倫理學困難。⁹此外，謝樺瑩〈肉身其中的倖存者——析賴香吟〈翻譯者〉與《其後それから》〉一文則主要從倖存、創傷與哀悼的角度分析〈翻譯者〉與《其後》，雖然提及前行研究可能涉及「學運世代」、「國族」等議題，但其核心內容並非直接描寫或分析社會運動本身，而是聚焦於創傷後的心理狀態、失語以及透過書寫進行的生命翻譯與哀悼。¹⁰

⁸ 〈2024 臺灣文學獎金典獎·完整得獎名單與評語〉平路《夢魂之地》榮獲金典獎年度大獎〈OpenBook 閱讀誌：<https://www.openbook.org.tw/article/p-69890>，檢索日期：2025 年 5 月 10 日〉。

⁹ 黃文倩，〈唯情與不潔：台灣解嚴後女性知識份子的社運敘事與主體困境——以邱妙津〈寂寞的群眾〉、賴香吟〈翻譯者〉與《其後》為例〉，《第十三屆文學與美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3 年 12 月），頁 398-431。

¹⁰ 謝樺瑩，〈肉身其中的倖存者——析賴香吟〈翻譯者〉與《其後それから》〉，《雲漢學刊》第 46 期（2023 年 10 月），頁 110-143。

另外，以香港反送中運動為題的研究，主要有探討政治壓力與限制如何影響流行曲、文學及推理小說等不同媒介的創作與表達，並展現出創作者與閱聽眾如何回應社會變革和創傷。首先，周嘉浩〈傷痕文學視角下的後社運香港流行曲：沉默、抒情與暗碼書寫〉一文，探討後社運時期香港流行曲如何以傷痕文學手法表達創傷。面對政治壓力與審查，創作者透過沉默、抒情與暗碼書寫傳遞訊息，既為自保，也反映心理創傷。流行曲在高度商業化與中國市場考量下，其表達更為隱晦，卻仍成為建構香港集體記憶與身份認同的重要載體，並涉及哀悼的政治意涵；¹¹其次，賴展堂〈冤魂政治：以香港的社會運動與文學寫作為例〉主要探討香港社運脈絡下的冤魂政治，指出六四與反修例運動中的哀悼是政治異議的表達方式。死者被視為冤魂，其再現揭露被掩蓋的真相。透過符號與文學，冤魂獲得主體性，並需讀者想像與共感來激活，形成跨主體倫理，共同記憶創傷與編織死後生命；¹²最後，黃宗潔〈躁鬱的城市：當代香港推理小說的社會性及其「雙重轉譯」〉則探討當代香港推理小說如何在動盪政治中以虛構記錄歷史、反映焦慮。2019年反送中運動成為創作起點，小說藉雙重轉譯讓香港被看見。作品在後社運時期呈現警察角色的兩極形象，反映對真相與正義的價值追求。推理小說遂成為記憶歷史、抵抗遺忘的文化實踐。¹³

簡言之，上述文章皆強調文學在地回應創傷與記憶建構，聚焦於社運背景下的創作如何面對創傷、哀悼與記憶建構，無論是臺灣女性知識分子的敘事困境，或香港在政治壓力中以隱晦方式傳遞真相，皆展現文學與文化作品對社會變動的敏感回應與記憶保存功能；惟上述文章所討論的作品均以單一地方為主，而太陽花運動與反送中運動之間本存在著承先啟後的意義。對此，本文試圖進一步比較臺港經驗，關注運動後的共同體重構與跨地域文學對話，突顯其對話性在於由內省轉向跨境連結，並提供後社運文學新的比較與理論視野，以梁莉姿《樹的憂鬱》與許恩恩《變成的人》為討論對象，探討臺港文學中「後社運書寫」的敘述與意義。自2014年太陽花學運，到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以來，臺港兩地青年在社會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

¹¹ 周嘉浩，〈傷痕文學視角下的後社運香港流行曲：沉默、抒情與暗碼書寫〉，《臺灣傳播學刊》第45期（2024年6月），頁109-145。

¹² 賴展堂，〈冤魂政治：以香港的社會運動與文學寫作為例〉，《文化研究季刊》第178期（2022年7月），頁69-96。

¹³ 黃宗潔，〈躁鬱的城市：當代香港推理小說的社會性及其「雙重轉譯」〉，《淡江中文學報》第43期（2020年12月），頁239-273。

亦在運動結束後面臨理想幻滅、身份錯置與創傷記憶的深層挑戰。這些經驗不僅改變了個人命運和重塑了集體記憶與文學敘事，也是對運動事件的延續性回應，更是對以往的共同體想像論調進行再思與重構，進而冀以開拓臺港跨地域文學對話的可能性，並為後社運書寫研究提供新的討論視角。

二、「世代」的失落

在討論梁莉姿《樹的憂鬱》與許恩恩《變成的人》時，無法忽視其中深刻展現出的「世代感」與「記憶傳承」，這兩部小說不但是創傷後的情感紀錄，也是政治與社會變遷的精神面貌。《樹的憂鬱》與《變成的人》皆將焦點放在運動過後的青年和中年，關注其在面對現實壓力與理想幻滅時的掙扎與轉變，尤其是社會運動中最活躍的是青年世代，他們往往在運動之中扮演主導角色。在《樹的憂鬱》和《變成的人》中，「世代」問題是兩位作家的反思核心之一，分別探討了世代之間對移民、身份認同及歷史變革的不同體會，並以個體如何在共同歷史經驗中找到自我定位。首先，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對世代問題，其認為「世代」是建立在相似的「世代定位」（generation location）基礎上，即意味著處於同一歷史社會進程中的個體，由於出生年代相近，在社會整體中佔據了相似的位置。然而，僅僅是時間上的同期性不足以形成世代單位。關鍵在於他們能夠作為一個整合的群體參與共同的經驗。¹⁴社會變革和動蕩是促使同齡人形成具體聯繫、成為現實世代的關鍵。世代單位則是在這個共同參與和經驗的基礎上形成的。在同一個擁有共同命運的「現實世代」（generation as actuality）內部，會根據成員加工其共同經驗的不同具體方式形成不同的「世代單元」（generation unit）。¹⁵這些單元通過對共同經驗的一致性反應和特定的親和力來區分。世代單元的形成通常在一個具體的、緊密的群體中產生，但其影響力能超出原創群體，因為它能夠充分地表達整個世代特定「定位」的典型經驗，¹⁶而社會文化變革速度越快，特定世代定位群體通過產生自己的內在目的來應對變化情境的可能性就越大。

¹⁴ Karl Mannheim,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52), pp. 290-291.

¹⁵ Karl Mannheim,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pp. 303-304.

¹⁶ Karl Mannheim,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p.307.

首先，《樹的憂鬱》透過移居臺灣的香港青年的視角，描寫政治流亡者如何在異地尋找新的認同。小說中的角色經歷了語言、文化與身份的多重疏離，突顯出運動後的青年並非全然英雄式的象徵，而是帶著未癒傷痕的個體。梁莉姿透過多重人物的書寫，揭示不同年齡層與社會階層對運動的回應，呈現世代間的價值裂縫與溝通困境。值得注意的是，梁莉姿以「鳳凰木」作為一個世代的象徵，如同書名「樹的憂鬱」表示了這一代港人原本如樹般扎根香港，尤其是「鳳凰木」本是移植而來的。

「鳳凰木」在香港又稱為「森林之火」，原產於馬達加斯加，「林務部最早在1908年種植此樹一百二十七棵，是首度引入。1913由青山道沿路種至坳頭，1914年由沙田種至粉嶺，1915年由粉嶺至大埔墟。在1918年1月，在大埔墟有八百棵因霜凍而死。在香港，鳳凰木由播種到開花要用十年時間。」¹⁷由此可見，梁莉姿藉由鳳凰木的歷史，企圖把「我們的世代」與「上一個世代」的本質差異進行梳理：

「如果焦距模糊，遠看真的好像失火，是不是？其實不只有我們誤會，鳳凰木的英文名是Flame of the forest，據說當年航海家在船上望見它時，也以為森林大火，燒光整個島。後來發現後，便為它改了這名字。」

「不是說香港就是移民之地嗎，它也是一分子，鳳凰木本來是非洲某個小島上獨有的樹。大航海時代，法國人發現了它，把它移植去歐洲。到了十九世紀，英國人又把它從歐洲移到香港，沒想到跨越大半個地球，仍能落地生根，長得好好。」¹⁸

透過鳳凰木的故事，象徵並反思了香港的移民歷史與文化身份。鳳凰木「Flame of the forest」這名稱源自航海家的誤解，誤把滿樹火紅的花朵當作森林大火，這一錯覺透露出人在陌生環境中的迷惘與錯認，也暗喻移民者初至新地的不安與困惑。然而，更重

¹⁷ 香樂思著，彭玉文譯註、攝影，《野外香港歲時記（第二版）》（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24），頁116。

¹⁸ 梁莉姿，《樹的憂鬱》（新北：木馬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23），頁125。

要的是鳳凰木的遷徙歷程。從非洲小島被移植至歐洲，再由英國人帶來香港，最終「落地生根，長得好好」，這過程正如香港自身的歷史——一個由不同族群、文化與歷史交織而成的移民社會。鳳凰木不屬於這裡，卻能在異地繁茂生長，象徵著文化的適應力與生存力。更重要的是，作者試圖藉此表現出即便源頭各異，不同背景的人也能在香港這片土地找到位置與歸屬。這不只是對植物的描述，更是對香港身份的詮釋，一種漂泊中仍能扎根、混雜中仍可共存的希望與可能。香港在上世紀作為移民之地，鳳凰木正是其歷史的縮影。雖非本土之物，卻能在異地生根開花，歷經風霜依舊盛放，象徵著遷徙者的堅韌與適應，也反映殖民歷史下的文化流轉與混雜。此外，鳳凰木的「火」，不只是視覺奇觀，也是一種生命的強烈姿態：即使「根」不在原鄉，仍能燒出一片繁盛，如同「上一代」無數異鄉人於香港重新點燃生活的希望。值得注意的是，當阿園因處理移民問題而去到舅父家時，梁莉姿直接把兩代人之間的世代差異，進行了明顯的對照：

舅父看不下去他這樣傷春悲秋，打了根煙：「哎呀你哋呢代真係成碌木噉棟喺度。生得好養得好，根深蒂固，要走不走，舉棋不定，還有閒情逸致打點啊傷感啊猶豫啊內疚啊考慮去哪啊，多奢侈。」

「你看你爸和我這一代，甚麼都沒有，打到來，管它兒女私情家族親情，不跑，死人的。還不是赤條條，說走就走，一下子就來了啊。唉，時代變，你們真特別麻撚煩。」¹⁹

承上，呈現了阿園及其舅父兩代人對「離開故土」與「情感牽絆」的不同看法。舅父代表著上一代人曾經歷戰亂、動盪，他們在生死存亡之際，沒有選擇餘地，只能立刻逃離，不容許多愁善感。他們以「說走就走」的那種毫無包袱的倉皇離開，突顯出「上一代」的果斷與無奈。相對地，年輕一代面對的不是生死存亡，而是生活選擇。他們雖無迫切危機，卻因為生活穩定、情感豐富，對於是否離開顯得猶豫不決。藉由舅父批評不只反映出家庭之間的代溝，也點出不同歷史背景下，移民經驗與情感處理的巨

¹⁹ 梁莉姿，《樹的憂鬱》，頁334。

大差異。這不只是逃亡與選擇的差別，更是價值觀與身份認同的衝突，誠如阿園所想「原來兩代憂鬱的形狀，是不同的」：

這一代的憂鬱，是樹的憂鬱；上一代的憂鬱，是鹿的憂鬱。一隻動物上路，四蹄一躍，就是上了路，光溜溜，幾近無法回頭，無太多行裝，因而遷居至此，忍痛割捨。²⁰

在《樹的憂鬱》裡，提到「這一代的憂鬱，是樹的憂鬱」，可從鳳凰木的生命歷程找到對應的隱喻。不同於「上一代的憂鬱」如鹿般逃離原鄉、奔走異地，「這一代的憂鬱」更像是一棵鳳凰木，從殖民時代被跨洲移植、扎根香港，到承受異地的氣候與環境，歷經十年才開花，如同一代移民，雖已離鄉，卻未能遺忘原鄉。這種憂鬱不再是短促逃逸的疼痛，而是一種長期、深沉、與土地共生共存的感傷。即使能「落地生根，長得好好」，仍不免經歷寒霜之苦，正如1918年曾有八百棵鳳凰木枯死的歷史。鳳凰木成為香港「森林之火」，卻也隱含著這代人的靜默堅忍與內心燃燒不熄的異鄉情懷。這樣的憂鬱是沉默的、延續的，就像樹一樣，在風吹日曬間成長，在異地落地，卻永遠記得來時的路。

至於，在《變成的人》中，主角們歷經運動高峰後回歸日常，逐漸察覺自己與社會的距離，以及理想主義與現實妥協之間的矛盾。小說以多重時間敘事勾勒角色內在的成長與自我質疑，反映出對社會運動後遺症的深層反思。提出了「參與太陽花運動與否」是否能作為一個世代的劃分標誌：

²⁰ 梁莉姿，《樹的憂鬱》，頁334。

我想的是「參與過太陽花運動與否」這件事情是不是一個世代畫分的指標。所謂的「世代」究竟是什麼？我們是缺乏想像力的一代，所有想像都貢獻給街頭。批判太容易，反抗太理所當然，抗爭是義務，對世界指手畫腳漸漸變成戒不掉的習慣。你換我，我擾你，之後大家都在換空氣。²¹

所謂的「世代」，通常指的是在特定時期或背景下成長的人們所共同擁有的價值觀、經歷或文化認同。在這個背景下，太陽花運動作為一個鮮明的社會運動，對臺灣年輕一代的意識形態及行動模式產生了深遠影響。因此，參與過這場運動，似乎成為了某些人對「當代年輕人」的一個標誌，象徵著他們的政治覺醒與對社會變革的強烈關注。然而，作者進一步探討了這一代人是否因為參與運動而成為了「缺乏想像力」的一代。在批判過程中，我們的反抗與抗爭逐漸成為了理所當然的習慣，而不再尋求真正的創新與突破。運動的能量似乎被消耗在「指手畫腳」和相互換位的過程中，這種模式反而讓人迷失在無窮無盡的對抗中，缺乏了對更長遠目標的展望。同時，也反映出對當代青年世代的一種批判與自我反思，提出了關於「反抗」與「想像力」的問題。世代劃分不僅是行動的指標，更關乎我們對未來的憧憬與建構。可是，當曾經參與其中的承楷而言，試圖「離開社運圈」是脫離過去的煩憂，擺脫年輕時期無法實現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並希望通過這個決定重新開始，獲得一種嶄新而被肯定的生活：

他原本以為「離開社運圈」這個決定，會讓他得以拋下大學時期那種永遠做不到言行合一的鬱悶，拋下人際關係與國家暴力等種種回憶，獲得嶄新而受到肯定的新鮮空氣，現實卻是相反的，年資一年一年累積，過去的一切更加清晰，縱使不是凍結成發光的水晶，也風化成獨具紋路的石頭，他對過去的人事物擁有不太一樣的新評價，進而對年輕的自己也有些改觀。²²

²¹ 許恩恩，《變成的人》（新北：木馬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24），頁 153。

²² 許恩恩，《變成的人》，頁 239-240。

然而，現實卻是相反的，隨著時間的推移，過去的經歷並沒有隨著離開而消失，反而愈加清晰，過去的回憶逐漸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印象。這一過程揭示了一個深刻的現實，即「時間」無法抹去或消解過去的痕跡。無論是過往的理想、痛苦，還是人際關係的複雜，都成為了生命的一部分，並隨著時間累積而發展成新的理解與評價。對過去的回顧不僅使他對舊有的人事物有了不同的看法，也促使他對年輕時的自己進行反思。這種反思不僅是對理想未能實現的遺憾，更是對過去行為、態度的一種重新認知。同時，也表達了一種成長的過程，不是通過完全拋開過去來獲得新生，而是通過對過去的接受與理解，從而實現內心的轉變。

是以，在《樹的憂鬱》中，通過鳳凰木的比喻，作者反思了香港這個移民城市的文化與身份。鳳凰木經歷了從非洲小島到歐洲，再到香港的跨洲遷徙，它的生命歷程象徵著一代又一代移民者的歷史。儘管鳳凰木不屬於香港這片土地，但它已經生根，並且經歷了層層困難，最終依然能夠繁盛生長，這正如香港社會的歷史背景——不同族群與文化交織，形塑出今天的香港身份。這種身份認同的過程不僅是文化適應的結果，更是不同世代對過去移民經驗的再記憶與再詮釋。此外，小說中舅父與阿園的對話揭示了兩代人在面對「離開故土」這一問題上的巨大差異。舅父代表的是一個在動亂中無選擇的逃亡一代，他們的「憂鬱」像鹿般無法回頭，帶著無奈與倉促；而阿園所在的年輕一代，雖然同樣面臨文化認同的掙扎，卻更多的是處於一個選擇的境地。這種差異體現了社會變革與動蕩的速度如何影響世代的形成與認同，並且使得同一歷史背景下的不同經驗產生了多元的詮釋與回應。至於在《變成的人》中，太陽花運動成為劃分世代的一個指標。參與與否成為一種文化記憶，而這一代年輕人對政治與社會運動的參與，反映出他們如何處於一個既有理想，又面對現實的矛盾中。承楷的自我反思進一步展示了世代之間對「過去」的不同理解，從而揭示了世代劃分不僅是行動的指標，更是一個關於理想、現實與自我認知的深層問題。過去的經歷在時間的流逝中不會消失，反而愈加清晰，這正是每一代人在回望過去時，所產生的不同情感與認識。

承上，臺灣與香港的上一代各自嵌入截然不同的歷史結構與記憶體制，其生命經驗不僅決定了他們對政治與遷徙的態度，也構成了後社運世代在倫理與行動上的對話對象。若從歷史脈絡來看，臺灣的上一代多成長於1949年後的威權統治時期，政治高壓與思想審查塑造出「沉默即生存」的倫理框架。這一代人內化了服從與順

從的價值觀，將個體的安穩置於公共參與之前，在經歷白色恐怖、戒嚴與黨國教育之後，「不談政治」遂成為社會性的自我保護機制。相比之下，香港的上一代則源於逃避戰亂與極權的移民經驗，他們在國共內戰後南遷，以殖民地香港作為避難之所，在「務實」「忍耐」與「自我約束」中建立生活秩序。這樣的生存倫理同樣以「不語」為前提，卻來自另一種創傷：對政權逼迫的恐懼與對安定的渴求。這兩種歷史創傷雖屬異質，卻在文化心理上形成了相似的結構，即以沉默、服從與遺忘換取生存的可能。也因此，《變成的人》與《樹的憂鬱》中的「後社運世代」，其實是在這種「不語的倫理」之上展開反轉。他們繼承的並非單純的政治記憶，而是一種難以命名的倫理負債：如何在前代的沉默之後重新發聲？《變成的人》藉太陽花運動後的反思，揭示行動者在理想幻滅後仍須面對的「語言責任」；《樹的憂鬱》則讓香港流亡者在他鄉的語言錯置與審查焦慮中，持續辯證「言說」與「噤聲」的界線。相較於上一代的被動順從，這一代以「言說的掙扎」回應歷史創傷，將生存倫理轉化為一種道德行動的延續。

總括而言，兩部小說皆揭示記憶在當代的失落、迴轉與懸置狀態。它們書寫的不只是社會運動的歷史，而是那些曾經試圖參與其中的人們如何在事後的沉默與沉澱中，面對自己作為「這個世代的一份子」的責任與困境。藉由書寫「運動以後」的世代，我們得以理解臺港文學如何捕捉那條斷裂而未竟的世代之線，它不再是歷史本身的紀錄，而是記憶與身份持續協商的过程，也叩問著「我們是誰、來自何處」的核心價值。此外，臺港兩地的文學不僅呈現不同政治歷史下的創傷形態，更透過世代間的倫理轉譯顯示出「沉默—言說—行動」的歷史接續。《變成的人》與《樹的憂鬱》書寫的，正是一種從不語到自覺的轉化過程：臺灣的威權沉默與香港的流亡沉默，在這個世代的作家筆下，轉化為可被聆聽的倫理反思，讓「後社運書寫」成為對上一代創傷的再命名與再語言化，也彰顯臺港文學於時代更迭中承繼與反思的雙重意義。

三、運動「之後」的創傷

社會運動的結束，並不同於情感的止息。相反地，對於經歷過或見證過抗爭的人而言，運動的落幕往往開啟了另一層心理與記憶的糾結。凱西·卡魯斯（Cathy Caruth）的創傷理論強調創傷經歷的「延遲性」，即創傷無法在當下完全被理解或感

知，而是在一段時間後，透過夢境、閃回或重複行為等形式回歸，對個體造成持續的衝擊。因此，「創傷的故事，作為一種遲來的經歷的敘述，遠非講述對現實的逃避——對死亡或死亡的參照力量的逃避——而是證明了它對生命的無盡影響。」²³創傷不是即刻的心理衝擊，而是因為當時無法處理而潛伏在內心，並在未來以不同方式出現，這種「延遲的理解」(belatedness)使得創傷成為一個不斷回溯並無法完全掌握的過程。此外，創傷的真實性並不在於它能否立即被理解，而是它對生命和歷史的無盡影響。創傷經驗並不因無法即時理解而變得不真實，恰恰相反，它的強度體現在它對個體或集體歷史的延遲性衝擊上。這種延遲不僅改變了個人的內心世界，也影響歷史的構建，創傷事件只有在它與其他事件緊密交織時，才真正成為歷史的一部分，並體現出歷史的創傷性。

在《變成的人》與《樹的憂鬱》中，創傷並不主要透過對話來揭露，而是經由詞彙、象徵語言與內心意象的運作，以語言的斷裂與沉默來表現「運動之後」的創傷感。以《變成的人》為例，許恩恩在訪談中提到，小說中某章用「虛構的訪談」形式，包括異國記者與主角以英文交談，語言慢、簡單、節奏緩慢，此處並非真正對話的回應，而是一種語言與溝通的試探，是創傷中對母語與他者語言間不完全貼合的體感。²⁴在《變成的人》中，作者刻意避免在某些情節中用完整對話重現群體內部的爭論或遭遇壓迫的說話場景，而是以敘述者的視角穿插「筆記」、「會議紀錄」或「讀書會筆記」這類不是直接對話但帶有語言使用的片段，這些語言載體之中有省略、有中斷，有未被回答的問題——這正是創傷的語言特質：那種未竟、未被回應、或語言力道不足以承載全部情感的狀態。在小說中的創傷書寫多聚焦於內在心理層面，包括失落、自責、無力感與焦慮。小說描寫社運後青年如何在制度內外游移與自我辯證，以交錯的敘事結構讓角色在回憶與現實間流轉，使過去的運動經驗不斷干擾當下的生活。角色雖離開運動現場，但運動的影響如陰影般籠罩其人生選擇，創傷並非事件後的「結束」，而是一種持續存在的生命狀態。其中，主角「我」在回顧過去曾經在參與社會運動時的情況：

²³ Cathy 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7.

²⁴ 同註6。

「你可能跟運動幹部一起開會，就被說是『黑箱決定』，或者辦活動當總召是『獨攬大權』，或是社團裡面大家負責經營不同議題的『派系鬥爭』，也可能就是你做了一件錯誤的決定，或是誰覺得被你傷害，例如說腳踏兩條船也可以說是一種親密關係上的『獨裁』，批判時詞彙用得太感性也可以說成是一種精神上的『暴力』，然後組織的學弟妹或是新進素人很快學得這一套邏輯就會跟你算從前的舊帳叫做『轉型正義』。反正所有一切，當時有一個萬用的標語，就是『你這樣跟國民黨有什麼兩樣。』」²⁵

由此可見，原本為了對抗不公、追求民主的語言，卻被內部用來標籤與攻擊，也揭示了社會運動內部複雜而微妙的權力關係與批判文化，對「運動純粹性」與「道德優越」的理想提出質疑，並指出了運動中的批判語彙與正義論述，有時被操作成權力鬥爭的工具。透過特定語言（如黑箱、獨裁、派系鬥爭等）製造出一種高度敏感、彼此猜疑的氛圍，使得原本應建立在信任與討論基礎上的運動文化，轉變為一種彼此審判的政治場域。深刻反映出運動中的理想與現實張力，提醒我們運動不僅是對外的抗爭，也必須面對內部權力、情感與倫理的複雜交織。此外，小說還反映了社會運動的參與者在運動中的考量，在決策過程中個人需求優先：

我覺得「搞抗爭的」沒有比其他鑽研什麼事情的要更偉大。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台灣，還是國外也這樣。我們現在這個時代，參加運動的實在太多都是夾在個人情感與利益，是符合個人的需求優先。那篇說我們這些頻繁在街頭參與抗爭的人有「高敏感情緒病」，你看我們現在哪個還投入沒有一點精神疾病，就算是低敏感的人也被搞成高敏。²⁶

許恩恩以戲謔但不失尖銳的方式，展現出對當代社會運動參與者內部心理狀態與動機的深刻反思與批判，打破了社運參與者常被賦予的「正義英雄」形象，並點

²⁵ 許恩恩，《變成的人》，頁 174。

²⁶ 許恩恩，《變成的人》，頁 233。

出長期參與運動可能帶來的心理耗損與創傷。面對持續性的挫敗、不確定與內部衝突，運動者往往承受極大情緒壓力，甚至發展出精神健康問題。不但反映當代社運內部的矛盾與人性的複雜，也提醒我們應更關注運動者的心理狀態與情緒勞動，而非僅將其符號化為「犧牲者」或「英雄」。此外，運動本身的關注度擴大以後，NGO原本努力耕耘的議題，反而在社會的關注下被掩蓋掉：

因為那時候，你記得你收到割腕的自殘照，血淋淋的紅色，認識的某大學社團成員，對方控訴你的理由即是，太陽花奪走一切對於運動的關注，亦即奪走對方社團努力耕耘的議題所該獲取的關注，而議場內的人如你，象徵著太陽花學運的幹部，該為此負責。²⁷

由此，藉由「割腕自殘照」的控訴揭示了社會運動場域中隱而未顯的競爭與心理張力。當太陽花學運迅速成為社會焦點時，其高度可見性不僅凝聚了廣泛支持，也無形中排擠了其他議題的能見度與資源，導致長期耕耘冷門議題的社團或行動者感受到自身努力被邊緣化、掩蓋甚至否定。對於此一問題，許恩恩曾發表論文，文中探討了2014年臺灣太陽花運動中社會運動組織（NGO）的團結問題，通過社會網絡分析和深度訪談，考察了運動前NGO之間的合作關係以及運動期間的互動模式，並發現太陽花運動的團結並非偶然，而是建立在長期跨議題合作的經驗、共同的「反中」與「民主」框架以及面對危機時的相互扶持之上。「我們NGO」的敘事體現了這些組織獨特的集體認同，並與學生群體形成既合作又有所區隔的關係，亦強調既有的社會運動網絡和行動基礎是太陽花運動得以維持和達成目標的關鍵。²⁸故之，當公共關注轉化為稀缺資源時，原應團結抗爭的群體也可能陷入彼此傷害的境地。透過主角在「運動以後」的回顧，試圖反映出社運行動者在承擔政治角色的同時，也背負著沉重的人際與情緒壓力。無論是否真正掌握決策權，皆因其象徵性身分而承受巨大的道德與情緒壓力，成為他人失落與挫敗情緒的投射對象。

²⁷ 許恩恩，《變成的人》，頁265。

²⁸ 許恩恩、吳介民、李宗棠、施懿倫，〈「我們NGO」：太陽花運動中的網絡關係與社運團結〉，《台灣社會學》第38期（2019年12月），頁1-61。

相比之下，在《樹的憂鬱》一書中，雖然公開資料對其詳細對話結構與章節語言用法的公開摘錄較少，但書介與書評中提及小說刻畫「噤聲無語」與「續存記憶」的心理狀態，暗示語言的失聲與無力。這些描述本身就透過詞彙的選擇（如「噤聲」、「流離」、「憂鬱」）來呈現創傷：這些詞彙不是透過對話中某人說出，而是敘述語言本身的一部分，成為創傷的表徵，更強調外在現實對創傷的放大作用，如移民政策的不確定性、社會輿論的壓力與政治認同的漂泊。小說透過角色之間的張力，揭示港人流亡臺灣後的「後創傷症候群」，並質疑所謂的「自由之地」是否真能包容創傷者。在〈愛人〉一節裡，探討了在政治與文學交織的時代背景下，作家如何處理敏感議題及創作的自由。主角明微提到當前的社會氛圍中，言論和創作受到嚴格監控，尤其是對於參與官方文學活動的疑慮，擔心被「收編」或迎合主流政治。她提到這種情況是一種對自由表達的限制，甚至對作品的創作方式產生了自我審查的壓力。她的教授則提出不同觀點，認為限制和拘束不必然是壞事，作家應該在有限的空間中尋找創作的策略和突破，專注於如何以巧妙的方式表達真實的思想，而非過度擔心不能說什麼。這反映了作家在極權或限制性環境下，如何依然能夠保持對真實的表達與藝術的忠誠：

她吞吞吐吐問編輯朋友，有關這題材，會不會有甚麼「敏感」部分及字眼，是可能要修訂或不能出版的，假若日後出版社要求刪改，作者有多大權力拒絕？

編輯朋友稍頓，平實回應：「我剛剛想了一會，我不太明白這「敏感」定義是甚麼？有甚麼是不能出版的？」²⁹

在這裡，明微對「敏感」的定義來自於香港出版環境中，審查標準的不確定性與自我審查。這種「敏感」的模糊性使創作者無從掌握界線，只能不斷揣測與自我約束，進而扼殺創作的主動性與實驗精神。這種情境不僅是明微所面對的個人焦慮，更是對制度化的不安，讓創作變成一場避雷遊戲。小說藉由呈現出在反送中運動以後，

²⁹ 梁莉姿，《樹的憂鬱》，頁 242。

在自由與審查夾縫中創作者的掙扎與無力，也說明了在面對「敏感」議題時，所經歷的不僅是文字層面的斟酌，更是一場與體制與社會氛圍的持續博弈，甚至成為難以抹去的陰霾：

「我覺得，在我們這年代，因為旗幟立得太鮮明絕對，容易有種近乎潔癖的獵巫。」明微說：「譬如說，近年若有甚麼公眾人物還會為政府機構代言的話，網絡上很快就會冒起一股要求封殺、抵制的聲音。同樣地，這幾年，我不太敢再參加香港官方辦的文學獎或文學活動，怕有種收編或要配合主旋律的意味。」

「這是相當任性奢侈的說法呢。」教授脫下眼鏡，抹抹鏡片。³⁰

承上，明微所提到的「潔癖的獵巫」表現出當代社會中，對於個人立場和價值觀必須清晰地表明與界定，這使得一些人或機構一旦與官方或主流立場有所關聯，就會迅速成為攻擊的目標，並提到自己不敢參加香港官方辦的文學獎或活動，正反映了她對於文化活動中「收編」和「主旋律配合」的敏感性。在這種環境中，參與某些官方活動可能被視為對現有政權或官方立場的附和，從而使得參與者難以保持獨立性和創作的純粹性，「當文藝成為國家政治工具，怎樣調整書寫策略，去偷渡真正要說的話，是很多作家的重要課題。」³¹這種現象揭示了當代文化與政治的交織，尤其是文化人面臨的兩難困境：一方面作為公民或創作者，保持獨立思考和表達的自由，另一方面在某些時刻，官方的影響力卻可能讓這些自由受到限制。

此外，在《樹的憂鬱》與《變成的人》中，「多重敘事時間」不僅為敘事結構上的技巧，更是處理創傷、代際關係與身份重構的核心策略。兩書皆並非單線性敘述「社運之後 → 當下 → 未來」，而是在「過去／回憶」、「當下的存在狀態」與「未來的可能性／恐懼」之間，交錯並置。在這兩部小說裡，藉由角色的回憶（閃回）中斷當下情境，不僅重現社會運動中受壓迫、被失落或被迫離去的情感，也反

³⁰ 梁莉姿，《樹的憂鬱》，頁 246。

³¹ 梁莉姿，《樹的憂鬱》，頁 246。

襯出當下主角在制度、身份與世代裂縫中的困境；而預示或未來想像的片段，常邀請讀者思考，如果理想未能實現、制度未被修正，未來或許會如何。這樣的時間重組一方面使過去的歷史記憶得以進入當下的主體經驗，另一方面也使當下的不穩定性與未竟之情被強化。

在《變成的人》中，這表現為多篇章節以不同時間點與敘述角度交錯，代與代之間（父母／長輩 vs 主角自身）的敘述共同形塑記憶與創傷；在《樹的憂鬱》裡，「2019年後」的當下狀態與對離去、噤聲與語言失能的回憶（或對代際的寓意回望）並行，時間結構因此呈現斷裂又持續的張力。敘述中過去的記憶與對未來的想像往往和「現在」並列存在，甚至「現在」被回憶與預期所干預。這樣的安排讓文本不只是呈現已發生的事，更是一種對時間經驗本身的反思。敘述者可能因歷史、創傷、政治記憶，而在「現在」中被迫回望或展望。通過這種多重時間敘事，小說不僅記錄「運動之後」的生命經驗，更使讀者得以感知：記憶並未消逝，創傷與政治裂痕在不同時間層中相互照應；未來既受到過去的牽引，也承擔當下的不可確定性，從而凸顯個體與集體、世代與身份之間動態的倫理責任與歷史重負。

簡言之，《樹的憂鬱》與《變成的人》並未將社會運動作為小說的核心，而是將焦點放在後續創傷的幽微展現與倫理責任的思考。創傷不僅是被敘述的對象，更是生成文本本身的方式，正如Caruth所認為創傷的敘述不在於還原事件的真實，而是讓未被理解的經驗得以重返。透過這些虛構角色的創傷，我們得以看見當代臺、港青年在運動退場後的內在傷痕，一種難以被歷史承認，卻仍須被記得的真實。同時，兩本小說中創傷書寫透過語言的「斷裂」「沉默」與象徵性詞彙，而不是透過對話的完整對抗場面來揭露——這樣的書寫策略使讀者感受到創傷不只是一場公共事件的回憶，更是一種語言與情感不能完全被翻譯／對話的內在狀態。這也強化創傷的倫理與時間維度：過去沒有被完全說出，未來尚未被回應，當下被言語與沉默糾纏。

四、「臺港共同體」的反思

在臺港兩地社會運動後，不少輿論將兩地的抗爭經驗並置，強調「命運共同體」的連結。然而，《樹的憂鬱》與《變成的人》都對此提出質疑與修正。許恩恩在《變成的人》中揭露即使在臺灣內部，社運世代之間亦存在價值觀落差與理解斷層；而

梁莉姿則從港人「被包容」的視角出發，指出兩地在歷史脈絡、政治經驗與文化認同上的差異，使得「共同體」的建構顯得複雜而多層。因此，在探討《樹的憂鬱》與《變成的人》這兩部作品時，不能忽略其對「臺港共同體」想像的質疑與顛覆。此一共同體說法，從2014年臺灣太陽花運動與香港反國教運動漸漸作為對照案例，一直到2020年反送中運動的輿論與文化論述中被積極建構，象徵兩地青年因共同反抗威權、追求自由而產生的認同連結。³²然而，這種共同體在運動之後的現實中，逐漸顯現出其脆弱、錯位與差異，其中《樹的憂鬱》不僅描寫個人的情感與心理狀態，也反映出香港與臺灣在政治與文化上的交織與碰撞：

……時值立委選舉，連外出都能看到飄揚的宣傳旗幟，一張張催淚彈爆破的新聞照片，配上候選人名字和口號：「保臺抗中」、「挺自由、撐香港」、「臺灣反親中」；造勢大會上，人們冒著冷寒大喊支持香港的口號，挺人權，反暴政。

妳卻不再認同團結的意志能推倒高牆，不就是因相信復又失敗，才會倉皇逃落至此嗎？³³

在2020年臺灣總統選舉的過程中，充斥著強烈的政治標語，這些口號不僅強調了臺灣與中國之間的對立，更與香港的民主運動相連結，反映出臺灣社會對自由、

³² 「今日香港，明日台灣」最初在 2014 年太陽花運動期間興起，作為警示臺灣若在兩岸經濟或政治整合中失去對透明程序、言論自由、制度自主性的掌控，可能步上香港在主權移交後所面對的自由及民主倒退路徑。該口號在當時具有高度預警作用，促使臺灣社會對《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過程與潛在後果進行質疑與監督。爾後，此一口號在臺灣與香港間的使用出現斷裂與差異。其一，「今日香港，明日臺灣」被一些政治力量使用或政策動員化，如在 2019 年香港反送中運動期間及其後的臺灣選舉中，被用作強化反中立場與鼓動「身份認同」的工具，常與「一國兩制」方案對比，塑造台灣選民對中國威權威脅的恐懼感；其二，該口號在語義上存在誤用。許多人未能區分香港與臺灣在憲法地位、國際法律地位、法治結構等方面的根本差異，而把香港的遭遇作為臺灣可能命運的直接預言，用情緒化比喻來強化「亡國／被併入中國統治」的可能性，忽略臺灣在民主制度、國際社會支持與內部政治動力上的差異性。這導致該口號在某些場合成為恐懼動員（fear mobilization）而非理性公共討論的語言工具。最後，對於香港社運參與者而言，臺灣對這口號的使用有時被視為「符號共情」或政治利用，而未必深入理解香港複雜的制度壓力與法律實際狀況。

³³ 梁莉姿，《樹的憂鬱》，頁 57。

人權的強烈訴求。這些活動中的「團結意志」似乎是一種抵抗力量，能夠反映出人們對未來的渴望與抗爭的希望。然而，主角真真經歷了香港社會運動所帶來的失望、挫敗，對於團結與抗爭的力量感到懷疑。這種懷疑源於過去的失敗與無力感，當曾經的努力未能實現目標，反而可能讓人們感到倉皇與無奈，甚至質疑是否真的能夠依賴「團結」來克服這些高牆。不僅是挑戰了集體運動的理想化，也表達了對理想未能實現的失落，並質疑在充滿衝突與對立的時代中，是否仍能依賴過去的力量來推動變革。

另外，在《樹的憂鬱》裡，也可發現梁莉姿自身作為「他者」的書寫思考，尤其是當一個香港人要書寫臺灣的正當性，「要怎樣描述一個符合臺灣人想像的臺灣？作為外來者，我們足夠政治正確嗎？我們有足夠的立足點和資格去書寫嗎？」³⁴這不僅涉及政治正確性，更關乎身份認同和文化經歷的認同感，挑戰了外來者是否能夠恰當地把握臺灣的多元面貌與內在複雜性，甚至因為反送中運動而促使以「香港」為主題的相關出版，得到一定程度「特別待遇」：

這幾年，「香港」兩個字似長滿細刺的器皿，盛載甚麼不重要，底裡材質不重要，重要的是誘人、刺激又危險。不敢用的，端詳一番，好奇卻難為外人道；不怕的，灌進去，填滿想像，甘之如飴。幾年間報道、影視、訪問、音樂、藝術、出版物，百花齊放，有市場，自然有代言，有特別待遇。³⁵

承上，在以往臺、港之間可能有較為緊密的文化交流和情感連結，但隨著香港政治局勢的劇變，這一想像被顛覆。香港在過去的輝煌與當前的動盪中，成為了一個充滿矛盾的象徵。那些對香港的情感不敢接近的，反映了對這片土地和其政治動盪的不確定感與恐懼；而敢於接觸的，則將香港的情況轉化為一種具吸引力的想像與符號，將其包裝成某種文化商品，並透過媒體、音樂、藝術等渠道進行再創作與消費。這些媒體與文化產物「有市場，自然有代言」，表面上看似關心與支持香港，

³⁴ 梁莉姿，《樹的憂鬱》，頁 250。

³⁵ 梁莉姿，《樹的憂鬱》，頁 227。

但實際上也反映了當代臺灣對香港的感情並非簡單的共同體想像，而是一種高度商業化、符號化的理解。這種文化消費的過程，使得臺灣與香港的連結逐漸變得表面化、碎片化，不再是過去那種深厚的政治與情感連結，反而更像是一種關於香港的「想像」與「商品」，並且充滿了危險與誘惑，遠比實際的「香港」本身更具吸引力。對此，挑戰了對「臺港共同體」的理想化想像，顯示出隨著香港的政治變遷，臺灣對香港的情感與認同逐漸從一個具有共同歷史背景的實體，轉變為一個複雜且充滿誘惑與矛盾的文化符號。同時，除了「香港」成為了一種媒體與文化的產物，還賦予「香港」不同的標籤：

這幾年，臺灣之於香港，很多人拋出名詞指向，共同體、避風港、烏托邦，但這些詞語的內核是甚麼，沒人搞懂。要展示一地的苦難，市場不夠大，受眾不夠廣，只好把脈絡和殊異削鈍，好使形狀矩平，方便嵌接更廣義的價值。好比為了促銷蛋品，把明明大小不一的雞蛋、鵝蛋、鴨蛋，連鳥蛋都放在一起，統統歸納為「脆弱的蛋」。³⁶

藉由表達了當代臺灣對香港的關懷與想像中的矛盾性，特別是當涉及到「共同體」、「避風港」、「烏托邦」等概念時。雖然這些詞語表面上表達了臺灣對香港的支持與情感連結，但其內核卻常常是模糊與未曾深入探討的。臺灣社會以這些簡化的名詞來概括香港的處境，將香港的困境轉化為一種可以被普遍理解和消費的情感符號，卻忽視了其中的複雜性和差異。這樣的簡化操作讓臺灣對香港的認知更加表面化，呈現的是一種情感上的符號消費，而非深入理解香港真實情境的努力。這也突顯了臺灣社會對香港的同情與支持，更多的是基於情感認同與價值觀的契合，而非基於對香港多樣且複雜的政治、社會歷史的真實理解。

³⁶ 梁莉姿，《樹的憂鬱》，頁 230。

至於，在當代臺港關係的思索中，許恩恩的《變成的人》揭示了世代與地域之間對危機感知的深層落差。正如Eartha與「我」在戰爭預測上的歧見，臺灣人對地緣優勢與國際支持寄予希望，而來自香港的Eartha則因親歷威權逼近而格外敏銳與悲觀：

Eartha跟我不同，早在那時，她不只一次提到，台灣遲早會被中國入侵，戰火是遲早的問題，「不能心存德僥倖，」我卻總回說，台灣是個獨立的海島，跟香港畢竟不同；即使局勢趨於嚴峻，那也是機率極小的結果，「不會真的打，至少不會那麼快。」³⁷

在這裡，兩人分別展示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方面是對即將來臨的危機的警覺與不安，另一方面則是對現狀的安穩以及對未來可能性的低估。這種觀點上的差異，反映出不同個體在面對政治與軍事衝突時，對未來的預測與心理承受能力的差異。作為香港人的Eartha的悲觀觀點源自對兩岸關係緊張局勢的深刻憂慮，而作為臺灣人的「我」則以樂觀態度面對臺灣的地理位置與國際支持的信任，並認為衝突的發生並非立刻迫在眉睫，明顯反映出臺港之間面對同樣的議題時，相互之間存在著不同的看法與認知。儘管在《樹的憂鬱》和《變成的人》皆對於「臺港共同體」進行自我辯證，但其並不是全然反對此一論調，反而提醒我們不要流於片面的、口號式的層面，不能忽視臺、港兩地之間的複雜情況和其差異性，承如《變成的人》裡，Eartha所說：

³⁷ 許恩恩，《變成的人》，頁 50。

以帶有粵語口音的中文，Eartha說：「每次看海的時候，我都會想到在書中讀到的一段話，意思是類似說，我們受海洋吸引，凝視著海洋，是有原因的，因為比起鏡子，海洋更能反映出，我們是誰，來到這裡，我感覺大家就像是很想要傳遞這一件事情，就是我們都是同一片海洋。」³⁸

從Eartha這段話可見，海洋不僅是自然景觀，還是一種心靈的映照，能夠激發人們對自我和他人的認識，並且是連接人類情感和共鳴的載體。海洋不僅代表地理的連結，更象徵著人們之間無形的關聯與共同體的精神。這樣的理解反映出一種深層的共鳴，表明無論文化、背景如何，人類對海洋的感受都能跨越個體的差異，凝聚成一種共享的情感與認同。由此，海洋作為連結香港和臺灣的載體，提供了一種對話的空間，讓不同經驗與歷史能夠相遇、碰撞，進而生成新的意義。它是一種包容的力量，也是一種挑戰我們固有界線與身分認同的媒介。在這樣的象徵下，臺港之間的連結不再僅是政治或文化的策略性想像，而是一種經由共感與理解逐漸形成的深層聯繫。這也提醒我們，唯有在尊重彼此差異，和更深入理解相互實際複雜的歷史與社會情況下，共同體的可能性才得以真實地展現與持續。

總括而言，兩部作品皆拒絕將「臺港共同體」浪漫化，並指出：真正的連結來自於差異與裂縫之中，而非齊一性的認同投射。不僅打破了單一敘事，也使「臺港共同體」轉向為一種批判性的再思，面對差異與傷痕，才能重新構築跨地域的連結與理解。這樣的書寫不只是去神聖化，更是一種重構想像空間的實踐。在後社會運動的語境中，兩部小說提示我們：臺港關係不再是單一政治事件的反映，而是由歷史記憶、文化期待與身份不確定性所構成的複雜結構。在這個結構中，真正重要的，也許不是「我們是否一樣」，而是「我們能否在不一樣之中，仍選擇共在」。

³⁸ 許恩恩，《變成的人》，頁 101。

五、結語

本文以《樹的憂鬱》與《變成的人》兩部小說為討論主軸，探討臺港兩地在社會運動發生之後的文學書寫，兩部小說作為當代臺港後社運書寫的重要文本，揭示了運動之後的多重現實：個體心理創傷、世代價值裂縫、跨境文化衝突，以及共同體建構的思考。同時，可看出兩位作者透過其作品——「既是對歷史的追問，也是對未來想像的投射」——使「後社運」不只是時間上的「之後」，更是存在狀態的延續與重構；誠如上文提到梁莉姿與許恩恩的文本不單是對歷史的追問與未來的投射，也在敘事上深刻著重「當下／此時」的張力與矛盾。小說中的多個場景並非僅在重返過去或構想未來，而是透過角色對運動記憶的即時反思、內心自問，以及在日常語言與符號中顯現的焦慮與猶豫，讓「現在」成為敘述的焦點。這些小說通常不將主體的反思安排在「回顧式」的段落，而是讓角色在生活當下、對話或敘述的中縫裡自覺地停頓、揣摩、顫抖。這也意味著，當下不是一個靜態的終點，而是一種不斷被創傷牽動、被歷史與未來牽引的張力場。若我們在討論文本策略時充分帶出這種「現在性」的視角，便能更全面理解兩部小說如何將「運動之後」化為不斷在時間中被重構的過程，而不是時間軸上的靜態節點。

因此，後社運書寫一方面是再現傷痕與失落，另一方面嘗試將創傷轉化為歷史記憶、公共經驗與文化符碼，正如皮耶·諾哈（Pierre Nora）認為「我們要追問的不是傳統，而是它如何被建立、被傳承。總之，不是死後復活，不是重建，甚至不是再現，而是一種再記憶。是記憶，而不是回憶，是現在對於過去的全盤操作與支配管理」，³⁹而「再記憶」並非個人懷舊式的回憶，而是一種主動的、選擇性的記憶操作，是現代對過去所進行的詮釋與再建構。臺港文學在此過程中所展現的，不只是政治立場與社會批判，也是一種文學美學與倫理的選擇。

此外，《樹的憂鬱》與《變成的人》不僅記錄「運動之後」的沉默與餘震，更為社會創造出一種新的思考與對話的空間。本文以「後社運」書寫為討論主軸，除了反映書寫「之後」，還是面向「未來」的重新出發，尤其是「後社運」書寫不應僅被

³⁹ [法]皮耶·諾哈編，戴麗娟譯，《記憶所繫之處 I》（台北：行人文化實驗室，2012），頁 19。

視為政治運動的附屬產物，而是深具文學價值的反思載體。透過《樹的憂鬱》與《變成的人》的對照下，我們得以理解文學如何在創傷與轉變之中，承載個人與集體的記憶，並推動文化與政治的對話，更冀以未來相關研究可擴展至其他語系與地區，進一步探討「後社運」書寫的全球性語境與在地性實踐。

參考資料

一、專書

- 〔法〕皮耶·諾哈編，戴麗娟譯，《記憶所繫之處 I》，臺北：行人文化實驗室，2012。
- Nora, Pierre, ed. *Realms of Memory I*. Translated by Li-chuan Tai. Taipei: Flâneur Culture Lab, 2012.
- 沐羽，《煙街》，臺北：木馬文化，2022。
- Mu, yu. *Perhaps in the Smoke*. Taipei: ECUS Publishing House, 2022.
- 林于玄、陳湘紓，《傷兵不在街頭》，臺北：木馬文化，2024。
- Lin, Yu-hsuan, Zoey Chen. *The Wounded Are No Longer on the Streets*. Taipei: ECUS Publishing House, 2024.
- 香樂思著，彭玉文譯註、攝影，《野外香港歲時記（第二版）》，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24。
- Geoffrey A. C. Herklots. *Hong Kong Seasons Throughout the Year(2nd edition)*.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Yu Wen Peng. Hong Kong: Chung Hwa Book Company (Hong Kong), 2024.
- 梁莉姿，《樹的憂鬱》，新北：木馬文化，2023。
- Leung, Lee-chi. *The Melancholy of Trees*. New Taipei: ECUS Publishing House, 2023.
- 許恩恩，《變成的人》，新北：木馬文化，2024。
- Hsu En-En. *The Becoming*. New Taipei: ECUS Publishing House, 2024.
- 蘇朗欣，《觀火》，臺北：木馬文化，2024。
- So, Long-yun. *Watching the Fire*. Taipei: ECUS Publishing House, 2024.
- Cathy 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Ho, Ming-sho and Thung-Hong Lin, "The Power of Sunflower: The Origin and the Impact of Taiwan's Protest against Free Trade with China", In *The Umbrella Movement: Civil Resistance and Contentious Space in Hong Kong*, edited by Ngok Ma and Edmund W. Cheng, 279-310.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9.

Karl Mannheim,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52.

二、期刊論文

周嘉浩，〈傷痕文學視角下的後社運香港流行曲：沉默、抒情與暗碼書寫〉，《臺灣傳播學刊》第 45 期（2024 年 6 月），頁 109-145。

Chou, Chia-hao. "Post-Movement Hong Kong Pop So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ar Literature: Silence, Lyricism, and Encoded Writing." *Taiw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no. 45 (June 2024): 109–145.

許恩恩、吳介民、李宗棠、施懿倫，〈「我們 NGO」：太陽花運動中的網絡關係與社運團結〉，《臺灣社會學》第 38 期（2019 年 12 月），頁 1-61。

Hsu, En-en, Chieh-min Wu, Zong-tang Li, and Yi-lun Shi. "'Our NGO': Network Relations and Movement Solidarity in Taiwan's Sunflower Movement." *Taiwanese Sociology*, no. 38 (December 2019): 1–61.

黃文倩，〈唯情與不潔：臺灣解嚴後女性知識份子的社運敘事與主體困境——以邱妙津〈寂寞的群眾〉、賴香吟〈翻譯者〉與《其後》為例〉，《第十三屆文學與美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3 年 12 月），頁 398-431。

Huang, Wen-chien. "Emotion and Impurity: Post-Martial-Law Taiwanese Female Intellectuals' Movement Narratives and Subjectivity—Case Studies of Chiu Miao-jin's *The Lonely Crowd*, Lai Hsiang-yin's *The Translator*, and *Afterwards*." In *Proceedings of the 13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iterature and Aesthetics*, 398–431. December 2013.

黃宗潔，〈躁鬱的城市：當代香港推理小說的社會性及其「雙重轉譯」〉，《淡江中文學報》第 43 期（2020 年 12 月），頁 239-273。

Huang, Tsung-chieh. "Bipolar Cities: The Social Nature and 'Double Translation' of Contemporary Hong Kong Detective Fiction." *Tamkang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o. 43 (December 2020): 239–273.

賴展堂，〈冤魂政治：以香港的社會運動與文學寫作為例〉，《文化研究季刊》第 178 期（2022 年 7 月），頁 69-96。

Lai, Chan-tang. "Politics of Vengeful Spirits: Social Movements and Literary Writing in Hong Kong."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no. 178 (July 2022): 69–96.

謝樺瑩，〈肉身其中的倖存者——析賴香吟〈翻譯者〉與《其後それから》〉，《雲漢學刊》第 46 期（2023 年 10 月），頁 110-143。

Hsieh, Hua-ying. "Survivors in the Flesh: Analysis of Lai Hsiang-yin's *The Translator* and *Afterwards Sorekara*." *Yunhan Journal*, no. 46 (October 2023): 110–143.

Charles K. S. Wu, "How Public Opinion Influence Taiwan's Sunflower Movement?,"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19.3 (2019 年 11 月): pp. 289-307.

三、電子媒體

〈2024 臺灣文學獎金典獎·完整得獎名單與評語〉平路《夢魂之地》榮獲金典獎年度大獎〉(OpenBook 閱讀誌：<https://www.openbook.org.tw/article/p-69890>，檢索日期：2025 年 5 月 10 日)。

"2024 Taiwan Literature Award Golden Prize: Complete Winners List and Comments—Ping Lu's *The Land of Dream Souls* Wins Grand Prize of the Year." OpenBook. Accessed May 10, 2025. <https://www.openbook.org.tw/article/p-69890>.

張馨文，〈從社運組織者及研究者，變成寫小說的人：訪《變成的人》許恩恩〉(OpenBook 閱讀誌：<https://www.openbook.org.tw/article/p-69631>，檢索日期：2025 年 5 月 10 日)。

Chang, Hsin-wen. "From Social Movement Organizer and Researcher to Novelist: Interview with The Becoming Person Author Hsu En-en." OpenBook. Accessed May 10, 2025. <https://www.openbook.org.tw/article/p-69631>.

虛詞編輯部，〈廖偉棠《劫後書》、梁莉姿《樹的憂鬱》榮獲臺灣第 48 屆文學圖書類金鼎獎〉（虛詞：<https://p-articles.com/heteroglossia/4748.html>，檢索日期：2025 年 5 月 10 日）。

Heteroglossia Editorial Team. "Liao Wei-tang's After the Disaster and Liang Li-zi's Tree of Melancholy Win Taiwan's 48th Golden Tripod Literary Awards (Book Category)." Heteroglossia. Accessed May 10, 2025. <https://p-articles.com/heteroglossia/4748.html>.

The Historical Memory and Trauma Representation in Post-Social Movement Narratives of Taiwan and Hong Kong Literature: A Case Study of *The Melancholy of the Tree* and *The Becoming*

Yu, Ming-Sheung*

Abstract

The 2014 Sunflower Movement in Taiwan and the 2019 Anti-Extradition Bill Movement in Hong Kong mark pivotal turning points in recent social mobilizations across both regions. These movements not only awakened the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of younger generations but also reshaped contemporary literary trajectories. In the aftermath, a significant body of writing has shifted toward life after protest, foregrounding themes such as traumatic memory, exile and displacement, intergenerational rupture, and the reconfiguration of identity. Together, these works gradually delineate a mode of “post-social movement writing.” Notably, beyond retrospective reflection or future projection, the narrative importance of the “present moment” has grown, yet remains underexamined in existing scholarship.

In response, this article takes Leung Lee-Chi’s *The Tree’s Melancholy* and Hsu En-En’s *The Becomings* as primary texts to examine how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n Taiwan and Hong Kong rearticul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collective within a post-movement context. Through strategies of temporal reordering, linguistic fracture, and innovative narrative forms, these works reconstruct experiences of trauma, generational memory, and identity in the wake of political rupture. Both texts further interrogate a central question: when a movement ends and ideals collapse, how do individuals re-position themselves? And how does literature mediate, inherit, or transform emotions and histories that remain unresolved?

Ultimately,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literature functions as an ethical practice, illuminating the representation of trauma, intergenerational memory, and the imagined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nnections between Taiwan and Hong Kong. Through this lens, the study outlines a more critically engaged and transregional pathway for conceptualizing a “post-social movement literature.”

Keywords: Taiwanese and Hong Kong literature; post-social-movement writing; historical memory; trauma representation; Taiwan–Hong Kong cultural community

* Ph.D. student,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Received: August 29, 2025; Accepted: October 31, 2025)

鐵窗內外——論《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 的異質空間^{*}

陳木青^{**}

摘 要

本文以陳健民所著之《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為核心，探討當代香港因政治運動而入獄者如何在監獄的規訓體制下表現韌性。首先藉由傅柯（Michel Foucault）的「異質空間」和「規訓與懲罰」等論述，透顯監獄除了全身查驗、限制移動、抹消時間感知等傳統方式外，更引入高智能現代科技進行監控與意識形態灌輸，企圖對受刑人進行全方位的思想矯正。

然而，身處其中的陳健民卻利用監獄精密有序之特性，將禁錮空間轉化為重省自我的緩衝地帶。當外界因「反送中」運動陷入社會混亂，獄中反倒成為作者避開紛擾、專注閱讀的安頓之處。透過與曾國藩、林獻堂等歷史「幽靈」進行跨時空對話，其將香港處境與晚清、臺灣的歷史經驗進行歷時性與跨地域的參照，藉此深化對臺、港、中三者關係的思索。最終，作者以書寫展現出思想得以穿越高牆與外界連結的力量，不僅有著如水般的流動韌性，更揭示在威權結構下，閱讀實可作為心志反抗與形塑集體記憶的重要途徑。

關鍵詞：陳健民、《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異質空間、規訓、閱讀

^{*}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由 CSA 文化研究學會、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主辦之「韌/任性：2023 年文化研究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承蒙楊佳嫻教授給予寶貴建言；後於學報審查期間，又獲得二位匿名審查人之精闢指正，使內容更臻完備，筆者亦收穫良多，特此致謝。

^{**}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收稿日期：114.12.31；通過刊登日期：115.04.23)

一、前言：在「受苦」與「反抗」之間

2019年4月24日，發起「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身為「佔中三子」之一的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師陳健民，¹遭控串謀、煽惑他人以致對公眾造成妨擾，最終被法院判處16個月刑期；後因表現良好，自動減刑三分之一，於2020年3月14日期滿出獄。2021年7月移居臺灣，獲聘為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客座教授，並於翌年底取得中華民國國民身分；2024年8月起在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任客座研究員，2025年則和在臺港人、臺灣學者創立「臺灣香港研究學會」，²擔任首屆理事長，希冀以臺灣作為海外香港研究的重要據點，使因政治局勢流散海外的港人，得在此重聚、討論與發聲，且持續推動目前難以於香港進行研究之相關課題。³

陳健民服刑期間，香港正經歷烽火漫天的「反送中」運動，⁴其不時將獄中見聞、感受撰成文章，並在香港《蘋果日報》、《立場新聞》發表、轉載。⁵出獄後隨即結集成書，各別於2020年6月在香港發行《陳健民獄中書簡》及2022年3月於臺灣

¹ 其餘二人為牧師朱耀明和曾在香港大學法律學院任教的戴耀廷。

² 該學會宗旨為「立根台灣、與各地合作推動香港研究」，而且「定期舉辦講座和研討會、設立獎學金鼓勵在台學生進行有關香港的論文研究等活動」，參見 Taiwan Society for Hong Kong Studies 臺灣香港研究學會，「簡介」，Facebook 臉書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twhkstudies>)，2026年3月13日檢索。

³ 陳健民認為臺灣除了作為重要的華文出版中心之外，許多香港人或在英國、加拿大的離散港人有時也會前來臺灣，故位置具重要性，可以較方便地在此進行香港議題的訪談跟研討。詳細內容請參見李牧宜、張郁婕採訪，〈怎知香港的未來會如何？專訪臺灣香港研究學會陳健民：當臺灣成為觀測最前線〉，2025年12月11日轉角國際 udn Global—聯合新聞網。(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4/9196274)，2026年3月13日檢索。

⁴ 事發的導火線為港男陳同佳在臺灣殺害同行女友潘曉穎後，由於臺、港兩地沒有引渡安排，故香港政府提出《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逃犯條例》)和《引渡條例》，以填補法律漏洞，使往後在香港以外犯事的嫌犯能夠移交到犯案地受審；但此卻引起民主派政治團體、人權與法律組織之疑慮，擔憂行政長官將可以下令拘捕任何疑犯，包含所有香港居民、在港居住者及訪港、經港旅客，將其移送至尚未與香港簽訂正式雙邊引渡協議的司法管轄區，特別是法律、人權保障皆嚴重不足的中國大陸。關於此部分內容，可參見馬嶽，《反抗的共同體：二〇一九香港反送中運動》(臺北：左岸文化，2020年)，頁45-63。

⁵ 《蘋果日報》、《立場新聞》分別於2021年6月24日、2021年12月29日遭港府以違反《國安法》為事由，勒令停止刊行、關閉網站，且多位高層被逮捕，資金亦受凍結，故今已無法自該網站見到陳氏之文。

出版《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⁶使讀者窺見作者在獄中的生活面貌，也揣摩、領受當中遭受的身心磨難跟閱讀體悟。然而，此書雖已出版數年，主題性研究卻是有待強化，目前僅見網路上之對談專訪或讀後分享，較無系統性的論述。筆者以為或可從「監獄」此特殊空間進一步深探，以呈顯作者如何看待其中的運作方式、管理機制與在心態上怎麼應對、調適。

在文學研究中，有一類別即為「監獄文學」，根據黃文成之探究，其歸納臺灣的監獄文學共有獄中家書、監獄日記、童話書寫、回憶錄等四類，除了經由書信往返和家中取得聯繫、確認自己的存在外，也刻劃個人生活起居、監獄實況、當下情緒，或是完整描述入獄始末，甚至可達到心理層面的療傷作用。⁷又如王建國闡釋此類文學之特點時，便述及：

此間因政治事件入獄之政治犯（良心犯）多可能具有知識分子拒絕被規訓與自我反省的特性（唯仍須視整體相對的大環境與個別情形而定），加上其往往須以個人生命為代價而進行寫作，故反應在其自發性作品中者往往亦較能激盪出深刻之人性，而與目前多被誘導且多以發抒其悔過之情的監獄寫作（班）有所不同（具有社會學上的意義）——其本身不僅無須懺悔，甚至其本身有時就是時代的真理。⁸

知識分子基於良知違反法律規範，並以自由為代價，奮勇抵禦上層權力的威嚇及壓迫，此和要入獄者懺悔過錯之原本設置目的不同，這種不屈姿態，使眾多因違逆暴政以履行公理、正義信念而被抓捕者，將其視為重要象徵或傾訴對象。如果依上述論點對照《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即使文學性質不一定相當強烈，但確實可透過此書，較為完整地理解作者在獄中受到的規訓、管治，以及其欲藉書寫揭示的對抗意圖。甚且，作者的寫作、出版目的並非僅是為了記錄生活作息、思緒感想，如其提到書末附上的「獄中書單」乃是「希望一些抗爭者如不幸入獄，亦能在

⁶ 陳健民，《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新北市：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本文以此版本為依據，以下出自該書之引文，除有闡明必要，否則不另作註，僅於文末標示書名、頁碼。

⁷ 黃文成，《關不住的繆思：臺灣監獄文學縱橫論》（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頁33-36。

⁸ 王建國，《百年牢騷：台灣政治監獄文學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6年），頁15。

逆境中保持心境平靜，並趁這難得『斷網』的日子，讀書尋智慧」（《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頁25-26）；至於沒有準備入獄的讀者，則期待能夠努力求取學問，珍惜得來不易的自由社會。此外，如前所示，他在獄中撰寫的文章並非一次集結成冊，而是以投書、刊載形式，讓廣大群眾逐漸知曉當中情況，於是相較家書、日記等較為封閉、私密的文類，陳健民之文更具開放和公眾性，甚或直言不諱地批評政府，與外界如火如荼的社會運動彼此映照。⁹

若再將香港版《陳健民獄中書簡》跟臺灣版《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進行比較，二者封面均為一隻鳥佇立在倒刺的鐵絲網上，此為陳健民在獄中所畫，除了自比為籠中鳥行走於鋼索般的艱難處境外，更是以在獄中看到的紅耳鵯為喻，牠們「嘴裡都銜著一些如碎木的物體，不徐不疾地在鐵絲網上跳動，一點都不擔心被刺傷」（《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頁128）的情態，正是陳氏嚮往之境地，故藉此自許，希冀逆權衝刺，為香港這座家園有所貢獻。

然而，臺灣版增添了標題——「受苦與反抗」，從「受苦」這個詞彙及作者境況來看，或許代表著國家權力由上往下的控制、規訓（discipline），而這也符應傅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針對監獄此類空間的觀察，如下所述：

監獄必須是一個澈底的規訓機制。這麼說有好幾層意思：它必須涵蓋個體的所有面向，其肉體訓練、勞動才幹、日常行為、道德態度、傾向；遠遠超越總是意味著某種專門化的學校、作坊或軍隊，監獄是「全面的規訓」。再者，監獄沒有外部或間隙；除了它的任務完全達成，否則它不會善罷干休；它對個體的作用必須毫不間斷：「監獄是」不停的規訓。最後，在囚犯身上，它施加了幾乎是絕對的權力；它擁有其內部的鎮壓及懲罰機制：「監獄是」專制的規訓。¹⁰

⁹ 謝仕淵談到政治犯在獄中寫的日記、書信，須面對各種監視與檢查機制，使得暢所欲言的程度，受到相當程度之制約；然而，亦有像蔣渭水（1890-1931）一般，將剖白自我的日記公開，以作為抵抗策略。如果將此論跟陳健民之文對照，除了在〈如鹿切慕溪水〉對蔣渭水、石煥長（1891-1971）繞過臺灣總督府到東京推行「議會請願運動」之舉深感敬佩外，其在信中直率地針砭時事、議論當權者，亦與蔣氏的無畏精神有呼應之處。謝氏之說，參見〈囚禁與求生——柯旗化獄中家書所見之戰後臺灣「白色恐怖」〉，《歷史臺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第4期（2012年10月），頁150-151。

¹⁰ 法國·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著，王紹中譯，《監視與懲罰：監獄的誕生》（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頁432-433。

上述描繪監獄的功能、機制與涵蓋層面，在此空間中的囚犯，雖然不乏誤觸法網或遭到陷害而入獄者，¹¹不過在現實上的確違反法律規範，於是須入獄服刑作為懲戒。當中除了身體勞動、管訓，精神跟意識的導正更不可免，使得此空間的管理者、指導者（如懲教署或矯正署職員）便象徵律法的絕對權威。傅柯在討論 heterotopia¹²此概念時，共歸納出六項原則：（一）形式多樣，但大致分成危機（heterotopia of crisis，保留給處在危機狀態之人的神聖或禁制地方）、偏差（heterotopia of deviation，安置偏離常態者之處）二類；（二）每個社會、時代都有不同運作方式及功能；（三）可在一個真實地方裡並置好幾個空間，且有幾個彼此不能共存之定位；（四）朝向異質時間（heterochronism）開放，又有恆久累積和轉瞬即逝之時間差別；（五）預設開啟、關閉系統，使其得以隔絕跟穿透；（六）功能在於創造幻想空間，以揭露真實空間其實更虛幻；或者倒反過來，它們的角色是創造一個精緻、完美的真實空間，從而映襯出另一空間的髒污與雜亂。¹³由於監獄屬於「偏差性異域」，設立目的在於希望藉著隔離、管束導正犯人，時間性質亦有別於外界常軌，故將之納入「異質空間」討論範圍。關於此概念，王志弘有著如下觀察及闡述：

¹¹ 例如陳健民提及一些獄友因打黑工遭判刑，亦有不少人由於販運毒品入獄，當中不乏年少無知、被人利用或受生活所逼一時糊塗者。參見氏著，《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頁53。

¹² 根據王志弘的統整，heterotopia 概念出自傅柯 1967 年的一場演講，指涉介於真實空間（real space）與烏托邦（utopia，虛構空間）之間的所在。該詞約莫 1980 年代譯介入臺灣，當時多採用 1986 年 *Diacritics* 的英譯版「Of other spaces」。後因歷史條件、社會脈絡、政治意圖等不同因素，曾出現差異地點、異質空間、異托邦等譯名。如果分別來看，「差異地點」有殊異、新奇、陌生意涵，「異托邦」則由楊凱麟所譯，王氏認為雖有音譯效果，但也可能過於強調「假託或托寓之邦」，過度向烏托邦靠攏，而且偏向純語言層面。至於「異質空間」，一方面 hetero 這個字首在臺灣多譯為「異質」，另一方面據其統計，2016 年以前以此為關鍵詞之學術期刊、學位論文共計 117 筆，高於「差異地點/差異空間」的 24 筆及「異托邦」的 26 筆，可見使用率較後者二詞為多。詳參氏著，〈傅柯 Heterotopia 翻譯考〉，《地理研究》第 65 期（2016 年 11 月），頁 84-88。本文考量到作者並非以獵奇、特異角度看待監獄，且該處亦非寄託之域，內容又不屬語言學範圍，故採用「異質空間」稱之，並藉此強調監獄乃是與社會常軌斷裂，卻又充滿權力與抵抗之動態場域。

¹³ 王志弘，〈傅柯 Heterotopia 翻譯考〉，79-80。

就其概念內涵而言，heterotopia 作為差異與不同的所在或異位，主要是描繪對照於主流語言或空間秩序的異質共存、混亂無序、斷裂分歧，或虛實同在的狀態。就政治或批判潛能而論，heterotopia 則具有在虛實之間往返而重塑主體或認識，或通過異質並存、碎裂的張力而擾動主導秩序或想像，或是以其幻想與完美構造來映襯現實的虛幻與雜亂等，各種不同效果。最後，我們也不能忘記，heterotopia 伴隨著空間史，有其形態和功能轉換的歷史，以及與之搭配的異質時間。¹⁴

相對於外頭的「正常」空間，囚犯因違反法律被視為妨擾秩序、危害安寧者，遭禁錮於無法自由活動的監獄，並接受身心矯正。其內部的一切流程、形式彷彿無懈可擊、安排縝密，如作者所處的壁屋監獄雖然關押的是罪刑較輕、兩年內就會被釋放的犯人，而飲食、工作、休息、睡覺等時間作息卻均被安排、劃定，少有選擇空間，使被囚者感到限制跟痛苦。¹⁵或可思考的是，監獄中被管訓者是否皆服從政府、獄方由上至下的訓導？若從書中觀之，陳健民坦言「在香港的監牢裡我還可以讀書，我其實心靈上挺自由的」（《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頁242），呈顯監牢雖困住肉身，但經由閱讀卻能達致思想自由，甚或成為「反抗」的實踐行動，使得在虛實相間的夾縫中，有逃離於體制外之可能。

陳健民將坐牢視為「堅固信念、沉澱思想、磨鍊身心的歷程」（《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頁38），「每一天被關在囚牢，都是在控訴這個不義的政權」（《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頁46），展現監獄有規訓外之意涵，成為與權勢對壘的空間。他述及在閱讀金大中（1924-2009）的獄中書信、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 1906-1945）的《獄中書簡》（*Letters and Papers from Prison*）後，更堅定坐牢決心，相信自己受苦為「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又名為「公民不服從」）的必經過程，顯見這些獄中閱讀跟書寫，給陳健民相當大的力量，且延續此寫作脈

¹⁴ 王志弘，〈傅柯 Heterotopia 翻譯考〉，頁 80。

¹⁵ 黃金麟亦言傅柯將空間作為一種權力規訓技藝，身體在監獄中受到監視、檢查和教養，歷經種種形塑和觀看，進而形構成一種既溫馴又有生產性的身體樣態。詳參氏著，《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 年），頁 233。

絡，展露他對香港政府的抵抗、控訴。¹⁶不過，在陳氏的寫作內容和認知中，「監獄」並非僅為單方承受苦痛之空間，而也具反抗意蘊，甚至不止於此，如下所示：

還有幾天我便出獄，坐了不足一年牢，當然不會產生病態的不捨。誰會眷戀森嚴刻板的生活和骯髒嘈雜的環境？但不得不承認，高牆內物質匱乏的日子，讓我可以潛心讀書思考，那是久違了的平靜（《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頁205）

此為作者出獄前之思索，其想起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離開維也納、曼德拉（1918-2013）出獄時皆不約而同懷念起那座城市和監獄中自己栽種的植物，並回觀當時心境；雖不能說眷戀，但確實也是監獄讓他能潛心讀書，阻隔鐵窗外的喧擾。綜合來說，以陳健民此個案觀之，將發現其所在的監獄亦能作為具協調韌性（resilience）又不失自適任性的空間，有休養生息、盪衡時勢的轉圜功能，不受制於高牆圍堵及威權恫嚇，彷彿處在規訓與抗衡之間（in-between），有著多元流動之形貌，甚至得以重塑對於自我狀態、心緒的思考。¹⁷是以，本文將以「異質空間」此概念作為切入視角，探析作者如何感受、看待監獄空間的規訓技術，以及怎麼以兼具韌性和任性的作為來因應。

¹⁶ 2013年3月27日舉行「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和平佔中）記者會時，佔中三子之一的戴耀廷便已提及此運動為公民抗命，屬違法行為；而陳健民也論及在獄中閱讀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的〈公民抗命〉後，更鞏固抗爭意志，可見在香港法律和公民抗命間的取捨，陳氏選擇後者，詳細內容參見氏著，《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頁47。彭麗君亦提到這兩者之間的關係，認為佔中三子雖將公民抗命視為高度成熟的社會表現，卻也低估此舉釋放出來的強大破壞力；不過，原則上其仍肯定佔中乃至雨傘運動意在挑戰現狀、打破現存制度，以建立更為良善的社會，是公民抗命的一個顯著示範案例，詳參氏著，〈公民抗命與法治共同體：香港的可能〉，《文化研究》第23期（2016年9月），頁224-226。

¹⁷ 關於此概念，李育霖認為「在之間」並非僅指在不同的物事「之間」，更指稱一種特殊的生命情態，含有重新體認空間與生命連結的潛在可能，參見《擬造新地球：當代臺灣自然書寫》（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年），頁158。陳芳明亦提到「之間」（in-between）之命名富有流動性質，避免陷於兩極選擇之窠臼和刻板的正反辯證，且能隨意自如地移動位置，保持自由逃逸之空間，詳參《美與殉美》（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頁164。

二、萬山不許一溪奔：監獄的規訓型態

實際上，「水」的流動意象在陳健民的獄中書簡裡不時出現，特別是南宋楊萬里（1127-1206）〈桂源鋪〉中的「萬山不許一溪奔」此句，¹⁸更是常被引用。其中，山與溪之意涵，宛如香港政府、中國當局與陳健民、反送中示威群眾之壓制/抵禦關係，而余英時（1930-2021）也曾以此詩贈給作者加以勉勵，且使其撰寫〈萬山不許一溪奔〉一文記錄此事，展現對歷史情境的體察與思辨。¹⁹不過，現實中監獄對於身體、精神的禁錮，也像重重山巒般阻隔，使作者和一眾獄友在各方面都受到監控與管治。此部分的探討欲以規訓型態為焦點，並從身體、時間、智能監控等面向切入，以期窺探在高科技時代下，在香港入監服刑的樣態跟面貌。

作者論及監獄是一種「全權機構」(Total Institution)，透過全方位掌控囚犯的生活、思想，以達到矯治、改造目的。當獄囚進入監獄，首先得面臨身分的抹去、更新和全面身體檢查。陳健民提到他們先被戴上手銬，接著帶至滿佈鐵枝的羈留室，進而再依序到不同房間進行搜身、檢查私處，此雖是基於保安理由，但也常讓犯人感到羞恥、侮辱；當獄中職員拿著手電筒說「拿起X袋」時，其當下聽不清楚、無法會意，直到說明是「春袋」，才恍然大悟。此處可注意的是，監獄有別於過去所處的大學教育空間，語言用法也隨之不同，這使作者驚覺「難道我期望人家說生物學教科書的『陰囊』嗎？」（《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頁120）。不過，監獄作為管理、矯正空間，措辭理應正式，但職員卻說出讓作者頗為羞赧之語，在在讓該空間混融了神聖、世俗乃至粗鄙之複雜特性；此外，此舉亦展示獄方的觀看權力，迫使囚犯毫無私隱，只能全身赤裸地被檢視，可謂有著物化（Objectification）情況。²⁰

正式入監後，各式生活規範隨之而來，作息皆要循規蹈矩，任意談話亦被禁止或限制，身體之移動則被固定於一方空間。作者論及自羈留所開始，見長官時除了須要問候，亦得整理衣服、單行排好，且手要擺放兩側，不許交握置於身前。另

¹⁸ 全詩為「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

¹⁹ 胡適（1891-1962）晚年為雷震（1897-1979）祝壽時也援引此詩，且在註中闡明這首詩象徵著權威與自由的鬥爭，而此意涵亦是自況，表明其對民主前途的信心。詳參歐陽哲生，《探尋胡適的精神世界》（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頁16。

²⁰ 許彥民、洪富峰以臺灣的嘉義監獄為例，在訪問受刑人後，歸結出他們在獄方職員注視下展現赤裸身體，實揭示其以「非人」、「客體」的方式被看待。詳細內容請參見氏著，〈受刑人的經驗與生活空間：以嘉義監獄為例〉，《地理研究》第74期（2021年12月），頁150-151。

外，獄中每週僅有三次散步時間，地點則在中心地帶的一個排球場，行走空間長度大約45步，故只能來回反覆漫步；又或是獄囚每轉到一個空間，人員皆要重複清點，傍晚從餐廳回到牢房，也都要坐於床上等待夜間人員再次點算後，方能進行盥洗。由此可知，從身體姿勢到路線行蹤，都要在掌握之中，雖是以安全為名，但也展露國家、威權對個體的滲透。²¹然而，該監獄的設施、規劃亦非全然一致，雖然環境髒亂、食物只是為了生存、規訓痕跡無處不在，但陳健民直言其被分配到木工工場，為監獄裡工作環境較佳及工資較高的工種，且「有自設的餐廳和浴室，分配到這裡的囚犯會較少接觸其他工場的獄友」（《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頁30）。獄方在這裡或因其身分有所考量，卻也顯現出強調同質、秩序、控制的空間，還是會因政治、表現、罪刑等複雜因由有不同安排。

空間脫離不了時間，彼此交織，然而在監獄中，時間通常不是囚犯能自由掌控，連帶時間感知也會異於外面社會，故如何思索此異質空間中的時間便顯重要。這類空間經常聯繫於時間切片，朝向異質時間（heterochronism）開放，並有累積或轉瞬即逝的特性，例如墓園、圖書館便是歷史時間的無限堆疊，節慶、展覽、嘉年華則是打破連續時間，倏忽即過。²²若以此概念看陳健民的獄中書簡，除了對行為舉止、活動範圍進行限制，時間的強制安排、設定也是重要特徵。作者述及會面時間尤其難受，也感受時間匆匆流逝，「到職員宣布時間已到時，才記起一些未說的話」（《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頁37）。此外，其亦描寫一天的生活是在吃飯、工作、運動、休息、睡覺中度過，且每個行程、時段都被固定，故能選擇的自由時間幾乎不多。²³

²¹ 監視的歷史某種程度上也是人類的歷史，不論是古典或近代，此舉目標大多無法離開「人口」和「管理」、「權力」，例如宗教防止異端動搖信仰、皇權阻止叛亂與革命，多以此道為之。就「監獄」而言，為避免這些曾擾亂秩序的囚犯再次對社會、國家造成威脅，故才須時時刻刻實行清點、管訓。詳見吳庭毅，《監視社會與犯罪控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2019年），頁5。

²² 參見王志弘，〈傅柯 Heterotopia 翻譯考〉，頁80、李宛璇、蘇文伶，〈異托邦 Heterotopias〉，2009年6月2日英文文學與文化教學資料庫。
（http://english.fju.edu.tw/lctd/List/theoristsWork_Guide.asp?T_ID=27&TW_ID=93），2026年3月13日檢索。

²³ 作息表為：早上6:30起床梳洗並按指定方式收拾被鋪、7:30-9:00吃早餐、9:00-11:00工作、11:00-12:30工作/洗澡/休息、12:30-14:00午餐、14:00-16:30工作、16:30-17:30散步/運動/洗澡、17:30-19:00晚餐、19:00回牢房休息、22:00關燈就寢。（《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頁30-31）

不過，自作息表觀之，獄囚們還是有少許的放風時刻，例如作者在運動時間選擇跑步，這讓他「看到蒼翠的遠山」、「感受到空氣從面頰流過」、「體驗一步一自由」（《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頁73）；又或是每晚休息時聽著「貓仔」（獄中對小型收音機的稱呼）所播放的古典音樂，亦令其感到身心放鬆，為無趣單調的生活增添色彩，並得以「躲進自己的桃花源」（《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頁154），體現出與監獄原先用意截然不同的樣態。甚至，當時剛好處於反送中運動時期，監獄內外卻彷彿存在著一道時差，除了無法接收即時資訊，市民來信往往也要數日後才能收到。這種延遲反而降低作者的心理壓力，並覺得一個人能去面對自己、思考、寫文章，以為如果「時間不是太長的話，坐牢也不是那麼痛苦的一件事」（《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頁242），顯露其對時間的感知已與外界產生落差，甚且模糊、反轉原本異質/正常的界線。²⁴從這些行動或感想看來，可知監獄雖仍在規訓、懲罰和監視的框架之下，卻也有休養生息、鍛鍊體魄之功能，既能阻絕外界紛擾、舒展心志，又非完全與世隔絕，仍可較晚得知社會動態，展現封閉、開放在此混雜、交錯的異質空間特性。²⁵

另外，時間感的抹消亦是監獄議題常被論及之重點。隨著時代演變，時間的測量方式越趨精準，物件也從沙漏、日晷進化到鐘錶、手機，這些器物的發明，無非就是為了讓人們在生活、工作上更加「準時」，並且達致可控地步；²⁶就此論之，現

²⁴ 此處對於「時間」的思索，或可從鄭作或之說來看，其參照德國社會學家諾伯特·伊里亞思（Norbert Elias, 1897-1990）的論述，認為「時間即生活，時間結構即是各個生活運作時間性地協調、交織起來的整體社會型態的結構性表現」。循此回觀《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監獄雖為有別於正常社會的異質空間，時間亦與外界不同步而有時差，但其規律作息卻顯得協調、有序；反倒是那時的香港社會正面臨紛亂失序之境，並使許多人因擔憂、懼怕而生活失調，或是半夜警方和示威者仍在對峙，如此不啻也是處於支離破碎、混亂無章的異質時間之中。引文詳見氏著，〈時間結構的改變與當代時間政治的問題：一個時間社會學的分析〉，《臺灣社會學刊》第44期（2010年6月），頁228。

²⁵ 臺灣版本最後附上「2018-2021 香港大事記&獄中書簡紀要」（《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頁244-259），陳健民受訪時談到這是出版方的編輯意見，並以為「在外面風風火火的時候，我是很安靜在監獄裡面，但兩件事是有互動的。」參見李佩伶，〈陳健民的去留與搖擺：一部片、一行淚、一封信，走出失語泥沼〉，2022年3月8日報導者 The Reporter。（<https://www.twreporter.org/a/interview-kinman-chan-2022-in-taiwan>），2026年3月13日檢索。

²⁶ 郭文華談及在刻度精細的計時器剛發明、引進時，催促上工的汽笛與鐘聲常意味著工廠對職工的控制，而工人因未能掌握儀器，生活作息便不能自由自在與隨心所欲。然而，當習慣象徵時間的聲響或鐘錶報時後，時間卻轉化為爭取工時、工資的參考，並成為切分工作/生活的依據，且使「準時」變成道德與否的判斷標準。詳參氏著，〈遲到不遲到？時刻的文化感知〉，收錄於陳恒安、郭文華、林宜平主編，《科技渴望參與》（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頁183-184。

代化社會中的監獄沒有時鐘，卻又強調守時、紀律，的確是一個很弔詭的情況。陳健民言及在尚未入獄前，由於行政、教學、研究工作繁忙，於是感到時間流逝相當快速。然而，進入監獄後，卻因無時鐘不知確切時間，詢問獄友始了解可能是為了折磨、懲罰，但亦有以為是安全考量，避免裡應外合而逃獄；作者面對此情況，雖覺疑惑和無所適從，不過後來也體悟到他就像浮游在名為時間的海洋，用力掙扎反倒會被吞噬，故「視坐監為人生的留白，像不繫之舟般放輕身段」（《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頁95），如水一般，隨潮流安頓自身，頗有以道家思想應對之意，使監獄生活不那麼緊張。其中的「留白」也意味著能重省自我及尋回生命主導權，將之視為轉圜餘地、契機，跟外面社會的衝突失序實形成明顯對比。²⁷

上述「不繫之舟」的說法呈顯作者隨遇而安卻又不願屈從的情志，這或許也可連結到近年香港社會運動中，不時被援用的「Be Water」概念。該詞源自李小龍（1940-1973）之武術哲學，並於雨傘運動五年後的反送中運動再次被廣泛使用，意指示威者常會戴上面罩或穿著黑色服裝，採用游擊策略閃避指認和追捕，且不會長期待在同一個地方，可以快速結集和解散，具備高度流動性；²⁸劉桂標則認為李小龍受道家影響，使「Be Water」可溯源至老子的「上善若水」，論及對任何處境的靈活變化、不拘一格，無特定形式、形狀及型態。²⁹若循此與《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對讀，雖然陳健民並非如抗爭者於街頭奮戰，然而就像在〈不增不減 安住當下〉一文所示，在獄中肉身雖遭囚禁，無法實際參與逆權運動，但他和戴耀廷、邵家臻、黃浩銘等入獄者實像流水般「以另一形體走上街頭」（《受苦與反抗：

²⁷ 陳健民在受訪中，提及閱讀土耳其作家 Ahmet Altan 於獄中所寫的 *I Will Never See the World Again* 後，發現他也寫到對監獄裡沒有時鐘、鏡子的感受而有所共鳴。陳氏提到久而久之便懂得放開對時間的執念，並想像自己化身為「不繫之舟」在大海漂浮，甚至「不繫之舟」也成為後來在《蘋果日報》發表時的專欄名稱，詳參黃思朗，〈專訪陳健民：不繫之舟，如浪隨緣〉，2020年12月10日虛詞 p-articles。（<https://p-articles.com/heteroglossia/1853.html>），2026年3月13日檢索。關於「不繫之舟」一詞，出自《莊子·雜篇·列禦寇》：「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泛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意指智識會使人憂愁、勞累，無能的人沒有欲求，無所事事彷彿沒有繫上纜繩的船，於汪洋自在遨遊；易言之，此詞強調人應無欲無求，如此才能達至自在境界，這也成為後代詩文常使用之典故。關於此部分之闡釋，參見葛曉音，《山水·審美·理趣》（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7年），頁98。

²⁸ 彭麗君，〈人民作為一種修辭？香港「反逃犯條例運動」中的民主與身分認同〉，《文化研究》第31期（2020年10月），頁155-156。

²⁹ 劉桂標，〈“Be water”與「上善若水」——民主抗爭 2.0〉，2019年7月29日獨立媒體 inmediahk.net。（<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66087>），2026年3月13日檢索。

陳健民·獄中書簡》，頁51），闡明「只要流水有方向，政府以政治檢控加以阻攔，只會徒勞無功」（《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頁52），且透過書寫不斷和外界此呼彼應，讓獄內/外連結（connect），成為彼此支持、對抗壓迫的共同體。

不過，作者在獄中雖已減低對時間的執著，但他後來仍發現工作場地的職員手機能夠顯示確切時刻，透顯科技與監獄之間並非完全隔絕，甚至將之作為控制囚犯身心的重要工具。實際上，在齊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 1925-2017）的《液態現代性》中，以傅柯的「全景監獄」（Panopticon）概念為基礎，提出「後全景式權力關係」（post-Panoptical）之說，前者重點是負責人被假定始終就在附近或控制塔，後者的關鍵則為操縱權力搖桿之人任何時候都可不受接觸，卻能隨心所欲決定無法移動的獄囚/他者命運。³⁰若以此概念回觀陳健民筆下的監獄，也許可從布置於該空間的「攝錄機」、「電視機」等器械切入，了解現代科技如何成為維護紀律/監控身體/灌輸意識形態的工具。

例如作者述及他們所處的壁屋監獄被當成「智能監獄」示範單位，並設立監視機器以避免獄友聚集賭博跟爭執滋事，或是長時間沒動作（如自殺）也會發出警報。以此來說，這些機器可用來偵測個體的生命狀態與任何舉動，似乎具有高度效能；不過，也有獄友以為這是侵犯個人私隱，讓他們連極度私密的如廁行為也無法感到舒適自在，而「所方卻保證錄影時囚犯的私處會打上馬賽克」（《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頁31），但最後如何處理，卻也不得而知。³¹

電視機雖無攝錄功能，卻是囚犯接收時事的重要管道，因監獄無法使用手機，於是只能從電視新聞了解外界的最新消息。作者談到獄友情緒會隨新聞畫面起伏，最初看到反送中示威者向警察丟擲物品會全場歡呼，後來卻逐漸麻木，甚至開始批評抗爭者無法無天、胡作非為，這讓作者不解和深刻體驗到「沒有網際網路，單靠TVB和《東方日報》塑造的是怎樣的一個世界。」（《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頁123）。這裡姑且不論為何獄友會開始感到麻痺乃至批評，但陳健民深諳媒

³⁰ 波蘭·齊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著，陳雅馨譯，《液態現代性》（臺北：商周出版，2018年），頁47。

³¹ 張美陵論及傅柯認為權力會以擴散、滲透方式，作用於日常生活中最微小的事情上面，而攝影的發明、運用更是能夠細膩地深入各個層面。攝影作為真實證據，使其在監獄、醫院、精神病院、收容所等機構佔有重要地位，且成為監視和控制的工具，讓被拍攝者變成彷彿客體的他者。詳見氏著，〈攝影真實與社會身體的監控〉，《中外文學》第31卷第12期（2003年5月），頁74。

體傳播之力量，並說明監獄裡獲取資訊的途徑僅為TVB跟《東方日報》，而這兩個傳媒多被目為親中立場，³²對示威者也常有批評，故擔心眾人被錯誤或偏頗觀點左右，而此亦呈現監獄作為既封閉但又開放外界訊息進入的異質空間，實具有嚴密的把關、審查、過濾機制，深深影響獄中囚犯的認知思維。

綜合言之，陳健民所在的壁屋監獄（進一步可擴至香港所有監獄）基本上仍承繼以往對此類場域的討論，即自身體、心理到思考方式均有全方位的控管；然而，監獄作為異質空間，神聖的規訓權力和世俗的應對抵抗於此處混融，且時間感知也異於外界而遭到強制抹消，並帶給作者在此處沉澱、靜思乃至安頓身心的可能，可謂展現秩序/失序、管治/抵禦/任性自適交雜的多元樣態。

三、堂堂溪水出前村：以閱讀為方法

陳健民不時在獄中書簡提到其雖面對囹圄之災不得自由，但也讓他有著可以運用的時間，甚至將此次際遇視為如學者難得的安息年（Sabbatical）。³³最終，透過閱讀，其得以安頓自我，並援引聖經典故「如鹿切慕溪水」，自比「像在草原終日奔跑的野鹿，切慕到溪邊喝水，將書架上的書本讀透」（《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頁62）。這裡作者把「閒書」喻為溪水，認為即使在惡劣環境中，仍能穿越高牆鐵窗在思想的天空翱翔，流露出任性而行的生命韌性。而且，其亦協助不少因佔中或反送中運動入獄者開列書單，使他們在獄中不至於無聊，由此顯見「閱讀」對

³² 例如區家麟提到 TVB 於香港免費電視市場佔有八到九成的收視率，是市民獲得資訊的主要來源；但在雨傘運動後，則被不少網民譏為「CCTVB」，嘲諷其政治立場與中國的中央電視台（CCTV）如出一轍，顯見該臺的親中立場，詳見氏著，《二十道陰影下的自由：香港新聞審查日常》（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 年），頁 88-89。另外，根據李立峯考察，2019 年 8 到 11 月反送中期間，呼應中國與特區政府「止暴制亂」論調之媒體，以《文匯報》、《大公報》超過兩千篇報導文章為最多，且一千三百篇以上論及示威者之激烈、破壞行徑；《星島日報》、《東方日報》則有近九百篇提到「止暴制亂」，大約一千篇有提到毀壞、激進行為。綜合來看，《星島日報》與《東方日報》即使不如《文匯報》、《大公報》極為親近當局政權，但至少也是傾向於特區政府和建制派，詳細內容請參見氏著，《後真相時代的社會運動、媒體，和資訊政治：香港反修例運動的經驗》，《中華傳播學刊》第 37 期（2020 年 6 月），頁 14-15。

³³ 何丙郁（1926-2014）提及以前在英國殖民地的大學，服務滿六年後就享有一年帶薪休假、出國做研究之待遇，此種假期便稱為「sabbatical leave」，反映以色列人在每第七年要休耕讓土地休養生息的傳統。參見氏著，《學思歷程的回憶：科學·人文·李約瑟》（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2006 年），頁 47。

知識分子來說，實是在充滿規訓、教條的監獄中，能夠維繫、保有思考的重要方式。³⁴

在《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中，作者開出了「獄中書單」，除了羅列在獄中閱讀的書籍，亦談及讀後心得，就類別而言，諸如傳記、歷史、文學、宗教、藝術等領域均含括其中，涉獵相當廣泛。然而，可進一步思索的是，作者閱讀的書籍內容、題材，是僅止於認識新知、增廣見聞，還是別有用心、具有寄託？若從潘光哲對「士人閱讀」的論述來看，應能有一些發想：

士人讀書求知的世界的疆域，得以不斷擴張，曾無止境，他們藉由閱讀致知，博學窮理，撰文言思等等活動，從而連鎖引發展現的思想圖景，卻非理所當然或是勢所必至的事。創建「知識倉庫」，合眾力為力，集眾智為智而成，本即導源於錯綜複雜的因素；驅策士人必須步入這方天地，拓展自身的閱讀世界，調整改變一己的讀書習慣，其動力根源之所在，更是千樣萬態。閱讀展卷，或是事關一己的人生前途，或是身感世變奇局而籌擬因應之道，或是心憂國族存亡而發願構想未來，甚或僅僅是由於喜歡博覽群籍乃至以坐擁秘本而可炫奇賽珍的雅癖嗜好而已。³⁵

³⁴ 例如黃之鋒在2019年5月因2014年佔領旺角期間違反禁制令，以藐視法庭罪被判入獄，期間便閱讀了《大債時代：第一本看懂全球債務危機的書》、《錢買不到的東西：金錢與正義的攻防》、《策動：引燃文明與衝突的50場關鍵演說！改寫歷史的人，是在鼓舞，還是煽動？》等書，參見陳怡靜、李桐豪，〈【反送中香港直擊】黃之鋒獄中看什麼書《錢買不到的東西》《大債時代》〉，2019年6月17日鏡週刊 Mirror Media。

(<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190617pol002/>)，2026年3月13日檢索。因重奪「公民廣場」案被判刑的羅冠聰，則分享其閱讀吳叡人《受困的思想：臺灣重返世界》、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政治秩序的起源》以及談文革病史的《牛鬼蛇神傳》，參見〈【獄(十)：閱讀時光】〉，2018年6月5日方格子 vocus。

(<https://vocus.cc/article/5b166f2dfd89780001464c94>)，2026年3月13日檢索；又或是香港作家鄧小樺在反送中運動期間也已經預備好《追憶似水年華》、《世說新語》和《刺殺騎士團長》等獄中書單，並認為書實為獄中人的精神支持，參見許文貞，〈無書不歡！鄧小樺備好入獄書單〉，2020年3月6日中時新聞網。(<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00306000877-260115?chdtv>)，2026年3月13日檢索。

³⁵ 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一八三三～一八九八)》(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21年)，頁24。

陳健民身為政治、社會學者，從事研究、教學本來就會接觸眾多書籍，其亦提到過往大多閱讀關乎民主思潮、社會運動、公民社會、當代中國之書，卻因為入獄契機，使他改變過往慣習，「想看一些久違了的『閒書』」（《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頁211）。但是，雖曰「閒書」，卻也跟時局變易、歷史環境、政治思辨、抵抗行動有關，故不能等閒視之。何明修認為作者所列書單並無一本與香港相關，主要是傳統的人文學科，並聚焦於人類存在之終極價值的討論，有類似「荒島唱片」之意涵。³⁶不過，或許這些書籍不只是叩問人類的存在意義而已，這座結合歷時性與共時性所搭建的「知識倉庫」（stock of knowledge），³⁷與香港應也有千絲萬縷的關聯，並讓監獄仿若圖書館一般，成為堆疊歷史時空的異質空間。

在臺灣版的序言〈波平浪靜處安身〉中，作者論及在出獄後，同為佔中三子的戴耀廷跟他說有許多事仍待其推動，但「徘徊在我腦海的卻是曾國藩和林獻堂的幽靈」（《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頁10）。此實為一句值得玩味的話語，即陳健民在獄中並非只讀這兩人的作品，但為何會是其幽靈纏繞於腦際？曾、林二人對作者乃至反送中時期、之後的香港（人）意義何在？這些均是筆者欲探討的重點，下列分別陳述之。

（一）在波平浪靜處安身：時代心境的對接

作者談到在獄中閱讀唐浩明所著的歷史小說《曾國藩》，內容述說此位晚清大臣在中年後經高人指點，勸他「莫從掀天揭地處著想，要在波平浪靜處安身」（《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頁9）。這兩句話雖出自小說創作，非實際發生過的史實，卻也讓陳健民感同身受跟產生共鳴，並想到其戮力為中國打造公民社會和爭取香港實行民主普選，最後卻都徒勞無功，歷經百般挫折，甚至惹禍上身，故倒不如遵循此語，先忘卻外界紛擾，把監獄當成暫時安身之處。依此亦可知，陳氏實以身心安頓作為閱覽此書的重點，而非著重在曾國藩（1811-1872）當時的豐功偉業。

³⁶ 「荒島唱片」意指若餘生要被流放在某個荒島，自己會帶哪些唱片伴隨？易言之，所攜帶者乃為自身最推崇或認為可以受用一生之物品。參見何明修，〈監獄中的社會學家——讀陳健民《獄中書簡》〉，2022年3月17日聯經思想空間 Linking Vision。（<https://www.linking.vision/?p=9695>），2026年3月13日檢索。

³⁷ 潘光哲以晚清士人為探討對象，認為他們在西潮來襲之下，閱讀內容開始從聖賢言說、古籍經典轉向各式的西學書籍、新式報刊，有如打開一道更為廣闊的知識窗口，以探究世變由來或思考因應之道，而眾多新知、學問的匯聚，便構成一座包羅萬象的「知識倉庫」。詳見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一八三三～一八九八）》，頁7-8。

若以此為線索再進一步考察，可發現作者似乎特別喜愛閱讀晚清歷史，例如他閱讀唐德剛（1920-2009）的《晚清七十年》和林毓生（1934-2022）《中國意識的危機》、余英時《歷史與思想》等，當中不約而同論及處於劇變時期的晚清民初知識分子如何在新/舊、東/西文化、潮流之間掙扎；此時或許值得參照的問題，便是那些人如何面對這種困窘、矛盾之境況？是以，作者又閱讀容閔（1828-1912）《我在中國和美國的生活：容閔回憶錄》跟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20年》，以了解二人的處境和心志狀態。

容閔多被視作中國第一位留美學生，畢業於耶魯大學，回國後曾冒險行船將滯留於太平軍控制地區的百多萬箱茶葉運出；後來，建議晚清當局以官費派遣學童出國，但有官員向朝廷指謫留學生「受西方思想荼毒、數典忘祖，最終清政府下令腰斬留學計畫」（《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頁137），容閔自此亦受冷落；其後響應維新運動，變法失敗隨即去國，根據《西學東漸記》載錄，其路經臺灣時曾受日本駐臺總督兒玉源太郎（1852-1906）召見，並且無懼地凜然赴會，表現處變不驚之姿態，甚至認為此行「與日本臺灣總督之談話，實為予一生最可紀念之事」。³⁸ 陳健民欣賞容閔在生死交關之際臨危不亂的氣度，進而思及香港的反送中、逆權運動，提到許多人也如容閔一般，面臨危難時刻卻毫無驚懼，政府官員則如容閔船隊的隨員一般面無人色，甚至緊急推行、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以摒除境外勢力的干預，情境仿如拒絕與外界開放連結、溝通往來的晚清時期。³⁹

至於陳寅恪，作者述及其推崇「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擁有「與華夏文化共浮沉」的念想（《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頁110），故留在中國而沒有

³⁸ 清·容閔，《西學東漸記》（長沙：岳麓書社，2015年），頁129。王智明也提及容閔代表留學生之原型，體現中國接觸西方的欲求，但亦常遭質疑過度西化或有叛國嫌疑；因此，對他們來說，西化是祝福也是詛咒，朝向知識、現代性的留學道路最終卻可能成為不歸路。詳參氏著，〈翻譯的生命：容閔、留學與跨國主體性〉，《歐美研究》第39卷第3期（2009年9月），頁478-479。

³⁹ 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香港正也宛如容閔，常被中國質疑受到西方勢力煽動，彷彿背負某種原罪，在反送中運動期間，此更是成為官方主要論調，相關新聞可參見〈香港反送中衝突 中國官媒竟稱西方勢力煽動〉，2019年6月13日自由時報電子報。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820733>），2026年3月13日檢索。另外，馬嶽亦認為「美國直接介入以及把香港事務與貿易戰等掛鉤，還有香港政界直接遊說美國及其他國家制裁中國」，均是導致中共迅速設立國安法的重要因素，參見氏著，《反抗的共同體：二〇一九香港反送中運動》，頁215。

到海外任教；然而，其晚年失明、斷腿，又逢文化大革命，常遭紅衛兵批鬥，可說是相當痛苦和淒涼。⁴⁰不過，他在苦難中仍寫出《論再生緣》、《柳如是別傳》，既以詩證史又寄託憂傷之情。就張思靜考察，《論再生緣》主要是考釋清代長篇彈詞小說《再生緣》的學術著作，而寫作當時陳寅恪已年過六旬，使得在理性研討之際同時含有發抒個人情感、懷舊、紀念、反思等諸多功能，與紛亂時代有莫大聯繫；⁴¹《柳如是別傳》則研究明末清初名妓柳如是（1618-1664）和夫婿錢謙益（1582-1664）間的愛情生活與詩文創作，並對柳氏評價極高，余英時認為此著作除了藉由錢、柳姻緣以求索明清的易代歷史，也蘊含他在晚年的遭遇跟感慨，可謂別有懷抱。⁴²陳健民論及雖然陳寅恪在政治運動中遭多次欺侮，但其超然的學術地位及堅定態度，正是當時香港眾多志士的寫照，並以雨傘運動時期常見的標語——「生於亂世，有種責任」⁴³串接起各自的時代和心境，隱含著對中國政權的批判意識。

(二)亂邦不居？臺灣經驗的參照

對於另一位「幽靈」——林獻堂（1881-1956）之看法，作者提到林氏資助「臺灣議會請願運動」、爭取設立民選議會和臺灣文化協會，以及啟迪民智、普及教育等種種作為，實對臺灣具有貢獻；然而，二二八事件後，卻被列為叛逆名冊的首要位置，使其對國民黨徹底失望而遠走、客死日本，令人不勝唏噓。蔣介石（1887-1975）來臺後，曾多次派員向林獻堂遊說，但得到的回覆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是聖人教訓」（《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頁109），展現其抵禦、不從心志，

⁴⁰ 1969年春節後，陳寅恪一家被趕出門，當時他的身體已相當虛弱，後來又常被當權者要求做口頭交代，故發出「我現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語，當年十月便溘然長逝。參見岳南，《陳寅恪與傅斯年》（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頁473。

⁴¹ 張思靜，〈方法·視野·文化脈絡：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論再生緣》〉，《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55期（2012年7月），頁247。

⁴² 劉正，《陳寅恪別傳》（臺北：元華文創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頁319。

⁴³ 此乃香港歌手何韻詩在2005年向梅艷芳（1963-2003）致敬時，所演唱的歌曲《艷光四射》中之歌詞，而梅艷芳在香港人的認知中，又是敢說真話、擁有良知的女俠，故具有反抗威權、爭取公義之象徵意涵。詳參李展鵬，《夢伴此城：梅艷芳與香港流行文化》（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9年），頁219。

以及對當權者之疑慮。⁴⁴陳健民將此種情況以「花果飄零」視之，並連結到當前香港處境，即許多人因不能忍受我城的每況愈下移民他鄉，但看到運動示威者們被無情、殘酷對待，又無法接受而感到痛苦，甚至產生愧對之心；不過，作者認為林獻堂退隱日本雖是心安理得且得以避禍，但又深思「今天中國和香港已是天下無道，讀書人應否如林獻堂般退隱？」、「如果讀書人只見於天下有道，誰來匡扶正義、力挽狂瀾？」（《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頁109）。就此來說，可推知陳健民雖景仰林獻堂，卻不完全認同其作為，興許這也帶出「花果飄零」後的次句——「靈根自植」之意蘊，⁴⁵意指港人即便被迫離開家園、遷移他方，但在精神與實踐上卻能透過如重組社群、連結資源、學術探究等方式，將漂泊無依轉化為重新扎根的行動動能，如同陳健民於臺灣講學、創辦學會和進行香港研究般，持續與留港者一齊奮鬥，使「生於亂世，有種責任」的信念，在世界各地開枝散葉、彼此共振。

作者在獄中不僅透過《百年追求：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三卷⁴⁶認識到林獻堂之事蹟，也了解到何春木（1922-2017）、陳文成（1950-1981）、林義雄等人的苦難經歷。不過，作者在〈抗爭者家人的苦楚〉中，提到其更「特別留意到這些抗爭者的家人承受的痛楚」（《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頁66），例如何春木的女兒、陳文成之父親和林家滅門血案中倖存的大女兒等，並對應到自己年邁的母親和眾多示威人士之親屬；慶幸的是，陳健民母親甚為堅強，且提醒大丈夫敢作敢為，始讓作者放下心中大石，能較為安心地坐監。

如果再著眼於書籍性質和獄中審查機制的關聯，可發現香港與中國之間存有差異。已經移居臺灣的銅鑼灣書店創辦人林榮基曾談及他「被失蹤」、關押在中國時

⁴⁴ 張惠珍考察林獻堂的《東遊吟草》及《灌園先生日記》，提及其不願苟同國民政府之獨裁、貪腐作為，加上對人身安全與自由有所疑慮，遂成為林氏留日不欲歸返臺灣的重要原因。參見氏著，〈林獻堂與民國——以《灌園先生日記》、《東遊吟草》為考察對象〉，收錄於李怡、張堂錡主編，《民國文學與文化研究》第三輯（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12月），頁273。

⁴⁵ 根據黃冠閔所論，1961年唐君毅（1909-1978）發表〈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言明中國的文化、人心、政治皆已解體，顯得絕望且漂泊無依；然而，1964年又發表〈花果飄零及靈根自植〉，提到若要跨越絕望、苦痛之境，便要反省、自覺和擁有信心與希望，以產生積極且有創造性的理想跟意念。參見氏著，《感通與迴盪：唐君毅哲學論探》（新北市：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頁42-45。

⁴⁶ 陳健民閱讀的是2013年衛城出版之版本，三卷分別為陳翠蓮《自治的夢想》、吳乃德《自由的挫敗》、胡慧玲《民主的浪潮》。後因絕版而改由春山出版於2020年再版，並易名為《自治之夢：日治時期到二二八的臺灣民主運動》、《臺灣最好的時刻，1977-1987：民族記憶美麗島》、《臺灣之春：解嚴前的臺灣民主運動》。

不能放風、親友不許前來探望，閱讀書籍亦百般刁難，在其不斷央求下，僅能看兒童版的《紅樓夢》，且遭要求「寫一些懺悔、自我檢討的文書」，⁴⁷對於意識形態的抹除/灌輸可謂不遺餘力。至於陳健民則較幸運，除了能讀關於臺灣民主運動歷史之書籍外，書單裡更赫然可見高華（1954-2011）《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此本禁書，⁴⁸姑且不論是職員未知其性質，抑或以為可以/故意放行，實可見獄方管控的嚴格程度與中國似乎仍然有別。而且，若將此情形和「異質空間」扣合，在安置犯罪、思想偏差者的矯正空間中，竟可容納當權者視作威脅的「異見」，使監獄的管束及擾動兩股力量互相頡頏，顯現出井然有序卻又斷裂雜亂之特性。

黃宗儀觀察到「近年，台灣的太陽花運動和香港的雨傘運動乃至晚近的『反送中』皆集聚了巨大的社會能量，深刻地影響了青年一代的文化政治意識，這些運動即是對於跨區域往來過程中自身困境的理解與行動」。⁴⁹其實，不只是青年，從陳健民此種資深學者乃至香港、全世界關心的大眾，無論身體、政治、文化、心理或價值觀皆受到深遠影響。雨傘運動、反送中運動作為香港極為重要之事件，該如何看待作者的閱讀與這些社會運動之間的關聯？若從這部分的討論來看，可了解陳健民著重在晚清民初中國和臺灣知識分子的艱困處境與飄零心境，有歷時性的對接，也有跨地域的參看，並從對於這些經驗的思索中回觀香港。是以，作者雖身陷如萬山圍繞般的威權、規訓空間，但思想卻是無法被禁錮，更透過閱讀任性地「跨越高牆，穿梭於歷史不同時空、沉思在宇宙人生的課題中」（《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頁12），彷彿具有水流般的動能，揭示出「堂堂溪水出前村」的堅韌力量。

⁴⁷ 思想空間編輯部，〈陳健民X林榮基：安住當下，常懷希望，以讀書超越一切高牆〉，2022年6月19日聯經思想空間 Linking Vision。（<https://www.linking.vision/archives/12370>），2026年3月13日檢索。

⁴⁸ 根據鄭明仁之說，高華在八十年代初期已開始研究延安整風運動，1991年起撰寫《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2000年由中大出版社出版，後來繁體版重印22次，簡體版9次，銷量超過10萬冊；但當中國收緊言論自由，此書便無例外地成為禁書，不可公開攜帶。詳參〈大陸學者爭讀的禁書〉，2020年3月7日灼見名家 Master Insight。（<https://www.master-insight.com/article/17947>），2026年3月13日檢索。

⁴⁹ 黃宗儀，《中港新感覺：發展夢裡的情感政治》（新北市：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頁299。

四、結語：「同路人」的意義

本文探討《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的監獄空間和閱讀之道，並以「萬山不許一溪奔」、「堂堂溪水出前村」等楊萬里之詩句貫串本文各部份的討論，以期呈顯作者在面對囹圄禁錮時如水任性流動一般的特性。關於監獄的懲治、規訓特徵，前人已有不少研究，特別是傅柯之說，更是眾多論者探討相關作品時的重要途徑和方法。本文雖不外乎此道，但因時空環境不同，連帶使體驗、應對心態也有差異。在以陳健民為個案的研討中，可知這個空間裡，其生活作息、時間感、資訊接收管道即使受到獄方的嚴密掌控，但實際上卻也能以跑步、閱讀、聽音樂等方式安頓自我，且讓思想得以延展出鐵窗之外，與外界結合、連動。甚且，反轉原先設立的管治、訓導目的，即獄中那套旨在規範、矯治的「有序時空」，被作者轉化為安頓主體、蓄積精神動能的緩衝地帶，與紛擾、充滿催淚彈的外界形成強烈對比。就此言之，看似靜態、隔絕的空間，實蘊有多種意義，且疊合不同的歷史時間、人物懷想，展現出紛雜混融的異質特徵。⁵⁰

陳健民除了對監獄此類空間有所思辨，其在獄中的「閱讀」實踐亦值得關注。經由第三部分的析論可知，他透過文學、哲學、歷史、宗教和藝術等平時較少涉獵的領域，擴展自身見聞及思想深度；但是細察書中所述和陳列之書單，當中實含藏著情志懷抱跟抵抗意圖。作者特別指出曾國藩、林獻堂這兩位歷史幽靈不時縈繞著自己，且進而提及容閔、陳寅恪、蔣渭水、何春木、陳文成、林義雄等中國/臺灣之人物。將之歸納、統整後，便能知曉這些人皆處於時代洪流裡的巨大變局或高壓統治之下，諸如日本治臺、晚清傾圮、辛亥革命、十年浩劫、白色恐怖等等，他們因應時局的態度雖然各異，但大抵皆是處變不驚、奮勇抗禦，甚至寧死不屈，拒絕向日方、滿清、共產和國民政府等威權體制低頭。若審視陳健民的寫作意蘊，則可推論其欲對接到當前境況，藉此鼓勵自己跟尚在為家園奮鬥的港人，要在滔天巨浪中

⁵⁰ 法國的加斯東·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提及「水把各種形象聚合在一起，溶解實體，在想像的非客觀化使命中，在它的吸收使命中，幫助了想像。水還帶來了一種句法結構，形象的持續連貫，以及形象的溫和的運動，這種運動激發同事物連在一起的遐想。」參見氏著，顧嘉琛譯，《水與夢——論物質的想像》（長沙：岳麓書社，2005年），頁14。如果以此說反觀陳健民的經歷與作為，可知他在監獄中透過閱讀與想像的流動，還有持續抵抗霸權之不懈意志，將晚清、臺灣和當下香港的經驗結合、匯聚在該空間。

找尋安身立命、調適自身之所在，且縱使流徙四方，香港精神⁵¹也將根植各處，不會煙消雲散。

最後，應當叩問與說明的是，陳健民的獄中書簡究竟可以為我們帶來什麼意義？下列論述應能給予一些思考：

統治者為對治其思想帶有「法定傳染病」之異議者，亦為杜絕相關疫情繼續擴散，須廣設監獄以納之，如此一來，便也阻斷政治異議者之集體社會記憶，唯其往往不甘被嚴酷的監獄所蒸發，而想留下「失蹤」歲月的「在場證明」——或希藉此超脫其存在困限，故而孜孜矻矻將其牢獄生活、經驗，透過文學抑或藉由講述、回憶、自傳、傳記等方式表現出來，並經公開刊登或出版，形成一種辨證後的社會集體記憶……⁵²

作者之所以入獄，除了是違反香港律法外，或許官方更重視、恐懼的是其對群眾的影響力、號召力，因此須懲治、隔離以殺雞儆猴；然而，其藉著書寫、刊登和出版，向大眾公開獄中的生活點滴，此舉當然並非只有純粹的保存、記錄或分享意義，而也涵納強烈的政治性，使得在獄中閱讀的書籍與所思所想，形成香港社會集

⁵¹ 陳健民在 2019 年 4 月法院審結「佔中九子案」前夕，於香港電台專訪中談到「即使最後要入獄，也不會擊倒他們，要將獅子山的艱苦奮鬥和爭取民主結合起來，咬住牙關走出監獄繼續這場運動」，可見他把追求民主之舉和香港著名山峰及地標——獅子山對應，使該山具有象徵涵義，引文參見〈陳健民：咬住牙關走出監獄繼續運動〉，2019 年 4 月 8 日信報財經新聞。（<https://reurl.cc/6GykA5>），2026 年 3 月 13 日檢索。循此深究，黎國威述及香港電台於 1970 年代製作的電視劇《獅子山下》和顧嘉輝作曲、黃霑填詞、羅文演唱的同名主題曲〈獅子山下〉，切合當時資源匱乏的香港人努力向上流動的社會現象，使「獅子山」成為代表「香港精神」之重要符號；然而，黎氏亦提醒「獅子山」意涵會隨不同年代的政治環境或事件轉變，甚或被不同立場的集團或人們（包含政治權威、親建制團體、民間社會等）挪用為意識形態再造的原材料，故須慎思明辨，詳參〈「獅子山」：歷史記憶、視覺性與國族寓言〉，《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第 161 期（2017 年 6 月），頁 85、99。

⁵² 王健國，《百年牢騷：台灣政治監獄文學研究》，頁 348。

體記憶 (collective memory)⁵³的一部分。例如作者提到《陳健民獄中書簡》出版後，許多人至獨立書店等候簽名，觀察到「等的時候，他們旁邊的人、前面的、後面的人，都是同路人，在排隊的時候，好像互相在安慰對方」（《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頁240），在如《國安法》及警政的權威陰影下，這些「同路人」恍若成為一個相互慰勉的共同體，如李立峯所言，此在環境轉變時能「在某些社會領域中保存自由民主等價值理念，維繫對威權政體的批判意識」，展示不屈從且具有韌性的毅力與姿態。⁵⁴另外，香港並非只有陳健民因政治運動入獄，前述的黃之鋒、羅冠聰等人亦然，至於因反送中運動入獄者更是增加許多，其中有採取激烈抗爭手段的「衝衝子」——勇武派與講求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和理非」，作者在獄中體認到其雖為「和理非」始作俑者，卻也能理解勇武派之立場，以為齊頭並進才是「民主運動的常態」（《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頁102）。⁵⁵於是，二者如何在香港社會的裂變下面對、因應跟記錄，以及閱讀哪些書籍、從事何種活動以表心志，實是自此可再衍伸之論題，以觀察這些抗爭者將形塑何種新的集體記憶及行動型態。

⁵³ 楊孟軒以為此概念一般多被視為由法國社會學家 Halbwachs (1877-1945) 在 1925 年提出，主要關注一個群體所享有的記憶如何被身處的國家、社會環境及時代背景形塑，即彼此間雖是不同個體，卻可能對文化、風俗、價值觀、歷史或社會事件有著類似、共同想像。蕭阿勤則論及 Halbwachs 認為個人記憶是社會所建構，是社會現行的、共同的關懷引發人們對過去的回憶，且不同團體或立場便可能有截然不同的集體記憶。楊氏之說，詳參〈歷史記憶與記憶的歷史：創傷、情感、牽連性與和解〉，收錄於許家馨主編，《歷史記憶的倫理：從轉型正義到超克過去》（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4 年），頁 266-267；蕭氏之論，見於〈集體記憶理論的檢討：解剖者、拯救者、與一種民主觀點〉，《思與言》第 35 卷第 1 期（1997 年 3 月），頁 251-252。

⁵⁴ 李立峯，〈民主倒退中的香港社會韌性〉，收錄於梁啟智、吳介民主編，《巨浪後：國安法時代的香港與香港人》（新北市：左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25 年），頁 220。

⁵⁵ 又如曾任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長，後來流亡加拿大的周堅峰憶及 2019 年之前，主張「和理非」的泛民、左翼社運跟本土勇武派常將對方視為扯後腿的存在；但在反送中運動後此種關係卻逐漸轉變，雖然可能多少是因應當下政治需求產生的策略性說詞，不過也代表不同陣營、世代間有了同理之心，開始懂得接納彼此對香港過去、未來之多元想像，並調度包含記憶在內的各種資源，以期與強大威權周旋。詳細內容參見周堅峰，〈變動的雨傘記憶 不變的抗爭意志〉，收錄於張燦輝主編，《傘後拾年：夏慤村的未圓夢》（臺北：一八四一出版有限公司，2025 年），頁 96-97。

參考文獻

（一）傳統文獻

清·容閔，《西學東漸記》（長沙：岳麓書社，2015年）。

Yung Wing. *Xixue Dongjian Ji*. Changsha: Yuelu Publishing House, 2015.

（二）近代論著

法國·加斯東·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著，顧嘉琛譯，《水與夢——論物質的想像》（長沙：岳麓書社，2005年）。

Bachelard, Gaston. *Water and Dreams: An Essay on the Imagination of Matter*. Translated by Gu Jiachen. Changsha: Yuelu Publishing House, 2005.

法國·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著，王紹中譯，《監視與懲罰：監獄的誕生》（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

Foucault, Michel.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lated by Wang Shaozhong. Taipei: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 2020.

波蘭·齊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著，陳雅馨譯，《液態現代性》（臺北：商周出版，2018年）。

Bauman, Zygmunt. *Liquid Modernity*. Translated by Chen Yaxin. Taipei: Business Weekly Publications, 2018.

李展鵬，《夢伴此城：梅艷芳與香港流行文化》（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9年）。

Lei Chin Pang. *Dream and the city: Anita Mui and Hong Kong popular culture*.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Hong Kong), 2019.

李育霖，《擬造新地球：當代臺灣自然書寫》（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年）。

Li, Yu-lin. *The Fabulation of a New Earth: Contemporary Taiwanese Nature Writing*.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2015.

何丙郁，《學思歷程的回憶：科學•人文•李約瑟》（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2006年）。

Ho Peng-Yoke. *Reminiscence of a Roving Scholar: Science, Humanities and Joseph Needham*. Singapore: Global Publishing, 2006.

岳南，《陳寅恪與傅斯年》（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

Yue, Nan. *Chen Yinke and Fu Sinian*. Taipei: Yuan-Liou Publishing, 2009.

區家麟，《二十道陰影下的自由：香港新聞審查日常》（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年）。

Au, Ka-lun. *Twenty Shades of Freedom: Media Censorship Routine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17.

馬嶽，《反抗的共同體：二〇一九香港反送中運動》（臺北：左岸文化，2020年）。

Ma, Ngok. *A Community of Resistance: 2019 Hong Kong Anti-Extradition Movement*. Taipei: Left Bank Publishing, 2020.

梁啟智、吳介民主編，《巨浪後：國安法時代的香港與香港人》（新北市：左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25年）。

Leung, Kai-chi, and Wu Jiemin, eds. *After the Great Wave: Hong Kong and Hongkongers in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Era*. New Taipei City: Left Bank Publishing, 2025.

張燦輝主編，《傘後拾年：夏慤村的未圓夢》（臺北：一八四一出版有限公司，2025年）。

Cheung, Chan-fai, ed. *Ten Years after the Umbrella Movement: The Unfulfilled Dreams of Harcourt Village*. Taipei: 1841 Publishing Co., Ltd, 2025.

許家馨主編，《歷史記憶的倫理：從轉型正義到超克過去》（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4年）。

Hsu, Chia-hsin, ed. *The Ethics of Historical Memory: From Transitional Justice to Overcoming the Past*.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2024.

陳健民，《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新北市：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

Chan, Kin-man. *Suffering and Resistance: Prison Letters of Chan Kin-man*. New Taipei City: Linking Publishing, 2022.

陳芳明，《美與殉美》（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

Chen, Fang-ming. *Beauty and Martyrdom for Beauty*.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2015.

陳恒安、郭文華、林宜平主編，《科技渴望參與》（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

Chen, Heng-an, Kuo Wen-hua, and Lin Yi-ping, eds. *Engaging the Public: An STS Reader*. Taipei: Socio Publishing, 2009.

黃宗儀，《中港新感覺：發展夢裡的情感政治》（新北市：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

Huang, Tsung-yi. *Hong Kong–China New Sensibility: The Politics of Emotion in Dreams of Development*. New Taipei City: Linking Publishing, 2020.

黃冠閔，《感通與迴盪：唐君毅哲學論探》（新北市：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

Huang, Kuan-min. *Affectivity and Resonance: Studies on Tang Junyi's Philosophy*. New Taipei City: Linking Publishing, 2018.

黃文成，《關不住的繆思：臺灣監獄文學縱橫論》（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

Huang, Wen-cheng. *The Muse Unconfined: A Study of Taiwanese Prison Literature*. Taipei: Showwe Information, 2008.

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

Huang, Chin-lin. *History, Body, Nation: The Formation of the Body in Modern China*.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2001.

- 葛曉音，《山水·審美·理趣》（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7年）。
- Ge, Xiao-yin. *Landscape, Aesthetics, and Principle*.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Hong Kong), 2017.
- 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一八三三～一八九八）》（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21年）。
- Pan, Kuang-che. *In Search of Western Learning: A History of Reading in Late Qing China (1833-1898)*. Taipei: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2021.
- 劉正，《陳寅恪別傳》（臺北：元華文創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
- Liu, Zheng. *An Alternative Biography of Chen Yinke*. Taipei: Yuanhua Cultural Creative, 2020.
- 歐陽哲生，《探尋胡適的精神世界》（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
- Ouyang, Zhe-sheng. *Exploring Hu Shi's Spiritual World*. Taipei: Showwe Information, 2011.

（三）期刊論文

- 王志弘，〈傅柯 Heterotopia 翻譯考〉，《地理研究》第 65 期（2016 年 11 月），頁 75-105。
- Wang, Chih-hung. "The Translation of Foucault's Heterotopia."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Research* 65 (November 2016): 75-105.
- 王智明，〈翻譯的生命：容閔、留學與跨國主體性〉，《歐美研究》第 39 卷第 3 期（2009 年 9 月），頁 455-488。
- Wang, Chih-ming. "Life in Translation: Yung Wing, Study Abroad, and Transnational Subjectivity."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39, no. 3 (September 2009): 455-488.
- 李立峯，〈後真相時代的社會運動、媒體，和資訊政治：香港反修例運動的經驗〉，《中華傳播學刊》第 37 期（2020 年 6 月），頁 3-41。
- Lee Lap Fung. "Social Movements, Media, and Information Politics in the Post-truth Era: The Experience of Hong Kong's Anti-Extradition Bill Movement."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7 (June 2020): 3-41.

- 許彥民、洪富峰，〈受刑人的經驗與生活空間：以嘉義監獄為例〉，《地理研究》第 74 期（2021 年 12 月），頁 143-171。
- Hsu, Yen-min, and Hung Fu-feng. "Prisoners' Experience and Living Space: A Case Study of Chiayi Prison."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Research* 74 (December 2021): 143–171.
- 張惠珍，〈林獻堂與民國——以《灌園先生日記》、《東遊吟草》為考察對象〉，收錄於李怡、張堂錡主編，《民國文學與文化研究》第三輯（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 年 12 月），頁 249-276。
- Chang, Hui-chen. "Lin Hsien-tang and the Republic: A Study Based on *Diary of Mr. Guan-yuan* and *Poems from Travels to the East*." In *Studies in Republican-Era Literature and Culture*, vol. 3, edited by Li Yi and Zhang Tang-chi, 249–276. Taipei: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2016.
- 張思靜，〈方法•視野•文化脈絡：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論再生緣》〉，《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55 期（2012 年 7 月），頁 231-249。
- Chang, Ssu-ching. "Methodology, Perspective, and Cultural Context: *Lun Zaishengyuan*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55 (July 2012): 231–249.
- 張美陵，〈攝影真實與社會身體的監控〉，《中外文學》第 31 卷第 12 期（2003 年 5 月），頁 68-93。
- Chang, Mei-ling. "The Real in the Photograph and the Surveillance of Social Body." *Chung-wai Literary Monthly* 31, no. 12 (May 2003): 68–93.
- 彭麗君，〈人民作為一種修辭？香港「反逃犯條例運動」中的民主與身分認同〉，《文化研究》第 31 期（2020 年 10 月），頁 152-162。
- Pang, Lai-kwan. "People as a Rhetorical Term: Democracy and Identity in Hong Kong's Anti-ELAB Movement."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s* 31 (October 2020): 152–162.

彭麗君，〈公民抗命與法治共同體：香港的可能〉，《文化研究》第 23 期（2016 年 9 月），頁 209-229。

Pang, Lai-kwan. "Civil Disobedience and Legal Community: Hong Kong's Possibilities."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3 (September 2016): 209–229.

黎國威，〈「獅子山」：歷史記憶、視覺性與國族寓言〉，《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第 161 期（2017 年 6 月），頁 84-101。

Lai, Kwok-wai. "The symbolized "Lion Rock": Historical Memory, Visuality and Hongkongness." *Twenty-First Century* 161 (June 2017): 84–101.

鄭作彧，〈時間結構的改變與當代時間政治的問題：一個時間社會學的分析〉，《臺灣社會學刊》第 44 期（2010 年 6 月），頁 213-275。

Cheng, Tso-yu. "Changes of Time Structure and the Ideals of Time Politics: 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Sociology of Time." *Taiwa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44 (June 2010): 213–275.

蕭阿勤，〈集體記憶理論的檢討：解剖者、拯救者、與一種民主觀點〉，《思與言》第 35 卷第 1 期（1997 年 3 月），頁 247-296。

Hsiao A-chin. "A Critical Review of Collective Memory Theory: Anatomists, Savors, and a Democratic Perspective." *Thought and Words: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35, no. 1 (March 1997): 247–296.

謝仕淵，〈囚禁與求生——柯旗化獄中家書所見之戰後臺灣「白色恐怖」〉，《歷史臺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第 4 期（2012 年 10 月），頁 147-175。

Hsieh, Shih-yuan. "Imprisonment and Survival — Observing the Taiwanese "White Terror" in the Post-war Era from the Prison Letters of Ka Chihwa." *Lishi Taiwan* 4 (October 2012): 147–175.

（四）學位論文

王建國，《百年牢騷：台灣政治監獄文學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6年）。

Wang, Chien-kuo. *"Lau-Sau" of A Century : ON Taiwan Political Prison Literature*. PhD diss.,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2006.

吳庭毅，《監視社會與犯罪控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2019年）。

Wu, Ting-yi. *Surveillance Society and Crime Control*. Master's thesis, Department of Law,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2019.

（五）網路資料

〈陳健民：咬住牙關走出監獄繼續運動〉，2019年4月8日信報財經新聞。
（<https://reurl.cc/6GykA5>），2026年3月13日檢索。

“Chan Kin-man: Grit Your Teeth, Walk Out of Prison, and Continue the Movement.”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April 8, 2019. Accessed March 13, 2026. <https://reurl.cc/6GykA5>.

〈香港反送中衝突 中國官媒竟稱西方勢力煽動〉，2019年6月13日自由時報電子報。（<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820733>），2026年3月13日檢索。

“Clashes over Hong Kong's Anti-Extradition Protests: Chinese State Media Claims Incitement by Western Forces.” *Liberty Times Net*, June 13, 2019. Accessed March 13, 2026.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820733>.

李牧宜、張郁婕採訪，〈怎知香港的未來會如何？專訪臺灣香港研究學會陳健民：當臺灣成為觀測最前線〉，2025 年 12 月 11 日轉角國際 udn Global—聯合新聞網。（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4/9196274），2026 年 3 月 13 日檢索。

Li, Mu-yi, and Chang Yu-chieh. "What Will Hong Kong's Future Be? An Interview with Chan Kin-man of the Taiwan Hong Kong Studies Association: When Taiwan Becomes the Frontline of Observation." *udn Global*, December 11, 2025. Accessed March 13, 2026.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4/9196274.

李佩伶，〈陳健民的去留與搖擺：一部片、一行淚、一封信，走出失語泥沼〉，2022 年 3 月 8 日報導者 The Reporter。（<https://www.twreporter.org/a/interview-kinman-chan-2022-in-taiwan>），2026 年 3 月 13 日檢索。

Li, Pei-ling. "The Staying and Swaying of Chan Kin-man: A Film, a Tear, and a Letter, Emerging from the Quagmire of Speechlessness." *The Reporter*, March 7, 2022. Accessed March 13, 2026. <https://www.twreporter.org/a/interview-kinman-chan-2022-in-taiwan>.

李宛璇、蘇文伶，〈異托邦 Heterotopias〉，2009 年 6 月 2 日英文文學與文化教學資料庫。

（http://english.fju.edu.tw/lctd/List/theoristsWork_Guide.asp?T_ID=27&TW_ID=93） ，
2026 年 3 月 13 日檢索。

Li, Wan-hsuan, and Su Wen-ling. "Heterotopias." *English Literature and Culture Teaching Database*, June 2, 2009. Accessed March 13, 2026.
http://english.fju.edu.tw/lctd/List/theoristsWork_Guide.asp?T_ID=27&TW_ID=93.

何明修，〈監獄中的社會學家——讀陳健民《獄中書簡》〉，2022年3月17日聯經思想空間 Linking Vision。
(<https://www.linking.vision/?p=9695>)，2026年3月13日檢索。

Ho, Ming-sho. "The Sociologist in Prison: Reading Chan Kin-man's *Prison Letters*." *Linking Vision*, March 17, 2022. Accessed March 13, 2026. <https://www.linking.vision/archives/9695>.

思想空間編輯部，〈陳健民X林榮基：安住當下，常懷希望，以讀書超越一切高牆〉，2022年6月19日聯經思想空間 Linking Vision。
(<https://www.linking.vision/archives/12370>)，2026年3月13日檢索。

Linking Vision Editorial Department. "Chan Kin-man × Lam Wing-kee: Abide in the Present, Keep Hope Alive, and Transcend All Walls through Reading." *Linking Vision*, June 19, 2022. Accessed March 13, 2026. <https://www.linking.vision/archives/12370>.

陳怡靜、李桐豪，〈【反送中香港直擊】黃之鋒獄中看什麼書 《錢買不到的東西》《大債時代》〉，2019年6月17日鏡週刊 Mirror Media。
(<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190617pol002/>)，2026年3月13日檢索。

Chen, Yi-ching, and Li Tung-hao. "Hong Kong Anti-Extradition On-the-Ground: What Books Did Joshua Wong Read in Prison? *What Money Can't Buy* and *The Age of Debt*." *Mirror Media*, June 17, 2019. Accessed March 13, 2026. <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190617pol002/>.

許文貞，〈無書不歡！鄧小樺備好入獄書單〉，2020年3月6日中時新聞網。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00306000877-260115?chdtv>)，2026年3月13日檢索。

Hsu, Wen-chen. "No Life without Books! Tang Siu-wa Prepares a Prison Reading List." *China Times*, March 6, 2020. Accessed March 13, 2026.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00306000877-260115?chdtv>.

- 黃思朗，〈專訪陳健民：不繫之舟，如浪隨緣〉，2020年12月10日虛詞 p-articles。
（<https://p-articles.com/heteroglossia/1853.html>），2026年3月13日檢索。
- Wong, Sze-long. “An Interview with Chan Kin-man: An Untethered Boat, Following the Waves as Fate Leads.” *p-articles*, December 10, 2020. Accessed March 13, 2026. <https://p-articles.com/heteroglossia/1853.html>.
- 鄭明仁，〈大陸學者爭讀的禁書〉，2020年3月7日灼見名家 Master Insight。
（<https://www.master-insight.com/article/17947>），2026年3月13日檢索。
- Cheng, Ming-yan. “Banned Books Coveted by Mainland Scholars.” *Master Insight*, March 7, 2020. Accessed March 13, 2026. <https://www.master-insight.com/article/17947>.
- 劉桂標，〈“Be water” 與「上善若水」——民主抗爭 2.0〉，2019年7月29日獨立媒體 inmediahk.net。（<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66087>），2026年3月13日檢索。
- Lau Kwai-piu. “‘Be Water’ and ‘The Highest Good Is Like Water’: Democratic Resistance 2.0.” *inmediahk.net*, July 29, 2019. Accessed March 13, 2026.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66087>.
- 羅冠聰，〈【獄（十）：閱讀時光】〉，2018年6月5日方格子 vocus。
（<https://vocus.cc/article/5b166f2dfd89780001464c94>），2026年3月13日檢索。
- Law, Kwun-chung. “Prison (10): Reading Time.” *vocus*, June 5, 2018. Accessed March 13, 2026. <https://vocus.cc/article/5b166f2dfd89780001464c94>.
- Taiwan Society for Hong Kong Studies 臺灣香港研究學會，「簡介」，Facebook 臉書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twhkstudies>），2026年3月13日檢索。
- Taiwan Society for Hong Kong Studies. “Introduction.” *Facebook*. Accessed March 13, 2026. <https://www.facebook.com/twhkstudie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Iron Bars: Heterotopia in *Suffering and Resistance: Prison Letters of Chan Kin-man*

Chen Mu Ching*

Abstract

Centering on Chan Kin-man's *Suffering and Resistance: Prison Letters of Chan Kin-man*,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political prisoners in contemporary Hong Kong demonstrate resilience under the disciplinary regime of the prison system. Drawing upon Michel Foucault's concepts of "Heterotopia" and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is study first analyzes how the prison operates through traditional mechanisms—such as body searches, movement restrictions, and the erasure of time perception—alongside advanced surveillance technologies and ideological indoctrination to attempt a comprehensive "correction" of the prisoners' thoughts.

However, Chan Kin-man strategically utilized the precise and orderly nature of the prison to transform this confined space into a "buffer zone" for self-reflection. While the outside world was engulfed in the social turmoil of the "Anti-Extradition Law Amendment Bill" movement, the prison, paradoxically, became a sanctuary where the author could avoid distractions and focus on reading. Through trans-temporal dialogues with historical "ghosts" such as Zeng Guofan and Lin Hsien-tang, Chan juxtaposed the situation in Hong Kong with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s of late Qing China and Taiwan. This diachronic and trans-regional reference deepened his reflections on the intricate relations between Taiwan,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a. Ultimatel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rough his writing, Chan demonstrates the power of thought to transcend high walls and connect with the outside world. This not only manifests a fluid resilience akin to "water" but also reveals that, under authoritarian structures, reading serves as a vital path for mental resistance and the shaping of collective memory.

Keywords: Chan Kin-man, *Suffering and Resistance: Prison Letters of Chan Kin-man*, Heterotopia, Discipline, Reading

*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ceived: December 31, 2025; Accepted: April 23, 2026)

歷史與根著：以編劇家邱剛健為線索重探香港電影「九七敘事」^{*}

陳若怡^{**}

摘 要

本文以編劇為線索、劇本為文本，自近年出土兩篇邱剛健（1940-2013）著於1983年的《人在紐約》（1989）劇本草稿〈危情〉與〈Far From Chinatown〉，探討來自台灣的編劇家邱剛健如何為香港電影的九七敘事開拓不同面貌。有別於從香港身分焦慮或本土議題來詮釋九七敘事，本文將九七視為觀察香港電影之中介來定義九七敘事，檢視九七問題如何反映相互交織的香港議題。本文主張將《人在紐約》置於香港離散身世與離散電影的脈絡，析論跨地域的華人離散場景裡，離散主體身分的多元參照。藉由草稿，本文發現邱剛健的生命經歷為《人在紐約》創作過程注入繁複的身分議題與離散敘事，讓《人在紐約》不僅反映香港移民潮現象與出品當下中、港、台的政治環境。檢視邱氏為各個跨地域的離散角色所鋪排充滿皺褶的歷史展痕，以及描繪離散生命的根著樣態，本文以為邱剛健所描繪的華人離散敘事不僅開拓九七敘事的時間與空間向度，以編劇為線索更能為長久以來偏重於導演或本土關懷的研究取徑，提供寬廣的論述視野。

關鍵字：邱剛健、《人在紐約》、九七敘事、華人離散

^{*}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給予寶貴意見，幫助筆者重新梳理研究框架與文獻對話；在調整論述層次的過程中，不僅更靠近撰稿初衷，緊扣題旨，亦有新的研究發現與收穫，於此謹致謝忱。

^{**} 陳若怡，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聯絡方式：0105lori@gmail.com。
（收稿日期：114.11.18；通過刊登日期：115.01.24）

一、九七敘事與離散電影

八〇年代初期，中英雙方談判香港主權回歸問題，「九七」——1997年7月1日作為一個具有明確時間線的限期，意味著跨過這個日期之後，香港的管治權將從英殖民政府轉換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九七之後的香港前景充滿未知，促使香港人湧現隨著「九七大限」而來的紛繁情緒。整體社會氛圍如此，香港電影人即時作出回應，¹「九七」成為香港電影中經常出現的敘事，無論是以主線敘事來鋪陳、或是僅作為弦外之音，大量電影程度不等地觸及九七問題。光是1984年底正式簽署《中英聯合聲明》²這一年，觸及九七的香港電影便不在少數，³或追溯歷史人文，或表現香港與中國的關係，其中的情緒則是懷舊有之、焦慮有之，對中共政權的抗拒或無奈，對回歸祖國的樂觀亦有之，種種情緒不能盡括，而隨著時間推進，香港電影回應九七的敘事方式亦不斷變化。香港影評人石琪以成就感與危機感來形容他所觀察到的八〇年代香港電影。其「危機感」所指的是香港作為「借來的時間與空間」的英殖民地，始終存在著危機感，當面對九七回歸時，此一情緒更形成一種逼臨眼前的身分問題，藉由電影作為宣洩集體情緒的途徑。與危機感並存的成就感則指的是高度現代化發展之下充滿自信的香港，電影產業亦於中、港、台華語電影中地位舉足輕重，甚至在兩種感覺相互激盪之下，也為八〇年代香港電影帶來充沛的活力。⁴細思石琪所言，該文以成就感與危機感並存來形容八〇年代香港電影，浮現著香港始終必須面對的身分議題。亦即，身分議題並非始自九七問題，卻因九七問題而迫近眼前。或可如是言之，「九七」如同一記迴盪四方且餘音不絕的鐘響，對八〇年代及其後的香港電影敘事產生莫大影響，促使原本存在香港的各種議題產生討論，身分即為其中一項無法迴避的重要議題。

¹ 朗天指出，香港電影人對九七的回應，與香港電影靈活的製作模式與市場結構有關，往往能從製作時間與社會文化之間作出相呼應的觀察。朗天，《香港有我：主體性與香港電影》（香港：文化工房，2014年2月），增訂版，頁101。

² 歷經數次談判，中英雙方於1984年12月19日完成簽署，全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

³ 根據香港影評人李焯桃對1984年香港電影的回顧，指出這一年有多部電影觸及九七問題與中港關係，其舉例作品不少，按影片於香港上映時間依序有：《傾城之戀》、《似水流年》、《上海之夜》、《省港旗兵》與《等待黎明》等。李焯桃，〈妥協的年代：回顧八四〉，《八十年代香港電影筆記（上冊）》（香港：創建出版公司，1990年12月），頁206-209。

⁴ 石琪，〈八〇年代香港電影的成就感和危機感〉，李天鐸編著，《當代華語電影論述》（台北：時報文化，1996年5月），頁138-140。

香港影評人朗天以1997作為界線、分水嶺來討論九七前後的香港電影，即是從香港身分問題切入的。他以雙時間軸——1967-1989-2003與1984-1997-2003來分析香港電影在九七前後所體現的本土性與主體性面貌，兩條時間軸無分定見，最大的分別是前者將香港六〇年代中期的民眾騷亂作為「香港意識」的濫觴。⁵本文以為，此正說明了從身分來談九七敘事在論述上的時間縱深與複雜性。正如同朗天所提出前九七與後九七，是因為九七已成定局，前九七有其限期，而後九七卻不再能明確框定時間，無以名之卻始終存在，因此，「九七敘事」實際上也是難於定義的。

若從敘事或表現手法來歸納，歷來多有論者悉心分類。以陳家樂與朱立的研究為例，他們的專著《無主之城：香港電影中的九七回歸與港人認同》從香港電影的政治表述作為研究取徑，分析六四事件、九七回歸兩項政治事件在香港電影裡的敘事與風格，包括以動作類型片來影射中共的血腥鎮壓、藉文革影射六四，或是藉時間限期預言回歸以後的未來，藉疫症、政治隱喻、超現實的科幻類型等手法來描繪諸般情緒和想像。⁶台灣方面，有焦雄屏從籠罩著香港市民與電影人的不安情緒切入，如市場發展與創作自由的受限，提出幾個常見的表現方式，包括宿命論與對環境的懼恐、懷舊與政治寓言、重新評估中共與香港關係。⁷焦雄屏的觀察寫於1987年左右，六四事件尚未發生，然而從題材、類型、寓言各方面，指出九七對香港電影所產生的影響，已能簡要地勾勒九七敘事的基本輪廓。但是，無論如何分類，都不易盡括九七敘事，因為事實上，與其將九七敘事作為香港電影反應九七問題的表述內容，毋寧將九七視為觀察香港電影的中介、一個通道。通過九七問題，我們可以探討香港電影敘事中所呈顯的本土意識、現代社會、情感關係、歷史觀與國族意識等議題。從這個角度來看，九七敘事實際上可以與諸多香港議題相互交織，亦因議題的不同而擴大討論的時間向度，甚至在地理空間上從香港與中國的界域向外拓延。

考察香港歷史，香港可以說始終帶有一種離散（diaspora）的城市性格，有論者從「移民社會」的角度來標定這種性格。如香港文化研究學者呂大樂在探討香港精神與本土意識時，指出這種身分認同原本在七〇年代間因為經濟發展與社會流動而

⁵ 朗天，《香港有我：主體性與香港電影》，頁100-109。

⁶ 陳家樂、朱立，《無主之城：香港電影中的九七回歸與港人認同》（香港：天地圖書，2008年10月）。

⁷ 焦雄屏，〈前言——九七震盪：宿命、懷舊、寓言〉，《香港電影風貌1975-1986》（台北：時報文化，1988年8月），初版二刷，頁191-193。

逐漸發展起來，卻在八〇年代面臨九七問題時，變得搖擺不定。這個現象呼應了香港的移民潮，並且追根究柢與香港始終是一個移民社會有關，在經濟生活與社會地位隨著遷徙異地而有所變化的背景之下所形成的香港意識，本身即是淺薄的。⁸可見，九七問題所引起的移民潮，對具有離散經歷的香港人而言，是另一次的離散。以呂大樂的說法來表述，九七移民所反映的是香港意識的震盪，對香港前途的不安引致了大量的人口流動。在這樣的脈絡下，移民海外、返鄉／回歸祖國，以及跨國工作與海外留學等各式各樣的流動樣態，也與身分議題緊緊相繫。此一現象在香港電影上的表現，除了與前文曾提及焦雄屏所概括的九七敘事輪廓可以相聯繫之外，香港文化研究學者洛楓亦從香港的殖民地歷史身世切入，梳理香港自清末以來悠久的「遊徙」(diaspora)歷史，指出香港始終是一處同時兼具有人落地生根、有人離返海內與海外的地方。洛楓指出，香港的流動性形成一種文化風格，反映在香港電影中的移民、遊徙與放逐等主題的作品上。因此，洛楓的重點舉例包括《秋月》(1992，羅卓瑤導演)、《甜蜜蜜》(1996，陳可辛導演)、《春光乍洩》(1997，王家衛導演)，圍繞著九七議題與文化身分之間的關係進行探討，舉凡逃難、海外移民、回鄉尋根、異國旅程等題材，在在呈顯文化身分隨著遊徙的過程而不斷產生變化。⁹透過洛楓對「遊徙電影」的梳理，可以發現這類題材的敘事，乃是放在一個更大的歷史脈絡與論述框架下來進行探討。要言之，遊徙電影是香港電影中一個能夠反映文化身分與遊徙經歷相互牽繫的表述方式，而在九七議題的視域之下，又可以觀察到各種紛繁的樣態。

接續遊徙電影的討論脈絡，並呼應前文提及九七激盪了原本存在香港的各種議題，下文將進一步聚焦海外華人離散的電影案例。為了便於闡述，本文接下來以「離散」取替洛楓的「遊徙」一詞。有關香港電影表現海外華人題材，2003年第16屆香港國際電影節曾作過初步梳理。節目策畫羅卡指出，自十九世紀中期以來，香港因港埠地理環境而成為早期中國移民與各國通商的樞紐位置，電影事業也因此於三〇年代便有海外經驗與資源的挹注，並且易於鋪展海外市場。中國電影向香港發展，或於南洋累積實力再擴展至香港，或拓往海外華埠、或與近鄰亞洲地區影業合作等，也是香港電影出現海外華人題材的重要背景。在這些條件之下，香港電影自

⁸ 呂大樂，〈香港故事——「香港意識」的歷史發展〉，高承恕、陳介玄主編，《香港：文明的延續與斷裂？》(台北：聯經，1997年7月)，頁1-16。

⁹ 洛楓，〈攝錄遊徙——論「九七議題」下文化身份的割裂與游離〉，《盛世邊緣：香港電影的性別、特技與九七政治》(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157-166。

二次大戰之後便出現對海外華人或海外地區的描繪。及至九七問題浮上檯面的八〇年代，香港電影中的海外華人形象又有所不同。除了呼應前文提到洛楓的幾種案例之外，本文要特別指出兩點。第一，羅卡從港日電影市場的脈絡提到港片中的中、日文化身分的題材，如許鞍華的《客途秋恨》(1990)與方令正的《川島芳子》(1990)，內容述及大歷史背景下華人身分的曖昧或難題；第二點則是羅卡觀察九七移民潮出現之後，有描述美國華裔、以唐人街為背景的港產片，雖有表現海外華人生活，深入刻畫者卻不多見，其中包括張婉婷《秋天的童話》(1987)、羅卓瑤《愛在別鄉的季節》(1990)，與關錦鵬的《人在紐約》(1989，台譯《三個女人的故事》)等。¹⁰三部電影分別描繪香港人在唐人街的浪漫愛情、中國人為逃離中共政權申請或偷渡赴美，以及本文將在後面展開論述的來自中、港、台三地女性在紐約相遇的故事。雖然羅卡認為這些電影作品多表現趨向消極的心態，未能深度反省與批判，但是他將這類移民故事放在香港電影中的海外華人形象的脈絡，仍為本文所探討的《人在紐約》案例，提供了宏觀的視野。本文論析《人在紐約》這部從草稿到出品整個創作時間橫跨1983年至1989年的電影，即是以九七敘事為經、海外華人離散故事為緯來探討香港電影。

王智明的〈回歸想像／想像「回歸」：張婉婷電影裏的離散政治〉(2005)將香港主體置於華人離散的語境，來論析香港導演張婉婷(1950-)的九七回歸主題電影《玻璃之城》(1998)與《北京樂與路》(2001)，強調以離散作為問題意識。他指出香港的主體性「不能只在單一線性的譜系中去尋找，而是座落在多元複雜的參照系統當中」。雖然，王智明的用意主要是在回應香港的回歸議題使得離散論述牽扯著民族主義式的文化中國情懷，而本文的分析案例恰好沒有嚮往回歸的香港角色。不過，王智明試圖藉張婉婷電影對離散主體的跨國經驗描述，來突顯離散主體的生成必得關照離散他方的歷史經驗，對本文仍具參照價值。¹¹王智明的觀點指出一個重要的提醒，即當我們從九七敘事的路徑來關注《人在紐約》裡三地女性的離散生命，不能忽略離散主體之間其身分思索的多元參照。提出類似見解的還有徐勇與王冰冰的〈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圖繪80年代以來香港電影中的移民表述問題〉(2010)，認為應將移民電影的本土關切與後冷戰和全球化背景並置觀之，從「大陸—香港—

¹⁰ 羅卡，〈香港電影的海外經驗〉，《第十六屆香港國際電影節：電影中的海外華人形象》(香港：香港市政局，1992年)，頁15-21。

¹¹ 王智明，〈回歸想像／想像「回歸」：張婉婷電影裏的離散政治〉，《中外文學》35卷1期(2006年6月)，頁67-70。

西方（或海外）三者構成的三角形時空結構」來梳理香港移民電影中具參照性的文化想像，方能表現香港複雜的文化身分。¹² 二文皆將觀察從香港離散主體的多元參照性推進至全球化的視域中，前者藉跨國華語電影思考香港電影的文化生產所具有異質性的華人文化地域想像，後者則將討論帶往後冷戰的全球化時代進程下所呈現含混的香港文化身分。但是，本文以為，在深入全球化與本地性的辯證意義之前，仍需更謹慎地放回九七敘事與海外華人的脈絡來探討《人在紐約》。

前文從香港電影中的海外華人形象的脈絡梳理中，可以看到香港電影的發展一直有著跨地製作的條件，以及隨之呈現的紛繁時空與人物背景，《人在紐約》亦是如此。《人在紐約》的製作過程頗為曲折，前後分別有來自台灣的邱剛健（1940-2013）與旅美的大陸作家鍾阿城（1949-）投入編劇工作，而電影以鍾氏劇本拍成，文本分析詳見後述。這裡先就基本的敘事內容，說明《人在紐約》在劇本構思過程中分別有著不同身分背景的「作者」挹注自身經驗或意念。比方電影版本的台灣角色有旅美的張北海¹³、女主角張艾嘉、導演關錦鵬與美術指導朴若木共同構思；大陸女人則有鍾阿城較多的自身投射¹⁴；至於香港女人則是關錦鵬宣稱最為了解的角色，顯然投入最多。¹⁵ 值得注意的是，來自台灣的角色其實亦有邱剛健注入自身生命經驗，例如他對台灣女人的父親黃文藝的描寫，與其父親的國民黨黨員背景有關¹⁶，能夠見到邱剛健不同方式的批判，可惜僅留在邱氏的劇本中。雖然電影版本選擇不

¹² 徐勇、王冰冰，〈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圖繪 80 年代以來香港電影中的移民表述問題〉，《文化研究月報》111 期（2010 年 12 月），頁 1-14。

¹³ 張北海本名張文藝，為張艾嘉叔父。《人在紐約》拍攝過程有張北海頗多協助，包括聯繫鍾阿城，以及給予台灣角色的意見。張北海著有散文集《人在紐約》，收錄 1983 下半年至 1987 上半年刊登於海內外報紙雜誌的文章，內容與本文討論同名電影無關。張北海，《人在紐約》（台北：合志文化，1988 年 4 月）。

¹⁴ 韋軒、楊念訪，〈關於「真實」的唯一選擇：關錦鵬訪問〉，韋軒主編，《關錦鵬電影作品 人在紐約》（香港：電影雙周刊，1989 年），頁 51。

¹⁵ 關錦鵬被問及是否較為熟悉香港女人角色，答案是肯定的。關錦鵬表示他與其他香港劇組工作人員對香港女人的熟悉，補足了鍾阿城劇本在描繪張曼玉角色時不足之處。見韋軒、何文龍訪，〈人，在紐約的日日夜夜：我們所走過的路〉，韋軒主編，《關錦鵬電影作品 人在紐約》，頁 78。除此之外，香港劇場人林奕華也認為在三個女人之中，香港女人是關錦鵬最了解的角色。林奕華，〈關錦鵬的早期電影世界：作者的養成〉，王志輝、陳志華、謝偉烈編，《焦點影人：關錦鵬》（香港：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2021 年 4 月），頁 125。

¹⁶ 在一場關錦鵬訪談中，羅卡提到《人在紐約》中張艾嘉與父親的描寫，與邱剛健父親即是國民黨黨員有關。對此，關錦鵬認為《人在紐約》的故事與邱剛健的台灣人身分有很大關係。關提到，邱剛健認為國民黨政府遷台後對反攻大陸遙遙無期感到難以平衡，而邱剛健在台灣與香港間的屢次移動，這樣的身分背景亦讓他能表現在《人在紐約》之中。羅卡、喬奕思訪，〈我與邱剛健的幾次合作——關錦鵬導演訪談〉，羅卡、趙向陽、喬奕思、劉嶽編，《異色經典：邱剛健電影劇本選集》，頁 450。

同的表現方式，卻因為版本差異而突顯了《人在紐約》的整個製作過程，從劇本到成品，有著不同作者的生命背景與角色投入上的多重特性，此即是本文希望以編劇家邱剛健為線索，重新檢視香港主體與更多離散主體的多元參照性的重要原因。

二、編劇邱剛健的共感與共構

根據香港影評人張九在1984年的觀察，他發現徐克、許鞍華與梁普智等香港導演作品中的九七敘事，或借古諷今，或表現對時代動盪的觀察，明顯關注九七前途，甚至早在1984年之前已有「先知先覺」般的敏感。他認為這種感覺，與這些導演們的成長經驗有關——「我時常深信在六、七十年代長大成熟的人，特別是敏感的藝術工作者，或多或少都會受當時那種社會運動的狂熱氣氛所感染，而成為他們的一部份。〔中略〕對社局世態的種種有情，種種關懷。」¹⁷本文以為，張九所描述的那一群人裡，也有著邱剛健的身影。來自台灣的邱剛健，是八〇年代香港電影場景中具舉足輕重地位的編劇。早在1966年至1974年間，他已從與香港邵氏兄弟電影公司和獨立電影公司的合作中，奠定其編劇之名。這段時間，邱剛健不只是配合公司政策，創作各種類型電影，也在其中暗藏他對現實的批判態度。不僅如此，他參與香港文藝社群，接近左派知識分子，創作現實感強烈的詩作，在在反映身在香港的他所感染到的時代氛圍。¹⁸以此來看深度參與八〇年代香港電影的編劇家邱剛健，有著與香港導演們十分近似的時代共感。

1980年，邱剛健在短暫回台幾年之後重返香港電影圈，有新導演們的邀約合作，舊識邀請共事，又與朋友合組公司等，創作機會不少。若從九七敘事來檢視邱剛健1980年至1992年移民美國以前的編劇作品或接手改寫的編劇合作，就有許鞍華的《胡越的故事》（1981）與《投奔怒海》（1982）述及越南難民；區丁平的《夢中人》（1986）借古喻今，思索香港與中國的矛盾關係；而合作次數最多的關錦鵬，從寬泛定義來歸納，《地下情》（1986）、《胭脂扣》（1988）與《人在紐約》（1989）皆

¹⁷ 張九，〈因何懷舊成風？〉，《電影雙週刊》141期（1984年7月19日）。轉引自焦雄屏編著，《香港電影風貌1975-1986》，頁194-196。

¹⁸ 陳若怡以邱剛健在香港時期的電影編劇作品與詩作表現，分析其移動於台港之間所形成的現實關懷。陳若怡，〈邱剛健的臺港冷戰經驗及其美學形構：以1966-1974年在香港的作品為討論核心〉，林淑芬、葉蔭聰、楊子樵主編，《前沿與流動：重探冷戰的亞際連結》（新竹：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2024年8月），頁249-281。

可羅列其中。¹⁹由於邱剛健的輩份較多數新導演為高，處於學習階段的新導演給予編劇較大的創作空間²⁰，可以說，邱剛健以其編劇身分，與香港新導演們共同構作了香港電影的九七敘事。²¹自2018年至2022年間，香港陸續出版三本邱剛健劇本集，第一本收錄邱剛健與關錦鵬合作的電影劇本，其中包括《人在紐約》；第二本收錄邱剛健晚年定居北京時期的電影劇本；第三本收錄範圍較廣，橫跨六〇年代至八〇年代的編劇或編導劇本，並特別收錄十篇著於七〇至八〇年代的劇本草稿。²²這些劇本的面世為電影文本研究提供了更多的研究材料與詮釋可能，仍待更多不同面向的研究取徑深入探究。本文從劇本草稿中發現歷史履痕是邱剛健刻畫角色的重要創作方法，有其自身生命經驗的投注；尤其在草稿與成品的相互參照之下，得以重新檢視邱剛健始終懸繫於心的華人離散敘事，浮現一個有別於「電影」敘事的詮釋線索。

電影本身的跨地製作條件，提供從跨地作者的角度分析文本的研究取徑，只是較常見於改編電影與原著的對照。在跨地製作的過程中，跨地「作者」因著各自不同的身分、生命經驗、歷史意識與政治態度，在鋪排歷史元素、刻畫角色生命時，展現歧異的表現方式，²³可惜目前以編劇與劇本作為文本分析核心取徑的研究方式仍然有待開展。聚焦於邱剛健「作者」身分的電影文本研究，近年陸續有研究者從

¹⁹ 關錦鵬在受訪時被問及《地下情》表現出對香港前景的焦慮，是他抑或邱剛健的想法時，關錦鵬回答是二人共同的想法。他表示1984年中英草簽對他確實產生影響，於是在《地下情》、《胭脂扣》與《人在紐約》幾部電影皆有相關的表現。朱小豐整理，王志輝、謝偉烈、陳志華、張偉雄訪問，〈關錦鵬專訪：我總是用女性的角度去看事情〉，王志輝、陳志華、謝偉烈編，《焦點影人——關錦鵬》（香港：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2021年4月），頁20、27。

²⁰ 紀陶文章〈我記邱剛健先生編劇之路〉提到邱剛健自1981年擔任《胡越的故事》劇本顧問與合作編劇開始參與香港新浪潮的劇本創作，在香港新浪潮裡以其名字逐步樹立其編劇生涯的「品牌」，較年輕的導演如關錦鵬與區丁平皆倚重邱剛健的劇本。尤其是在邱剛健與關錦鵬的合作中，更是互相成就。見紀陶，〈我記邱剛健先生編劇之路〉，羅卡主編，喬奕思、劉嶽助編，《美與狂：邱剛健的戲劇·詩·電影》（香港：三聯書店，2014年11月），頁292-297。

²¹ 關錦鵬是邱剛健合作次數最多的一位香港導演，在訪談中侃侃而談《地下情》、《胭脂扣》、《人在紐約》與《阮玲玉》四部電影的合作過程，不少內容談及共同構思的過程。見羅卡、喬奕思、劉嶽助訪問，喬奕思、劉嶽助整理，〈我與邱剛健的幾次合作——關錦鵬導演訪談〉，羅卡、趙向陽、喬奕思、劉嶽助編，《異色經典：邱剛健電影劇本選集》（香港：三聯書店，2018年4月），頁428-455。

²² 三本劇本集依出版時間依序為：羅卡、趙向陽、喬奕思、劉嶽助編，《異色經典：邱剛健電影劇本選集》（香港：三聯書店，2018年4月）。趙向陽、羅卡、喬奕思編，《再寫經典：邱剛健晚年劇本集》（香港：三聯書店，2021年1月）。羅卡、趙向陽策劃、劉嶽助主編，《雄艷者的色想與美典：邱剛健編導電影劇本集》（香港：香港電影評論學會，2021年3月）。

²³ 莊宜文，〈文革敘事，各自表述——《棋王》、《霸王別姬》跨地域改編電影之研究〉，《成大中文學報》26期（2009年10月），頁119-123。

較大範圍探討邱剛健的美學形構，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麥樂文的〈展演中國性：邱剛健與臺港冷戰電影體制的轉化〉（2023）以「展演中國性」為題，探討邱剛健的編劇身分如何介入電影文本與冷戰意識型態形構之間的互動關係。在麥文的舉例中，將邱剛健參與編劇的《投奔怒海》與《人在紐約》置於全球化的進程，探討冷戰意識型態所介入的中國性想像不斷在變化。如《投奔怒海》裡越共統治下的北越與《人在紐約》裡紐約都會中的離散華人角色，皆一再呈顯變化中的中國性異質面貌。麥樂文仔細對照了《人在紐約》的邱剛健劇本與鍾阿城部分保留、部分改寫後的電影成品，指出電影成品為了配合後冷戰時期三地資本流動，選擇突顯離散中國性，刻意淡化政治色彩，降低中、港、台三地政治張力，消解冷戰意識型態對立；而作為編劇的邱剛健卻是有意識地展演中國性，因此在作品中一方面複述中國性來滿足冷戰意識型態的想像，另一方面卻有意藉由揶揄式的書寫方式表現政治張力，從而使冷戰中國性的遺緒產生動搖。就結局來看，該文認為電影最終構建了一個「統合的新華人論述」，邱剛健的劇本則「展望華人身分的未來可能」。²⁴言下之意，即指邱剛健創作上的能動性提供了對全球華人身分的面貌更多不同可能性的想像。本文以為，麥樂文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呼應了本文在前面藉王智明與徐勇及王冰冰的論述所提取出的離散主體的多元參照性，並且，正因為該文不刻意定義中國性，得能從電影和劇本的對照中發現邱剛健的創作痕跡與政治環境的觀照。不過，本文除了將借助麥樂文的研究基礎之外，亦將納入2022年新出土的文本材料，即《人在紐約》於1983年最初構思過程中的草稿，重新進入《人在紐約》文本，再一次檢視邱剛健編劇身分的線索，可能為香港電影九七敘事開拓怎樣的詮釋空間。需先說明的是，為了避免議題發散，同時也為了貼近《人在紐約》和新材料，並緊緊邱剛健的生命經驗，本文將繞開中國性的討論，而從華人離散的路徑進入分析。

根據關錦鵬憶述，《人在紐約》的構思與他心中縈繞著1984年中英草簽有關，他表示自己在草簽後即想過移民，也很想窺探移民國外的華人呈現怎樣的生活樣貌，因此透過中、港、台三地女人在紐約的生活，來表現不同的移民心態。顯而易見的，中英草簽與移民潮是關錦鵬創作《人在紐約》的關鍵動機。不過，如果考察《人在紐約》的創作過程，有必要重新檢視邱剛健編劇身分對作品所挹注的不同視野。依時間往回追溯整個創作過程，最接近電影成品的創作時間是1988年至1989

²⁴ 麥樂文，〈展演中國性：邱剛健與臺港冷戰電影體制的轉化〉，《文化研究》36期（2023年4月），頁344-355。

年。監製方平、策劃金川邀請關錦鵬合作時，乃有感於當時政治氣候特殊，頗具商機，於是角色從大陸女人陸續加上香港女人與台灣女人，最後決定描繪三地背景各異的女人在紐約產生種種人際衝突的故事，四人一起構思分場，由邱剛健執筆劇本。²⁵1988年12月，邱剛健隨劇組抵達紐約一面拍攝一面完成劇本初稿。然關錦鵬實際到紐約後，發現原先想像的人際衝突並非「真實」景況，劇本過於戲劇化，他希望改用「真實」來傳達影像的感染力，²⁶因此關錦鵬果斷決定停拍，在緊迫時間內商請在洛杉磯的大陸作家鍾阿城依據邱氏劇本進行刪減改寫，²⁷終於完成攝製。不過，受惠於近年出版的邱剛健劇本集，讓《人在紐約》最初的草稿——〈危情〉與〈Far From Chinatown〉兩篇故事大綱得以納入討論，讓我們見到《人在紐約》的劇本構思乃始自1983年。²⁸兩篇草稿皆設有一名因九七問題而決定婚姻移民的香港女子，可以說從1983年的草稿到1989年的《人在紐約》成品，皆反映了自八〇年代初中英啟動談判以來出現的香港移民潮。這些不同版本的敘事所描繪移民故事的地域場景，涵括香港、馬來西亞和紐約，而移民者的身分背景，有〈危情〉中的香港女人與馬來西亞土生華裔，〈Far〉的香港女人與紐約不同世代的華裔，《人在紐約》則刻畫中、港、台三地女人在紐約的友情與移民適應歷程，並且連帶地勾勒出她們上一世代的離散生命。整體而言，這些離散故事的跨國性相當繁複，其繁複性不僅是反映移民潮之下香港人的出走心態，而且同時關照到中、港、台三地的海外華人，甚至觸及了東南亞華僑。尤其，邱剛健從世代面向關注海外華人，並且為角色注入其對華人近代史的思索，以歷史履痕刻畫離散生命。透過草稿，我們得以從更為廣闊的地域範圍來重新檢視邱剛健筆下的華人離散故事。

²⁵ 張志成訪，〈為甚麼一定叫《人在紐約》——訪關錦鵬〉，《大影畫》38期（1990年1月22日）。轉引自黃愛玲、羅卡策畫，《電影創作歷程》（香港：香港藝術中心，1990年），無頁碼。

²⁶ 韋軒、楊念訪，〈關於「真實」的唯一選擇：關錦鵬訪問〉，韋軒主編，《關錦鵬電影作品 人在紐約》（香港：電影雙周刊，1989年），頁45-54。

²⁷ 邱剛健原劇本有61場，經鍾阿城刪減與修改後餘下30場。鍾版劇本收錄於：邱剛健原著、鍾阿城改編，《人在紐約》劇本，韋軒主編，《關錦鵬電影作品 人在紐約》，頁112-188。

²⁸ 因時間久遠，關錦鵬已不復記憶，只記得其中一份故事大綱定名為〈危情〉或〈迷情〉，本文逕以〈危情〉簡稱之。連同〈危情〉與〈Far From Chinatown〉，共有十篇劇本草稿於2021年首度公開，收錄於：羅卡、趙向陽策劃、劉嶽主編，《雄艷者的色想與美典：邱剛健編導電影劇本集》（香港：香港電影評論學會，2021年3月），頁448-549；編者劉嶽撰寫邱、關二人合作概要，見編者，〈邱戴安平X關錦鵬〉，頁451。

三、歷史履痕

在展開文本論析之前，為便於理解角色，本文援引旅美的亞美研究香港學者黃秀玲對華人離散理論的分析概念，藉華人離散主體來定位《人在紐約》中的三個女人。²⁹黃秀玲從王靈智的研究得到啟發，將華人離散理論區分為三種概念——植根主義(Racinationism)、本源中心主義(Genocentrism)、跨地域主義(Translocalism)。簡要述之，植根主義指涉的是在異地建立新家、在新環境逐漸形成新的身分；本源中心主義指涉的是依著血緣、種族／血統／世系、族類等本源關係來設想離散生活的意義；跨地域主義則是相對飄移不定的駐居狀態，如無地的、流動家園、心即家等。黃秀玲特別強調這三種概念其實結合觀之，形成複雜而可以協同、變形或相互顛覆的狀態。³⁰若藉這三種概念來檢視《人在紐約》裡的三個女人，幾乎可以依序分別用以理解為——植根主義：台灣女人黃雄屏（張艾嘉 飾），一個渴望成為美國人的角色；本源中心主義：大陸女人趙紅（斯琴高娃 飾），一個心繫故國母親的角色；跨地域主義：香港女人李鳳嬌（張曼玉 飾），一個「沒有家國觀念」、嚮往四海飄泊的角色。

下文分成兩個部分進行探討。第一部分從邱剛健花費筆墨的三地女人的政治張力，分析她們身上各自的歷史履痕與離散生命之間的關係。這部分主要聚焦於趙紅與黃雄屏兩個角色。在趙紅角色的探討中，本文將兼及與其身分相關的角色——大陸文革倖存者劉豹娣，以文革元素為線索，分析邱剛健如何將歷史履痕用於描繪角色的身分思索、情感表現，並展現戲劇張力。在黃雄屏的角色探討中，本文將從邱剛健青年時期關注現實的思想軌跡，分析邱剛健如何藉歷史履痕刻畫黃雄屏這個角色。第二部分從香港女人李鳳嬌談起，探討這個角色在身分思索的過程中，用以根著自身的方式。接著藉由〈危情〉與〈Far From Chinatown〉，進一步討論這些草稿中的離散主體如何根著異鄉，從而說明《人在紐約》的「全球華人身分」不僅在草稿已經展現，並且有助於我們理解華人離散主體的豐富面貌。

²⁹ 本文援引黃秀玲的華人離散概念，主要採取較為貼近文本的方式進行分析，希冀幫助讀者理解三個角色不只是個人生命經驗，而可以映照更多離散主體的生命經驗。

³⁰ 黃秀玲在〈慾望輪／迴：梁志英《鳳眼》中的佛教、離散理論與身分政治〉裡提到這個概念，於〈全球視野與在地性：一個華美研究學者眼中的世界華文／華人文學〉再次應用。兩篇文章分別於2006年與2010年以英文發表，後收錄於：黃秀玲著、單德興編，《華美：華美及離散華文文學論文集（下）》（台北：允晨文化，2001年2月），頁749-793、頁826-863。

邱剛健在一份撰於1988年1月的手稿中構思了《人在紐約》的人物設定，名為〈大陸女人、臺灣女人、香港女人 山水有相逢 電影意念、人物簡介〉：

一九八八年夏至秋，短短三個月內，三個素昧平生的中國女人在美國紐約相識，迅速變成朋友，結為知交，又迅速反面成仇。也許，通過這一段經歷，再加上她們每個人對自己過去的身份、現在的處境、將來的展望做過一番思考，她們會再重新相識，重新變成朋友，重新結為知交——甚至再反面成仇。

究竟，這三個女人，一個來自中國大陸，一個來自台灣，一個來自香港。³¹

這段手稿簡要地勾勒出《人在紐約》以來自中、港、台三地的中國女人為主軸，從她們在紐約的相遇開展一段華人離散的故事。因為三人有著各自的過去、現在與未來，與相異的出身地域背景，促使她們在人際交往過程中產生相識—結交—反目，又重新遇合的情感起伏，亦同時形成中、港、台之間政治張力的暗喻。細究之，其政治張力乃緣於邱剛健手稿所描述的「過去的身分、現在的處境、將來的展望」——「現在」指的是她們的移民生活樣貌，「過去」則指涉她們身上所刻畫各自不同的歷史履痕，而「將來」記錄了她們身分思索之下的心理變化。

黃雄屏在七〇年代隨著因婚外情而私奔的父親一起移民。父親是國大代表，自稱在海外救中國，對兩岸中國人的未來懷抱理想，閒時舞弄書法、唱作京劇。移民之前，黃雄屏就讀台灣大學歷史系，主要研究漢朝；到了美國之後，渴望成為道地的美國人。她未與父親同住，感情狀態飄泊不定，流連於不同國籍的男人間，唯獨排除了大陸人、香港人、台灣人，顯然有意自外於父親那一代的「中國人」身分認同；而美國人的種族歧視，又使她既憤怒又傷心，既想告別過去，卻仍然徬徨於身份認同。

黃雄屏以劇場表演謀生，在劇本中曾參與兩次試鏡，一次是熱內特（Jean Genet, 1910-1986）的荒誕戲劇《陽臺》（The Balcony, 1956），一次是莎士比亞的劇

³¹ 邱剛健，〈大陸女人、臺灣女人、香港女人 山水有相逢 電影意念、人物簡介〉，收錄於《人在紐約》劇本前，見羅卡、趙向陽、喬奕思、劉嶽編，《異色經典：邱剛健電影劇本選集》（香港：三聯書店，2018年4月），頁221-224、頁313。手稿上有標註頁碼，然書中僅節選部分。此篇手稿下稱〈人物簡介〉。

作《馬克白》(Macbeth, 1623)。³²在參與後者的試鏡時被質疑出演馬克白夫人的資格，她感到西方人對東方人的嘲諷，於是舉出中國漢朝也有一個呂后，與馬克白夫人一樣狠毒。³³從她的歷史學科背景與她的舉例，可以發現黃雄屏試圖從中國歷史文化裡尋索資源，而她所認同的中國文化不同於其父親，不是國民黨遷台以後大力復興的中華文化道統。她引以自豪、認為可與馬克白夫人相比擬的，是中國漢朝惡名昭彰的「不道德」的呂后。這裡，邱剛健以其作品中經常出現的對非正典女性的認同，批判了台灣的「中國性」，也揭示了國民黨倡導中華文化道統的偽善，對黃父一代的海外移民身上顯現出以正統政權自居的高傲心態提出批判。要言之，在黃父的形象刻畫上，邱剛健充分利用了冷戰意識型態所介入的中國性意涵，而黃雄屏的角色則發揮了揭示其虛妄的作用。³⁴

黃雄屏的身份追尋在決定接受父親友人為她安排的相親對象後，出現明顯轉變。相親者是來自台灣的吳俊傑——在電影中僅是黃雄屏的老朋友，且略去身分背景；劇本則賦予吳俊傑這個角色較具體的身分背景。吳俊傑有個在台灣當立法委員的父親；曾於加州留學，當過「保釣小將、文革小將」。³⁵此一僅於劇本裡出現的小配角，顯然影射的是七〇年代初曾投入保釣運動的海外台灣留學生，由於對中國懷抱血緣相連的民族情感，渴望參與祖國建設而投入文革，或是感染世界青年反文化，嚮往文革的反動精神。如果回到歷史現場，海外留學生在北美掀起海外保釣運動，在邱剛健的同輩友朋中就有劉大任(1939-)與郭松棻(1938-2005)在加州組織柏克萊釣魚台行動委員會，推動海外保釣。彼時，香港與台灣知識分子共同嚮應，抵抗外侮、維護民族自尊成為當時台、港知識分子共同的目標。香港方面有大專學生團體與文藝刊物聯合組織，在香港發起示威遊行，身在香港的邱剛健，亦曾與此

³² 荒誕戲劇與莎士比亞戲劇皆為邱剛健六〇年代的知識接受，曾於他所主導的《劇場》雜誌(1965-1968)上刊登文章、製作專題與舉辦戲劇演出。二劇在劇本中的出處見：邱剛健，《人在紐約》劇本(第4場、第25場)，羅卡、趙向陽、喬奕思、劉嶽編，《異色經典：邱剛健電影劇本選集》，頁227-228、頁256-257。

³³ 邱剛健，《人在紐約》劇本(第25場)，羅卡、趙向陽、喬奕思、劉嶽編，《異色經典：邱剛健電影劇本選集》，頁257。

³⁴ 針對本文所舉例黃雄屏與父親一段，麥樂文指出邱剛健的劇本裡，黃雄屏揭穿父親所象徵黨國的冷戰中國性，在複述冷戰中國性的同時亦揭示其虛妄，並且進一步比較電影裡黃雄屏自比呂后，是將對中國性的否定，轉而強調文化根源與繼承的離散中國性。本文受此見解啟發頗多，但是對於其推論的離散中國性略有異見。本文以邱剛健對非正典女性的認同為例，即是希冀藉此說明邱剛健作品裡中國歷史文化的元素經常注入非正典的角色，有其對文化道統的反思，但是並非全盤否定。

³⁵ 邱剛健，《人在紐約》劇本(第30場E)，羅卡、趙向陽、喬奕思、劉嶽編，《異色經典：邱剛健電影劇本選集》，頁266。

組織中扮演重要推動角色的《70年代》雙週刊同人們過從緊密。³⁶從反美帝、反英殖民的呼聲，到追溯清末推翻帝制的革命、民國初年五四運動救亡圖存、三〇年代日本侵華的屈辱歷史等，知識青年們藉由民族歷史作為反對行動的精神指引。由於缺乏對文革親歷其境，無論是在海外投入保釣的台灣知識分子，或是香港左派社群的保釣示威和關注本土革新的行動，都曾經對文革有著浪漫化的推崇。直到七〇年代中期，台、港知識青年終因逐漸掌握更具體的文革實情而逐漸心生幻滅，許多人因此經歷一段轉向、過渡的心理變化過程。³⁷由這段歷史現場可以見到，邱剛健將自身的現實見聞與交友經歷，注入吳俊傑這個角色的刻畫裡。而當黃雄屏接受與這個經歷特殊的台灣男人進一步交往，並且「決心做回中國人」³⁸，此處的「中國人」身分認同便產生了另一層意義，那是她對經歷理想幻滅之後重新思索方向的中國人的認同，與她自己與父親所象徵的中華文化道統決裂的心情產生共鳴。值得玩味的是，邱剛健採取揶揄的方式來表現兩人的共鳴，他們彼此坦誠想找一個「中國人」來拯救已經一年無法與人做愛的自己。³⁹就揶揄的表層意涵來看，是透過「性」為自己重新確立「中國人」身分認同，但是如果進一步思索邱剛健在二人身上所刻畫的歷史履痕，卻揭示這兩個來自台灣的離散主體身上，即是成長於六、七〇年代知識分子的生動寫照。也就是說，在邱剛健揶揄式的表現手法底層，蘊涵著他對歷史履痕的反思。

沿著以歷史履痕刻畫角色的探討路徑，下文以文革（1966-1976）作為主要線索來檢視大陸女人趙紅的角色刻畫。趙紅原籍中國哈爾濱，在上海工廠工作時結識至上海出差的先生湯馬士——美國華裔第二代，二人結婚，趙紅移民紐約。文革期間的趙紅年方十三，未深切感受過大陸經歷的政治動盪。文革在她腦海留下的印象，

³⁶ 羅卡，〈《劇場》的裂變·在香港的反響共振·及其餘韻〉，《藝術觀點 ACT》73 期（2018 年 1 月），頁 18-23。

³⁷ 有關香港學生運動發生的外在環境與思想（意識型態）形成和運動分期，可參：周魯逸，〈香港學生運動與意識型態〉，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編，《香港學生運動回顧》（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83 年 1 月），頁 278-284。有關台、港知識分子對文革從追崇到幻滅的案例，台灣可以劉大任（1939-）為例，香港則為古兆申（1945-2022），前者為邱剛健自台灣創辦《劇場》時期的好友，後者為香港左派刊物《盤古》同人。古兆申在回顧保釣運動時，敘述了當時知識青年左傾的概況。參見：盧瑋鑾、熊志琴編，《雙程路：中西文化的體驗與思考 1963-2003》（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0 年 4 月），頁 126-151。

³⁸ 邱剛健，〈大陸女人、臺灣女人、香港女人 山水有相逢 電影意念、人物簡介〉，羅卡、趙向陽、喬奕思、劉嶽編，《異色經典：邱剛健電影劇本選集》，頁 223。

³⁹ 邱剛健，《人在紐約》劇本（第 54 場），羅卡、趙向陽、喬奕思、劉嶽編，《異色經典：邱剛健電影劇本選集》，頁 298。

是文革小將在街上扔炸彈。⁴⁰依趙紅職業判斷其為工農階級，在大陸時為自己取名為「趙天紅」，意味著她感受到的是建立新中國的昂揚氣息，而非階級鬥爭的慘酷。不過，趙紅的知識平庸、歷史意識淡薄，也反映了十年文革對中國知識發展帶來的負面影響。邱剛健在〈人物簡介〉描述趙紅的背景，寫著「文化大革命以後，中國人普遍對政治產生信仰危機，開始走向傳統老路。皈依宗教、篤信鬼神的風氣一時大興。」⁴¹。這段文字所影射的即是文革期間紅衛兵走上街頭的「破四舊」行動——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⁴²力圖破壞封建遺緒，為了揭發四舊遺毒所展開的抄家遊鬥、搗毀神像與文物等對親情倫理與傳統文化造成的破壞。⁴³事實上，從文革結束以後在七〇年代末期興起的傷痕文學到八〇年代的尋根文學，除了書寫上山下鄉經歷見聞之外，也透過重新書寫地方，尋回被擱置的傳統文化。⁴⁴因此，邱剛健對趙紅角色的描繪方式值得深思。一方面，將她的迷信放在八〇年代中國的思想狀況來檢視，確有其寫實基礎，而邱剛健只擷取傳統文化中宗教與鬼神的元素，使趙紅顯得特別平庸。但是另一方面，邱剛健卻又費了一些篇幅，以趙紅對先祖觀念與親情倫理的重視，對照華裔第二代先生湯馬士早已拋卻中國人身分，顯然，邱剛健有意反思華人移民社會的文化變遷。相較之下，電影看似沒有太大差異，卻強調了趙紅的文革創傷。電影裡的趙紅與先生爭吵時，訴說了自己父親在文革期間因曾留美而被鬥死，母親將父親名字刻在椅背上以象徵牌位，強調母親養育子女的辛苦，因此希望接母親前來美國同住。⁴⁵亦即，劇本反而較為單純地著重於趙紅與家人的親情，而未將文革傷痕編織進親情的牽掛裡。可見，鍾阿城所修改的電影版本以較為寫實的方式再現文革傷痕，用以作為角色刻畫的方式，此一作法雖有歷史清

⁴⁰ 邱剛健，〈大陸女人、臺灣女人、香港女人 山水有相逢 電影意念、人物簡介〉，羅卡、趙向陽、喬奕思、劉嶽編，《異色經典：邱剛健電影劇本選集》，頁 222。

⁴¹ 邱剛健，〈大陸女人、臺灣女人、香港女人 山水有相逢 電影意念、人物簡介〉，羅卡、趙向陽、喬奕思、劉嶽編，《異色經典：邱剛健電影劇本選集》，頁 222。

⁴² 王明賢，〈紅衛兵美術運動〉，劉青峰編，《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 年），頁 358。

⁴³ 王明賢，〈紅衛兵美術運動〉，劉青峰編，《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頁 358。

⁴⁴ 大陸的尋根文學約起於 1985 年，主張民族文化意識、民族傳統文化與歷史，如鍾阿城與韓少功作品。陳信元，〈大陸新時期文學綜述〉，《從台灣看大陸當代文學》（台北：業強，1989 年 7 月），頁 9-10。

⁴⁵ 關於在椅背上刻下父親名字的構想，來自美術指導朴若木與鍾阿城二人談話的結果。韋軒、何文龍訪，〈人，在紐約的日日夜夜：我們所走過的路〉，韋軒主編，《關錦鵬電影作品 人在紐約》，頁 74。

理的作用，卻停留在趙紅與先生失和後的茫然情緒裡。相反地，劇本裡純粹的親情牽掛，以及先生最後接趙紅回家，隱現世代離散華人的差異與相互理解的可能性。

另一運用文革元素的顯著例子是對文革倖存者的刻畫。基於同情，黃雄屏父親家中收留一名曾經歷文革創傷的婦女劉豹娣，黃父鼓勵她寫下自身經歷。他向子女宣稱豹娣正在撰寫的「傷痕文學」，即等同於自己的回憶錄。⁴⁶傷痕文學是中國在七〇年代末文革結束之後開展的一種文學潮流，隨著中國改革開放，逐漸揭開十年文革的歷史傷痕，從地下刊物開始，原本被整肅的中國知識份子透過文學作品述說曾經是書寫禁忌的文革經驗，諸如知青下鄉、階級鬥爭、人性的扭曲等。台灣在大陸文革結束後很快引進這類文學作品，將傷痕文學視為揭開歷史傷痕的媒介，並且置於關係著民族未來的重要位置，主張傳播傷痕文學是台灣知識分子的責任。⁴⁷藉由台灣關注傷痕文學的視角，可以襯托出黃父對文革倖存者的同情姿態——將中國的文革歷史傷痕視為自己同為中華民族一分子的傷痕。不過，邱剛健在劇本中所使用的「傷痕文學」，卻有其揶揄之意。

電影中，黃雄屏發現豹娣手上被綑縛的傷痕，暗示她被黃父性虐待。豹娣對黃雄屏說，自己為了寫書可以忍受這一切。以救世者姿態的台灣人對文革倖存者的性虐待，對照文革中的種種不仁暴行，不僅揭露文革瘡疤，也暗示了台灣國民黨政府也如共產黨中國極權管治一般，對人性造成扭曲。因此，電影的表現方式有著尖銳的批判性，指出兩邊政府為了鞏固政權，對外宣稱正統、對內壓制人性，同時描繪了中國與台灣之間的歷史記憶連帶，揭穿二者手段相似而傷痕相連的事實。相較之下，邱剛健的劇本寫法反而較為曖昧。黃父到處張揚豹娣文革經歷的可憐，藉此反襯自己的助人德行，代表自己扮演著海外救中國的重要角色，此處的嘲諷意味是電影與劇本共通之處。不過，劇本並未出現豹娣手上傷痕的橋段，而是表現對「傷痕文學」的揶揄。黃父拿起豹娣桌上稿紙，驚訝地發現她所寫的並非「傷痕文學」，而是「黃色小說」，大為光火，豹娣卻反應冷淡，對黃文藝的指責不以為然：

⁴⁶ 「傷痕文學」一詞出現於劇本第 57 場 B，為劇本有而電影無的用詞。有關豹娣寫作見：邱剛健，《人在紐約》劇本（第 30 場 C、57 場 B），羅卡、趙向陽、喬奕思、劉嶽編，《異色經典：邱剛健電影劇本選集》，頁 262-266、頁 304-305。

⁴⁷ 以揭露十年文革傷痕而興起的傷痕文學在大陸起於 1977 年底至 1978 年初。在台灣由《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率先引進，主編高信疆擔任總策畫，自海內外蒐集資料，於 1979 年 5 月推出「中國大陸的抗議文學／社會主義悲劇文學特輯」。自刊出以後引起不小回響。高上秦主編，《中國大陸抗議文學》（台北：時報文化，1979 年 9 月），修訂一版。爾後引起報紙與出版社紛紛刊載、選輯大陸文學作品的現象。有關傷痕文學以降的大陸新文學概觀，參見：陳信元，〈大陸新時期文學綜述〉，《從台灣看大陸當代文學》，頁 3-11。

黃文藝氣得把稿紙亂揉，丟在劉豹娣頭上。劉豹娣轉過臉，抬起來，好像尷尬，又好像得意，癡癡地笑。（中略）

黃文藝：我以為我可以幫你們……我好想救你們……

劉豹娣：（望著黃文藝，臉上留著癡笑）老狗，等你肚子餓了，我幫你煮宵夜。⁴⁸

可以見到，劇本裡豹娣並非楚楚可憐，邱剛健讓豹娣搖身一變成為洞察一切的角色，揭穿黃文藝海外救中國理想的偽善，豹娣的嘲諷用詞如「老狗」對照「得意、癡癡地笑」的樣子，更顯出國民黨政府拯救共產黨統治下大陸同胞理想的荒謬。本文想指出的是，對照電影和劇本，電影寫實性強且張力尖銳得多，而邱剛健卻是運用文革此一歷史履痕，諷刺傷痕文學引進台灣的政治意圖。本文以為，邱剛健運用歷史履痕加上揶揄的表現手法，不僅讓戲劇張力沒有停留在批判的層次，而是進一步將反共救同胞的政治理想與揭開歷史傷痕的政治意圖一起帶離當下的政治正確。

從黃雄屏透過「性」重新建立中國人身份認同，到趙紅的平庸樣貌、豹娣的傷痕文學寫作，可以看到邱剛健一再擷取部分史實、運用揶揄式的表現手法展現戲劇性，讓我們除了比較不同版本何者反映政治、如何表現之外，更重要的是，藉由邱剛健所鋪設的歷史履痕，得以將創作反應時代的觀照視點從當下時空移開。在這個意義上，本文的論析結果雖然循著前文所引述麥樂文的研究基礎往下探究，但是本文要特別表明的是，歷史履痕作為邱剛健刻畫角色的重要創作方法，有其自身生命經驗的投注，並且在《人在紐約》以前，七〇年代至八〇年代間的劇本草稿皆有所展現，而這些草稿於近年出土，⁴⁹尤其有待進一步探究，那不僅是對邱剛健作為「作者」的個別研究，而是從中尋索與發現不同的研究取徑。

⁴⁸ 邱剛健，《人在紐約》劇本（第57場B），羅卡、趙向陽、喬奕思、劉嶽編，《異色經典：邱剛健電影劇本選集》，頁304-305。

⁴⁹ 收錄於：羅卡、趙向陽策劃、劉嶽主編，《雄艷者的色想與美典：邱剛健編導電影劇本集》，頁448-549。

四、根著何方

《人在紐約》劇本裡的香港女人李鳳嬌，是與電影在形象與結局上差異最大的角色，同時也是唯一較明確於1983年的兩篇草稿即已有初步構思的角色。李鳳嬌在香港移民潮之下隨父親來到紐約，父親在唐人街開設中國餐館。她雖然在餐館擔任經理，但是自己另外熱衷於投資。比起與父親相依為命，李鳳嬌更嚮往自由自在，認為中國人（即指她自己）應該追求在世界各地都有一棟房子，感情方面也不在乎永遠不變的承諾，與一名在紐約做房地產生意的女人保持曖昧的同性戀情。邱剛健在〈人物簡介〉這樣描述李鳳嬌——「典型的香港人，沒有什麼國家、民族的包袱，也不以為恥。她很驕傲做一個香港人。」⁵⁰這位香港女人在另二位女人口中是最沒有國家觀念的人，她在唐人街過得如魚得水，看起來生存適應並未對她造成困難，比起黃雄屏對於在異鄉受到歧視的較真，或是趙紅對於華裔身分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認同感到矛盾，李鳳嬌顯然對這些都毫不在乎。沒有交纏著過去、現在與未來之間的身分困惑，李鳳嬌只在乎當下自我的感情。唯一令她傾心的是一名來自台灣，看來玩世不恭的男子龔明雄（柯一正 飾），這是一個在邱剛健劇本裡佔去不少場次，卻在電影中被簡化的角色。龔明雄不斷挑釁為人處事的常規，狂妄地宣稱要帶李鳳嬌在紐約、台灣、香港等地飛來飛去，到處居住。這樣的浪蕩男子，正與李鳳嬌要在世界各地都有一間房子的願望高度契合，而李鳳嬌亦不在乎該男子是否真的會信守承諾。相較之下，電影裡的李鳳嬌雖然同樣藉情感來表現她的身分思索，那是她不同於黃雄屏與趙紅的根著異地的方式，然而她在電影結局處於情感認同困惑而陷入悲傷的情緒，邱剛健的劇本卻是為這個香港女人賦予灑脫和自由。亦即，這個角色的香港主體已顯現華人離散主體的跨國樣貌。事實上，邱剛健在1983年的兩篇草稿〈危情〉與〈Far From Chinatown〉已經顯露這個意圖。

〈危情〉與〈Far From Chinatown〉（下簡稱〈Far〉）的女主角皆為香港人，在父母促成之下接受婚姻移民，〈危情〉女主角楊凱悌與馬來西亞華裔林醫生結婚，移民馬來西亞；〈Far〉女主角梁潔馨與美國華裔第三代Frank結婚，移民美國。二篇草稿中的女主角原本都不想過早安定下來，只因父母期望而在男方猛烈追求下倉促答允。二女與李鳳嬌的人物設定的相似之處，在於並非因為自身的九七焦慮而移民，而是嚮往自由自在的生活。二女在移民後皆面對著融入異邦生活的困難，促使女主

⁵⁰ 邱剛健，〈大陸女人、臺灣女人、香港女人 山水有相逢 電影意念、人物簡介〉，羅卡、趙向陽、喬奕思、劉嶽編，《異色經典：邱剛健電影劇本選集》，頁224。

角對行事浪蕩的情夫意亂情迷。再看故事地域，〈危情〉的主要敘事場景在馬來西亞；〈Far〉的主要場景雖然與《人在紐約》同樣設定為紐約，但是角色除了香港女人與先生之外，增添一名華裔移民二代秦冠中作為梁的情人，使得敘事軸線轉移至華裔角色，而非香港女人。秦與Frank相異的移民背景、家庭、階級與生活樣貌，讓整個故事的移民生活面貌被呈現得更有層次。〈Far〉與〈危情〉作為《人在紐約》的最初構想，皆是述說一個海外離散華人的故事，兩篇草稿的香港女人對移民生活的適應，到了《人在紐約》劇本裡轉換至黃雄屏與趙紅身上，而《人在紐約》裡趙紅與先生發生齟齬的祖先觀念，則在〈Far〉藉秦的角色有更多篇幅的刻畫。可見，世代華人離散的生命樣態，是邱剛健始終想要表述的故事。

對於新出土的〈危情〉與〈Far From Chinatown〉，香港電影研究者劉嶽指出這二篇劇本草稿對香港新電影歷史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主題方面，前一部的「港女」經歷個人啟蒙，轉化作*Far From Chinatown*華人流徙歷史的感懷。〔中略〕此次尋回《危情》／《迷情》和*Far From Chinatown*兩份分場大綱，改寫了歷史，追溯到這對八十、九十年代香港電影重要編和導〔邱剛健、關錦鵬〕組合真正的源頭。他們合作的發軔曾設定開闊深刻的意旨，可見其時新浪潮編導不甘囿於本地的視野、探求的野心。⁵¹

如劉嶽所言，這二篇草稿讓我們發現邱剛健與關錦鵬二人最初在合作時的設想，並未侷限於「本地」視野，亦即不單是從香港九七移民潮作為敘事起點。《人在紐約》在1988年至1990年間製作與發行的時空之下，無論對製作方或閱聽大眾，皆不可避免地勾連政治情勢；但是兩篇草稿在構思之初，雖然皆從九七問題開展一個香港女人移民的故事，卻更為聚焦於華人離散主體的離散生命樣態，已然逸出了九七敘事裡的香港主體視點，更具參照性。下文分成二個面向探討，先從移民者的世代與身分位階來探討複雜的離散生命樣態，再從移民者的根著方式，分析離散主體除了如《人在紐約》的李鳳嬌以情感作為根著的方式之外，如何表現對根著意義的詰問。

⁵¹ 劉嶽，〈邱剛健 X 關錦鵬〉，羅卡、趙向陽策劃、劉嶽主編，《雄艷者的色想與美典：邱剛健編導電影劇本集》，頁451。

首先探討移民者的世代與身分位階。《人在紐約》與兩篇草稿皆有關於移民世代的描繪，前者三個女人皆有兩代，後者則有三代，其中〈Far〉甚至遙思好幾世代的華人移民歷史。身分位階方面，《人在紐約》中的李鳳嬌與父親移民紐約，在唐人街開中國餐館，二篇劇本中的女主角父母皆為從事商貿行業的中產階級，眼見「九七大限」而鼓勵年輕人到國外闖蕩，父母自己則選擇留在香港。從二女家庭背景來看，屬香港移民潮中較有資本者，早早便為移民作打算。〈Far〉中的男主角Frank——香港女人的先生是華裔第三代，祖父自中國移民至美國時，在唐人街開洗衣舖，直到Frank父親考取會計師資格後搬離唐人街，而Frank則於華爾街金融業任職。⁵²可見，Frank一家自祖父到Frank一代，已從社會階級的低層爬至白領階級，經過三代之後，Frank儼然已成為道地的美國人，在美國土生土長，是社會位階較高的美國華裔，祖先觀念十分淡薄。不過，廣東話這個母語在Frank身上仍有傳承。⁵³這個角色在《人在紐約》裡接近趙紅先生湯馬士的形象，但是〈Far〉對角色背景的描繪較為細膩。情夫秦冠中18歲時隨父母自香港移民紐約，一家人來到美國後維生艱難，秦父在唐人街的餐廳當廚師，秦母與姊姊在成衣廠車衣，秦自己則是自24歲起在美國各處流浪，混跡唐人街當牛郎。⁵⁴顯然，秦與Frank二人的身分位階差異很大，除了移民二代與三代的移民經驗有別之外，階級與二人的移民適應情形也有著明顯的連動關係。白領社會菁英身分的Frank對於香港女人和秦二人的移民者異鄉適應的心緒不容易體會，而社會位階較低的秦則適應艱辛，「永遠有沒有根的感覺」⁵⁵。這種失根的感覺，在他帶梁去紐約郊外，望著中國人的墳場時表露無遺。秦感慨地說著這是「一百多年來，離開中國幾千萬哩的中國人的墳塚」。⁵⁶這段話意味著中國人離家千萬哩，遠赴異鄉，墳塚象徵了世代中國人離散世界各地的足跡，既承載了悠久的時間，也刻畫著華人離散的足跡，在異地拚搏求存、辛苦落地生根。在秦身上所體現的，是與Frank相當不同的落地生根的樣態，他在龍蛇混雜的唐人街，即使不願加入幫派，卻又不得不與幫派打交道，呈現華人為了在美國社會生存，不得不與幫派「團結」⁵⁷在一起的縮影。秦冠中這個移民第二代的角色，是三作之中較為特

⁵² 邱剛健，〈Far From Chinatown〉，羅卡、趙向陽策劃、劉嶽主編，《雄艷者的色想與美典：邱剛健編導電影劇本集》，頁484-485。

⁵³ 同前註，頁497。

⁵⁴ 同前註，頁489、493-494。

⁵⁵ 同前註，頁503。

⁵⁶ 同前註，頁475。

⁵⁷ 同前註，頁495。

殊的離散華人的面貌，可惜在發展到《人在紐約》劇本時略去了這個角色。綜合來看，移民者的世代和身分位階與離散華人落地生根的樣態，有著緊密的關聯。秦一家一直處於社會底層，始終艱苦，始終無根，對中國人的離散履痕感慨至深；而Frank一家的階級由低攀升至高階，到了第三代已生活無虞地適應異鄉，甚至淡忘了中國人的離散履痕。藉由Frank與秦二角色的對照，重新看待《人在紐約》中的湯馬士，可以發現邱剛健對這個角色給予的認同多於批判，他更有意表現的是離散主體間爭吵之後理解的可能。

接著再談移民者的根著方式。前面一段探討身分位階左右著移民的生存適應，適應情形也各有不同，如何尋找根著異鄉的方式，邱剛健也有著細膩的描繪。〈Far〉中始終感覺失根的秦，其尋找根著的方式是性愛，在不同女人間流連，性愛高潮如同對移民適應的宣洩，心緒當中有著憤怒、屈辱、狂躁、徬徨、痛苦與矛盾。他的社會位階讓他不得不流連於唐人街，因此，在秦與梁交歡後，高潮令他走到窗口，「對唐人街和紐約做出fuck的姿勢」⁵⁸。秦用自己性愛高潮後的身體，對始終難以融入的異鄉表示挑釁，性愛的歡愉彷彿在一瞬間讓他擁有高漲的力量，可以抵禦異鄉的挑戰。只是，秦最終在幫派亂鬥中斃命，客死異鄉。

在〈危情〉裡，邱剛健費了不少篇幅刻畫林醫生這個角色與馬來西亞這片土地的關係。由於在華人家族中庶出的身分讓林醫生自幼蒙上卑屈的陰影，對馬來乳母的依賴、對馬來亞鬼神信仰、傳統舞蹈、蠻荒山林、部落生活深深著迷，彷彿是藉由擁抱異鄉的傳統文化作為根著此地的方式。但是，另一方面，林醫生與〈Far〉中的秦一樣，看著一整片佈滿華人墳墓的山頭，慨嘆著華人曾經渡過了幾千萬哩來至馬來西亞，滿溢著世代華人離鄉背景的哀愁。⁵⁹離散之慨與根著在地的渴望，形成林醫生此一角色最為鮮明的身份和情感特徵，而他藉由傳統的馬來文化作為尋求根著的方式，則成為在三作之中特別突出的設定。如果說《人在紐約》中三個女人由黃雄屏帶頭去找密宗大師，是藉由中國的、傳統的信仰方式來克服異鄉適應之苦，〈危情〉中的林醫生所據以根著的「傳統」，卻是馬來文化。他著迷於馬來傳統文化的神秘色彩，藉此消弭他在華人傳統家族中所受到的拒斥。換言之，他在中國的傳統中受到拒斥，卻在異國傳統文化中找到精神寄託。

⁵⁸ 同前註，頁494。

⁵⁹ 邱剛健，〈危情〉，羅卡、趙向陽策劃、劉嶽主編，《雄艷者的色想與美典：邱剛健編導電影劇本集》，頁463-467、473-475。

耐人尋味的是，當馬來部落裡嚮往現代生活的馬來少女，計畫與來自大城市吉隆坡的馬來青年逃出部落時，林醫生將馬來少女視為傳統叛離者而亟力阻撓。林醫生被馬來青年舉槍斃命，似乎暗示了傳統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被淘汰。然而馬來少女最後卻選擇留在部落，林醫生的骨灰被揚灑於原始森林裡，在他據以根著的傳統之地永遠安息。⁶⁰邱剛健為此一結局所下的標題是「歸途」，意味著回到所來處。也就是說，〈危情〉雖然以死亡畫下離散故事的句點，讓我們看見邱剛健所譜寫華人離散深沉的哀歌，然而在展現了華人離散者的離散生命之後，最終試圖追問的是何處是歸途。如此一來，邱剛健不僅重新定義了根著的意義，將根著中國文化轉化為根著馬來傳統，更進一步消解了根著的必然性。

沿著這些理解，有必要重新檢視《人在紐約》劇本裡三個女人的結局——黃雄屏接受一個台灣男人，湯馬士告訴趙紅「我們家應該夠大，可以容納一個美國人、一個中國人」⁶¹，李鳳嬌則對一個想帶她環遊世界的浪蕩男子心動。劇本的最後一場戲裡，鏡頭從高處拉下，自世界貿易中心、華爾街高樓、摩天大廈，帶往地面，三個女人在到處都是中國人的曼哈頓Chatham廣場，走著、吱喳笑著，不約而同想起某個三人初識時一起酩酊大醉的夜晚，在同個地方笑鬧說著用力跺腳可以震動全世界，於是彼此對視，作勢跺腳，劇本在這裡畫下句點。⁶²這個結局氣氛昂揚，留下了大片想像空間。對照來看，電影的結局是黃雄屏因為父親而感到悲傷，趙紅與先生吵架而落寞不已，李鳳嬌則是在浪蕩男子與同性女友之間感到困惑，因此結局裡的三個女人在寒夜裡湧現的是蕭瑟無奈的情緒。關錦鵬希望表現三個女人各有感慨，除了笑中帶淚，相互對飲之外，盡皆無語，表現中國人在異鄉的蒼涼。⁶³可以發現，關錦鵬的結局雖然也有留白，但是停留在這三個女人仍然處於身分徬徨的狀態；邱剛健的劇本結局卻是三個女人即便可能繼續交往與不斷爭吵，然而此刻的她們因為同是中國人而彼此心靈靠近。邱剛健在〈人物簡介〉手稿寫著：「可是在異邦的三個中國女兒，將流另一種深刻的眼淚，綻開另一種燦爛的笑容，滴另一種熾熱

⁶⁰ 邱剛健，〈危情〉，羅卡、趙向陽策劃、劉嶽主編，《雄艷者的色想與美典：邱剛健編導電影劇本集》，頁479-481。

⁶¹ 邱剛健，《人在紐約》劇本（第58場），羅卡、趙向陽、喬奕思、劉嶽編，《異色經典：邱剛健電影劇本選集》，頁307。

⁶² 邱剛健，《人在紐約》劇本（第61場），羅卡、趙向陽、喬奕思、劉嶽編，《異色經典：邱剛健電影劇本選集》，頁311-312。

⁶³ 黃綺薇，〈遠離「戲劇化」的一章——關錦鵬說他與《人在紐約》〉，《大影畫》34期（1989年11月16日）。轉引自黃愛玲、羅卡策畫，《電影創作歷程》，無頁碼。

的血。另一種喜悅與悲哀，堅毅與徬徨。另一種轟轟烈烈。」⁶⁴以此參照前引〈人物簡介〉開場中三人將一直在成為知交與反目成仇中往復不止，可以看出對邱剛健而言，來自不同地方的三個女人必然會發生齟齬，然而她們在異鄉的種種情緒卻相互映照，也相互陪伴，連綴成「另一種轟轟烈烈」的海外華人的離散樣貌。

本文想藉此指出的是，雖然關錦鵬宣稱保留三個女人異質的中國性，為三人各自的故事分別作了較為寫實的描寫，已能看出他對冷戰意識型態遺緒的批評；然而他所宣稱電影淡化政治矛盾，選擇在結局表現三人各自的感慨，⁶⁵留下他期待的想像空間的結果，卻因此失去了讓三個離散主體彼此產生更多參照的可能性。反觀邱剛健選擇以歷史履痕的刻畫來直面政治張力，採取戲劇性的表現手法，突顯人際交往的張力，卻能凝視她們各自的身分議題，又直面彼此身分之間的矛盾，深入中、港、台三地相連帶的歷史履痕，讓我們有機會了解冷戰意識型態遺緒正是因為在中、港、台三地之間相互連帶的交纏歷史而難以消解，得以站在更為客觀的位置重返歷史糾葛的現場，通往一條反思冷戰遺緒的路徑。更重要的是，本文藉由兩篇劇本草稿看見邱剛健為各個跨地域與不同世代的華人離散角色，鋪排了充滿皺褶的歷史履痕，並且描繪更為豐富的根著樣態，讓我們從這些華人離散故事裡，開拓更為寬廣的九七敘事與身分交織的議題。由此，回到黃秀玲的三個離散概念，我們可以看到《人在紐約》整個創作歷程，展示了植根的、本源的與跨國的離散主體生命相互交織、衝撞與變化，編織成一幅紛呈的海外華人離散圖景，也豐富了香港電影九七敘事的面貌與意義。

五、結語：以劇本作為方法

持平而論，邱剛健版本的《人在紐約》劇本從原有61場的浩大篇幅，經鍾阿城修改至30場以後，勢必略去不少用來塑造角色的細節，三個女人之間的互動也減少許多，情感上的交集自然也較少。餘下的簡省樣貌，對關錦鵬來說仍然是一部完整的戲劇架構，並且是「感到舒服」、有條理而省略細節，如此才能以氛圍取代過多

⁶⁴ 邱剛健，〈大陸女人、臺灣女人、香港女人——山水有相逢——電影意念、人物簡介〉，羅卡、趙向陽、喬奕思、劉嶽編，《異色經典：邱剛健電影劇本選集》，頁313。

⁶⁵ 黃綺薇，〈遠離「戲劇化」的一章——關錦鵬說他與《人在紐約》〉，《大影畫》34期（1989年11月16日）。轉引自黃愛玲、羅卡策畫，《電影創作歷程》，無頁碼。

形式化的細節，表現出角色各自有所保留、各有心事的狀態。⁶⁶本文從編劇的角度，以邱剛健的劇本為線索重新進入《人在紐約》文本，不在鉅細靡遺地對照二者創作意圖或藝術成就之優劣，而是從一個最基本的提問出發：九七敘事只是表現香港身分議題嗎？由於《人在紐約》的三個女性角色分屬中、港、台身分背景，並且以紐約為場景，輻射出一幅海外華人離散的故事，此一基本劇本架構便已然從香港人身分焦慮的焦點中移開，以更宏觀的視線環視緊密相鄰的兩岸三地。電影以萬年國代（台）、文革傷痕（中）、九七移民（港）等時代元素，共同組構近代中國人的命運、三地文化與價值觀差異，以及異鄉離散者的身分認同，呼應八〇年代末的時空下相當政治正確的宏大命題。⁶⁷當作品詮釋難以繞過政治隱喻，而關錦鵬有意識地淡化政治色彩的創作意圖，正突顯兩岸三地相互糾纏的歷史葛藤，如何一再地牽制電影創作。本文透過邱剛健的異鄉客作者身分，嘗試以劇本作為核心文本，分析具異質性的身分與劇本如何擾動香港電影九七敘事的詮釋框架，撥開那些牽制創作的政治因素，回到歷史履痕本身，觸探作者的生命經驗與作品中的離散主體之間的關係，希冀為「香港」電影的九七敘事開展更豐富的解讀視野。

本文分別從歷史履痕的面向梳理邱剛健對黃雄屏與趙紅的角色刻畫，發現邱剛健充滿細節、形式化又揶揄的表現手法，不僅提供高度的娛樂性，且悉心鋪排歷史履痕。我們在黃雄屏身上看見邱剛健所注入自身在六、七〇年代在台、港之間的時代共感，在趙紅與豹娣身上看見邱剛健雖然同樣運用文革元素，卻是對「傷痕」本身的政治性提出質疑，也為香港電影九七敘事裡香港對中國的迎拒情結，提供另一種權衡的觀點。這些歷史履痕皆有助於我們跳脫電影成品當下的政治時空，從多重的視角直面冷戰遺緒。此外，回歸所意味著的身分認同議題，在九七敘事裡表現為香港人尋思文化／中國性根著的複雜樣態。李鳳嬌以情感作為根著方式，讓海外華人離散主體的身分認同變得虛無。亦即，此一無國無家的身分認同設定，似乎是回應了九七敘事裡香港主體的身分議題；然而本文藉由《人在紐約》最初構想的劇本草稿，從那些層次更為繁複、地域想像更為開闊的移民生活面貌，看見邱剛健如何

⁶⁶ 在訪談中，關錦鵬與美術指導朴若木的想法十分接近，「感到舒服」是關錦鵬的回答，而角色各自有所保留，則是關錦鵬對朴若木的回答表示認同。韋軒、何文龍訪，〈人，在紐約的日日夜夜：我們所走過的路〉，韋軒主編，《關錦鵬電影作品 人在紐約》，頁 76。

⁶⁷ 《人在紐約》（台譯《三個女人的故事》）獲 1989 年中時晚報電影獎優秀影片，此為綜合第二屆中時晚報電影獎評審對《人在紐約》的評語。評審包括台灣的蔣勳、高信疆、張昌彥、焦雄屏、香港的李焯桃與何思穎。編者，〈電影獎一九八九 評審意見〉，黃寤蘭主編，《當代港臺電影 1988～1992（上冊）》（台北：時報文化，1993 年），頁 90-92。

描繪華人離散主體根著異鄉的辛苦與無家的悲涼。並置觀之，可以發現這些無國無家、落地生根，或客死異鄉的故事，是邱剛健對離散主體身分認同的反思，他不僅是要揭示中國性的虛妄，而是在誠懇地刻畫了華人離散的根著樣態之後，為根著的必然性留下沒有解答的懸念。

徵引書目

專書與專書論文

王志輝、陳志華、謝偉烈編，《焦點影人——關錦鵬》（香港：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2021年4月）。

Wong, Chi-fai, Chi-wah Chan, and Wai-lit Tse, eds. *Filmmaker-in-Focus: Stanley Kwan*.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Society, April 2021.

王明賢，〈紅衛兵美術運動〉，劉青峰編，《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357-370。

Wang, Ming-hsien. "Red Guards Art Movement." In *Cultural Revolution: Facts and Research*, edited by Ching-feng Liu, 357-370.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1996.

石琪，〈八〇年代香港電影的成就感和危機感〉，李天鐸編著，《當代華語電影論述》（台北：時報文化，1996年5月），頁137-152。

Shek, Chi. "Bashi Niandai Xianggang Dianying de Chengjiugan he Weijigan [The Sense of Achievement and Crisis in Hong Kong Cinema of the 1980s]." In *Dangdai Huayu Dianying Lunshu* [Discourses on Contemporary Chinese-language Cinema], edited by Li Tianduo, 137-152. Taipei: Times Culture Publishing, May 1996.

石琪，《石琪影話集1：新浪潮逼人來（上）》（香港：次文化堂，1999年4月）。

Shek, Chi. *Shek Chi Film Notes 1: The New Wave Forces Its Way In* (Vol. 1). Hong Kong: Subculture Press, April 1999.

呂大樂，〈香港故事——「香港意識」的歷史發展〉，高承恕、陳介玄主編，《香港：文明的延續與斷裂？》（台北：聯經，1997年7月），頁1-16。

Lu, Da-le. "Xianggang Gushi—'Xianggang Yishi' de Lishi Fazhan [Hong Kong Stori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Consciousness']." In *Xianggang: Wenming de Yanxu yu Duanlie?* [Hong Kong: Continuity and Rupture of Civilization?], edited by Cheng-shu Gao and Jie-xuan Chen, 1-16.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1997.

李焯桃，〈妥協的年代：回顧八四〉，《八十年代香港電影筆記（上冊）》（香港：創建出版公司，1990年12月），頁206-209。

Li, Zhuo-tao. "Tuoxie de Niandai: Huigu Bashi Si [The Era of Compromise: Looking Back at '84]." In *Bashi Niandai Xianggang Dianying Bijì (Shang Ce)* [Notes on Hong Kong Cinema of the 1980s, Vol. 1], 206–209. Hong Kong: Creation Publishing Company, December 1990.

洛楓，〈攝錄遊徙——論「九七議題」下文化身份的割裂與游離〉，《盛世邊緣：香港電影的性別、特技與九七政治》（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157-183。

Lok, Fung. "Shelu Yousih: Lun 'Jiuqi Yiti' xia Wenhua Shenfen de Gelie yu Youli [Filming diaspora: Cultural Identity Fragmentation and Drift under the '1997 Issue']." In *Shengshi Bianyuan: Xianggang Dianying de Xingbie, Teji yu Jiuqi Zhengzhi* [At the Edge of Prosperity: Gender, Special Effects and the Politics of 1997 in Hong Kong Cinema], 157–183.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韋軒主編，《關錦鵬電影作品 人在紐約》（香港：電影雙周刊，1989年）。

Wei, Xuan, ed. *Guan Jinpeng Dianying Zuopin: Ren zai Niuyue* [Stanley Kwan Film Works: Full Moon in New York]. Hong Kong: Hong Kong Film Biweekly Publishing, 1989.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編，《香港學生運動回顧》（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83年1月）。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Students, ed. *A Retrospective on the Hong Kong Student Movement*. Hong Kong: Wide Angle Press, January 1983.

朗天，《後九七與香港電影》（香港：香港電影評論學會，2003年6月）。

Lang, Tian. *Hou Jiuqi yu Xianggang Dianying* [Post-1997 and Hong Kong Cinema]. Hong Kong: Hong Kong Film Critics Society, June 2003.

高上秦主編，《中國大陸抗議文學》（台北：時報文化，1979年9月），修訂一版。

Gao, Shang-Qin. *Zhongguo Dalu Kangyi Wenxue* [Protest Literature in Mainland China]. Revised ed. Taipei: Times Culture Publishing, September 1979.

張九，〈因何懷舊成風？〉，焦雄屏編著，《香港電影風貌 1975-1986》（台北：時報文化，1988 年 8 月），初版二刷，頁 194-196。

Zhang, Jiu. "Yinhe Huaijiu Cheng Feng? [Why Has Nostalgia Become So Popular?]." In *Xianggang Dianying Fengmao 1975-1986* [The Face of Hong Kong Cinema 1975-1986], edited by Peggy Chiao, 194-196. Taipei: Times Culture Publishing, August 1988.

陳信元，《從台灣看大陸當代文學》（台北：業強，1989 年 7 月）。

Chen, Xin-yuan. *Cong Taiwan Kan Dalu Dangdai Wenxu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n Mainland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aiwan]. Taipei: Yeqiang Publishing, July 1989.

陳若怡，〈邱剛健的臺港冷戰經驗及其美學形構：以 1966-1974 年在香港的作品為討論核心〉，林淑芬、葉蔭聰、楊子樵主編，《前沿與流動：重探冷戰的亞際連結》（新竹：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2024 年 8 月），頁 249-281。

Chen, Jo-i. "Chiu Kang-Chien de Taigang Lengzhan Jingyan ji qi Meixue Xinggou: Yi 1966-1974 Nian zai Xianggang de Zuopin wei Taolun Hexin [Chiu Kang-Chien's Cold War Experience between Taiwan and Hong Kong and Its Aesthetic Formation: Focusing on His Works in Hong Kong, 1966-1974]." In *Qianyan yu Liudong: Chongtan Lengzhan de Yaji Lianjie* [Frontiers and Flows: Re-examining Inter-Asian Connec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 edited by Lin Shufen, Iam-chong Ip, and Yang Ziqiao, 249-281. Hsinchu: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Press, August 2024.

陳家樂、朱立，《無主之城：香港電影中的九七回歸與港人認同》（香港：天地圖書，2008 年 10 月）。

Chen, Jia-le, and Li Zhu. *Wuzhu zhi Cheng: Xianggang Dianying zhong de Jiuqi Huigui yu Gangren Rentong* [City without Ownership: The 1997 Handover and Hong Kong Identity in Hong Kong Cinema]. Hong Kong: Cosmos Books, October 2008.

焦雄屏，〈前言——九七震盪：宿命、懷舊、寓言〉，《香港電影風貌 1975-1986》（台北：時報文化，1988 年 8 月），初版二刷，頁 191-193。

Jiao, Xiong-ping. "Qianyan—Jiuqi Zhendang: Suming, Huaijiu, Yuyan [Preface—The 1997 Shock: Destiny, Nostalgia, and Allegory]." In *Xianggang Dianying Fengmao 1975–1986* [The Face of Hong Kong Cinema 1975–1986], 191–193. Taipei: Times Culture Publishing, August 1988.

黃秀玲著、單德興編，《華美：華美及離散華文文學論文集（下）》（台北：允晨文化，2001 年 2 月）。

Huang, Xiu-ling, De-xing, Shan, eds. *Huamei: Huamei ji Lisan Huawen Wenxue Lunwenji (Xia)* [Sinophone America: Essays on Chinese American and Diasporic Chinese Literature, Vol. 2]. Taipei: Yunchen Culture, February 2001.

黃愛玲、羅卡策畫，《電影創作歷程》（香港：香港藝術中心，1990 年）。

Huang, Ailing, and Law Kar, project planners. *Dianying Chuangzuo Licheng* [The Process of Film Creation]. Hong Kong: Hong Kong Arts Centre, 1990.

黃寤蘭主編，《當代港臺電影 1988~1992（上冊）》（台北：時報文化，1993 年）

Huang, Wu-lan. *Dangdai Gangtai Dianying 1988–1992 (Shangce)* [Contemporary Hong Kong and Taiwan Cinema 1988–1992, Vol. 1]. Taipei: Times Culture Publishing, 1993.

盧瑋鑾、熊志琴編，《雙程路：中西文化的體驗與思考 1963-2003》（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0 年 4 月）。

Lu, Wei-Luan, Zhi-Qin Xiong, eds. *Shuangcheng Lu: Zhongxi Wenhua de Tiyan yu Sikao 1963–2003* [A Two-way Journey: Experiences and Reflections o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1963–2003].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pril 2010.

羅卡、趙向陽、喬奕思、劉嶽編，《異色經典：邱剛健電影劇本選集》（香港：三聯書店，2018 年 4 月）。

Law Kar, Xiang-yang Zhao, Yi-si Qiao, and Qin Liu, eds. *Yise Jingdian: Chiu Kang-chien Dianying Juben Xuanji* [Transgressive Classics: Selected Film Scripts of Chiu Kang-chien]. Hong Kong: Sanlian Bookstore, April 2018.

羅卡、趙向陽策劃、劉嶽主編，《雄艷者的色想與美典：邱剛健編導電影劇本集》（香港：香港電影評論學會，2021年3月）。

Law Kar, Xiang-yang Zhao, project planners. Qin Liu, eds. *Xiongyanzhe de Sexiang yu Meidian: Chiu Kang-chien Biandao Dianying Jubenji* [Erotic Fantasies and Aesthetic of the Charismatic: Edited Film Scripts of Chiu Kang-chien as Director]. Hong Kong: Hong Kong Film Critics Society, March 2021.

羅卡主編，喬奕思、劉嶽助編，《美與狂：邱剛健的戲劇·詩·電影》（香港：三聯書店，2014年11月）。

Law Kar, ed. Yi-si Qiao, and Qin Liu, assistant eds. *Mei yu Kuang: Chiu Kang-chien de Xiju · Shi · Dianying* [Splendor and Defiance Drama, Poetry, and Film of Chiu Kang-chien]. Hong Kong: Sanlian Bookstore, November 2014.

羅卡編，《第十六屆香港國際電影節：電影中的海外華人形象》（香港：香港市政局，1992年）。

Law Kar, ed. *Di Shiliu Jie Xianggang Guoji Dianyingjie: Dianying Zhong de Haiwai Huaren Xingxiang* [16th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Representations of Overseas Chinese in Films]. Hong Kong: Hong Kong Municipal Council, 1992.

期刊

王智明，〈回歸想像／想像「回歸」：張婉婷電影裏的離散政治〉，《中外文學》35卷1期（2006年6月），頁59-86。

Wang, Zhi-ming. "Hui Gui Xiangxiang / Xiangxiang 'Hui Gui': Zhang Wanting Dianying li de Lisan Zhengzhi [Imaginations of Return: The Politics of Diaspora in Mabel Cheung's Films]."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 35, no. 1 (June 2006): 59 – 86.

徐勇、王冰冰，〈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圖繪 80 年代以來香港電影中的移民表述問題〉，《文化研究月報》111 期（2010 年 12 月），頁 1-14。

Xu, Yong, Bing-Bing Wang. "Yu Shuo Huan Xiu, Yu Shuo Huan Xiu: Tuhui 1980 Niandai Yilai Xianggang Dianying Zhong de Yimin Biaoshu Wenti [To Speak or Not to Speak: Mapping Migration Narratives in Hong Kong Cinema since the 1980s]." *Monthly Review of Cultural Studies*, no. 111 (December 2010): 1-14.

莊宜文，〈文革敘事，各自表述——《棋王》、《霸王別姬》跨地域改編電影之研究〉，《成大中文學報》26 期（2009 年 10 月），頁 119-123。

Zhuang, Yi-wen. "Wenge Xushi, Gezi Biaoshu: 'Qi Wang' / 'Ba Wang Bie Ji' Kua Dili Yu Gaibian Dianying zhi Yanjiu [The Narration of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Each Gives the Different Expression: The Study of Across-region Book-inspired films King of Chess and Farewell My Concubine]."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no. 26 (October 2009): 119-123.

麥樂文，〈展演中國性：邱剛健與臺港冷戰電影體制的轉化〉，《文化研究》36 期（2023 年 4 月），頁 313-364。

Mai, Lewen. "Zhanyan Zhongguoxing: Chiu Kang-chien yu Tai-Gang Lengzhan Dianying Tizhi de Zhuanhua [Performing Chineseness: Chiu Kang-chie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aiwan-Hong Kong Cold War Institution of Cinema]." *Cultural Studies*, no. 36 (April 2023): 313-364.

羅卡，〈《劇場》的裂變·在香港的反響共振·及其餘韻〉，《藝術觀點 ACT》73 期（2018 年 1 月），頁 18-23。

Law Kar. "'Juchang' de Liebian: Zai Xianggang de Fanxiang Gongzhen ji qi yu yun [Fission of 'Theatre': Resonance and Aftermath in Hong Kong]." *Art Critique of Taiwan: ACT*, no. 73 (January 2018): 18-23.

Historical Footprints and Diasporic Rootedness: Revisiting the “97 Narrative” through the Screenwriter Chiu Kang-chien

Jo- I Chen

Abstract

Taking the screenwriter as its analytical thread and the screenplay as its primary tex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wo newly unearthed draft scripts—*Dangerous Love* and *Far From Chinatown*—written in 1983 by Chiu Kang-chien (1940–2013) for *Full Moon in New York* (1989). It explores how Chiu, a screenwriter from Taiwan, articulated alternative configurations of the “1997 narrative” in Hong Kong cinema. Rather than approaching the 1997 narrative primarily through frameworks of identity anxiety or localism, this study conceptualizes “1997” as an intermediary through which Hong Kong cinema may be examined, and analyzes how the 1997 question reflects interwoven Hong Kong issues.

The article situates *Full Moon in New York* within the contexts of Hong Kong diasporic histories and diasporic cinema, analyzing the multiple points of reference through which diasporic subjectivities are constructed in transregional Chinese diasporic settings. Drawing on the screenplay drafts, it argues that Chiu’s life experiences infused the film’s creative process with layered identity concerns and diasporic narratives, enabling the film to engage not only with Hong Kong emigration but also with the political conditions of China, Hong Kong, and Taiwan at the time of its production. By examining the historical traces embedded in Chiu’s portrayal of transregional diasporic characters and modes of diasporic rootedness, this article contends that Chiu’s diasporic narratives expand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mensions of the 1997 narrative. By foregrounding the screenwriter as a critical entry point, the study further offers a broader analytical perspective beyond approaches that have traditionally prioritized directors or localist concerns.

Keywords: Chiu Kang-chien, *Full Moon in New York*, 97 Narrative, Chinese Diaspora

(Received: November 18, 2025; Accepted: January 24, 2026)

《興大人文學報》徵稿簡約

108.10.22 修訂
NO.64 起適用

- 一、本學報為半年刊，每年 3 月、9 月出刊；主題論文截稿日期分別為每年 4 月 30 日及 10 月 31 日；一般稿件，全年收稿，隨到隨審。歡迎有關文學、語言學(含語言教學)、史學、出土文獻、哲學、圖書資訊學等及相關領域之研究論文及書評。
- 二、來稿以未曾正式發表者為限，且勿一稿數投，與稿件內容相關之著作權問題（如圖、表、照片及長篇引文），請作者事先取得持有者同意，註明出處，如發生抄襲、侵犯他人著作權而引起糾紛情事，文責由作者自負，概與本刊無關，若有上述情形，日後本刊將不再接受其投稿。
- 三、來稿字數，不含參考書目，中文研究論文 10,000 字至 30,000 字；英文研究論文 4,000 字至 8,000 字；中文書評 5,000 字至 7,000 字；英文書評 1,500 字至 3,000 字為原則，特約稿不受字數限制，請依「《興大人文學報》撰稿格式」撰寫。
- 四、來稿請附中英文題目、摘要、關鍵詞及中英文姓名、服務單位與職稱。中文摘要以 400 字，英文摘要以 300 字為原則；中、英文關鍵詞不超過 5 個。
- 五、稿件及「作者投稿資料表」請寄 Word 及 PDF 兩種電子檔。
- 六、稿件審查採雙向匿名雙審制，刊登與否由編委會參考「審查意見表」及作者「修改說明表」、最新修正稿討論後決議，通過刊登者，本會提供「審查通過刊登證明」。另編委會將視實際情形安排刊登時程。
- 七、每期每人以刊登一篇為原則，凡經刊登者，每篇贈送作者當期學報兩本及論文電子檔，不另支稿酬。
- 八、稿件刊登後，版權歸本學報所有，非經本學報書面同意，不得翻印、翻譯、轉載，作者出版專著者不在此限。
- 九、本學報紙本與網路版同時發行。稿件通過審查准予刊登者，請附「投稿授權聲明暨個資提供同意書」，同意授權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興大人文學報編輯委員會」將其著作同步刊登於紙本、網站及有簽約收錄《興大人文學報》之資料庫，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透過網路公開傳輸、授權用戶下載、列印等行為。

臺中市 40227 南區興大路 145 號萬年樓

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 「《興大人文學報》編輯委員會」

洽詢電話：04-22840316；傳真：04-22856117

E-mail: clalib@dragon.nchu.edu.tw

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興大人文學報》

作者投稿資料表 Basic Information of Contributors

論文 Paper	篇名 Title	中文 Chinese: 英文 English:
	☐ 主題論文 Special Issue ☐ 一般論文 Articles	
文稿類別 Content Area	☐ 1.文學一 (中國文學、台灣文學、原住民文學) Chinese literature ☐ 2.文學二(外國文學、文學與文化理論) Foreign literature ☐ 3.歷史學 History ☐ 4.哲學 Philosophy ☐ 5.語言學 Linguistics ☐ 6.圖書資訊學 Library information ☐ 7.其他 Others	
投稿必備 Submission Requirements	☐ 論文電子檔 E-file ☐ 當頁註 Footnotes ☐ 參考書目 References 中 Chinese、英文 English: ☐ 篇目 Title ☐ 作者姓名 Name(含服務單位、 職稱 Affiliation & Position) ☐ 摘要 Abstract ☐ 關鍵詞 Keywords	
作者資料 Author Information	姓名(Name)	就學或服務單位、職稱 Affiliation & Position
	中文 Chinese: 英文 English:	中文 Chinese: 英文 English:
聯絡方式 Personal Contact Information	地址(Address): Email:	
	電話(Tel): (O) (H) 手機: (Cellular):	
※本人已熟閱「徵稿簡約」並依「撰稿格式」撰寫。 I have followed the Guidelines for contributors regulated in “Chung Hsing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作者簽名 Signature: _____		

※投稿相關規則請參考徵稿簡約及撰稿格式：<http://www.cla.nchu.edu.tw/download.php?cid=6>

※作者投稿前，請填寫本表格並將論文電子檔寄至：

40227 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興大鹿鳴文化資產中心。

To: 250 Kuokuang Road, Taichung, Taiwan, 40027, Republic of China

Deer Culture Heritage Center,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el: 886-4-22840316 Fax: 886-4-22856117 E-mail: clalib@dragon.nchu.edu.tw

※本表所提供內容僅供投稿《興大人文學報》作業使用，將謹守個資法，不做他用。

※編委會於收到稿件後，會以 E-mail 函覆，敬請留意信箱。



Chung Hsing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投稿授權聲明暨個資提供同意書

本人_____姓名茲將_____論文
名稱稿件乙篇投稿於 貴刊。本稿件內容未曾以任何文字形式發表或
出版，特此聲明。如有聲明不實，而致貴刊違反著作權法或引起版權糾
紛，本人願意負一切法律責任。

若經審查通過，茲同意授權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興大人文學報編
輯委員會」將本人著作同步刊登於文本、網站及有簽約收錄《興大人學
報》之資料庫業者，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透過網路公開傳輸、授
權用戶下載、列印等行為。此致

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

立同意書人：

親筆簽名蓋章

身份證字號：

連 絡 電 話：

地 址：

電 子 郵 件：

中 華 民 國 _____ 年 _____ 月 _____ 日

◎◎◎請列印、填寫，並親筆簽名、加蓋私章後擲寄

臺中市 40227 南區興大路 145 號 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 「興大人文學報編輯委員會」

電話：04-22840316；或傳真：04-22856117 本表下載：<http://www.cla.nchu.edu.tw/download.php?clID=6>

☆依據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關法令之規範及國立中興大學
「隱私權政策聲明」，本人同意將以上個人資料提供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
《興大人文學報》編輯委員會因業務需要等特定目的之蒐集、處理及
利用。

當事人簽名_____ (請親簽) _____ 年 _____ 月 _____ 日

《興大人文學報》撰稿格式

甲、中文稿

- 一、每篇論文應包括下列各項：(一)中、英文篇名 (二)中、英文作者名(含職稱、校系所單位) (三)中、英文摘要 (四)中、英文關鍵詞 (五)正文 (六)註釋(當頁註)(七)參考書目(分為傳統文獻、近代論著、期刊論文、網路資料。)中文書目在前、依筆劃排序；西文書目在後、依字母順序排序。
- 二、各章節序數，依一、(一)、1、(1)、a、(a).....等順序表示。
- 三、請用新式標點，書名號用《》，篇名號用〈〉，書名和篇名連用時，省略篇名號，如《史記·滑稽列傳》。
- 四、獨立引文，每行縮三格，並請改用標楷體。
- 五、註釋採當頁註，號碼請用阿拉伯數字標示，如 1、2.....置於標點符號後。
- 六、圖表：圖 1 晉•王羲之行書〈蘭亭集序〉，標示於圖片下方。 表 1 民國 106 年 3 月戶口統計速報表，標示於表格上方。
- 七、註釋之體例，請依下列格式：

(一) 引用專書

- 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1 年)，頁 130。
美國•孔恩(Thomas Kuhn)著，王道還編譯，《科學革命的結構》(臺北：遠流出版事業公司，1989 年增訂版)，頁 10。

(二) 引用論文

1. 期刊論文：
王叔岷，〈論校詩之難〉，《臺大中文學報》第 3 期 (1989 年 12 月)，頁 15。
2. 論文集論文：
黃景進，〈中國詩中的寫實精神〉，《中國詩歌研究》(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5 年 6 月)，頁 12。
3. 學位論文：
張以仁，《國語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58 年)，頁 100。

(三) 引用古籍

1. 古籍原刻本
宋•陶叔獻編，《西漢文類》(南宋高宗紹興十年刊本，約西元 11-40 年)，卷 37，頁 1 上。
2. 古籍影印本
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5 年影印清光緒 26 年王氏家刻本)，卷 84，頁 19。

(四) 引用報紙

丁邦新，〈國內漢學研究的方向和問題〉，《中央日報》，第 22 版，1988 年 4 月 2 日。

(五) 再次徵引：

再次徵引時可用簡便方式處裡，如：

註 1：王叔岷，〈論校詩之難〉，《臺大中文學報》第 3 期 (1989 年 12 月)，頁 1。

註 2：王叔岷，〈論校詩之難〉，頁 3。

(六) 徵引資料來自網頁者，需加註：作者，〈篇名〉日期（網址），

檢索日期，如：

李家同，〈我們是個很不錯的國家〉，2008 年 9 月 14 日聯合知識庫。
(<http://udndata.com/library>)，2009 年 2 月 14 日檢索。

乙、英文稿

- 一、每篇論文應包括下列各項：(1) title (2) author's name (3) abstract (4) keywords and phrases (5) main text (6) footnotes (7) Works Cited/ Bibliography / Reference.
- 二、請按最新版 MLA、APA 或 Chicago style 格式撰寫。
- 三、請一律用 footnotes，不用 endnotes。



興大人文學報

Chung Hsing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Submission Authorization Statement

Release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Agreement

I, Author's name would like to submit the manuscript article title to *Chung Hsing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The author declares that the manuscript has not been published. If false statement may cause the journal a violation of copyright law or copyright disputes, I am willing to bear all legal responsibilities.

If accepted for publication, I authoriz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Chung Hsing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to publish my article in the journal, on the website and in the database industry (which is contracted with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in the digital collection, public transmission over the network, and authorize users to download, print, etc.

To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ignature:

ID number (Passport number):

Telephone number:

Address:

E-mail:

Date: / /

©Please print, fill in and sign the statement before delivery.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of Chung Hsing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145 Xingda Rd., South Dist., Taichung City 40227, Taiwan, R.O.C.

TEL : 886-4-22840316 ; FAX : 886-4-22856117

According to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c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Privacy Policy of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I agree to provide my personal data as required by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of Chung Hsing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of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Signature : _____

date : / /

Chung Hsing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Guidelines for Contributors

1. The *Chung Hsing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is a biannual academic journal published in March and September. We welcome contributions of humanities research and reviews on related topics in literature, linguistics (including language teaching), history, unearthed literature, philosophy,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as well as other related fields in the humanities. The deadlines for Special Issue are April 30th, October 31st each year. Articles are received and reviewed throughout the year.
2. The manuscript must be previously unpublished work, and the author should not submit the same manuscript to more than one journal concurrently. The Journal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copyright violations. The author is responsible for securing written permission to reproduce all copyright materials, including graphs, photos, illustrations, and long citations. The author shall bear full responsibility for all legal consequences. In cases of violations, any future submissions will not be accepted.
3. For articles in Chinese: 10,000-30,000 Chinese characters; for articles in English: 4,000-8,000 words; reviews in Chinese: 5,000-7,000 Chinese characters; for reviews in English: 1,500-3,000 words. Word count of each article excludes references. Special contributions are exceptions to these guidelines. Please ensure the submitted manuscript conforms to the "Format Regulation".
4. Submissions should include the following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author's name, academic title, affiliation, manuscript title, abstract (around 400 characters in Chinese and 300 words in English), and keywords (not exceeding five).
5. Submit your article in Microsoft Word format. If there are self-created Chinese characters or untransferable illustrations in your article, mail us a PDF copy.
6. Submissions are peer-reviewed in an anonymous two-stage process. The editorial board and the length of time needed to complete the review process will determine whether the submission is chosen for publication and, which volume it will appear in, if selected, an "Article Acceptance Certificate" will be sent to the author.
7. Contributors will receive two copies of the Journal and a PDF file. No monetary compensation will be offered.
8. Authors of accepted articles must agree to publication by the journal in paper and electronic formats. Published articles may not be reprinted, translated, or excerpted without express written consent of this journal, except in the form of the author's monographs.
9. After manuscripts are accepted for publication, authors should provide a signed agreement which allows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of the Journal the rights to publish their works simultaneously in print, on the internet, and in databases (containing Chung Hsing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the rights to create digital archives, to reproduce, to public transmit via the internet, and to authorize the users to download and print.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of Chung Hsing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145 Xingda Rd., South Dist., Taichung City 40227, Taiwan, R.O.C.
Tel : 886-4-22840316; Fax : 886-4-22856117
E-mail: clalib@dragon.nchu.edu.tw

Chung Hsing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Vol. 76

March 2026

Contents

Special Issue:

- Jason Yat Long WONG** The (Im)possibility of Rebuilding Linkages: Boundary-crossing Imagination of Hon Lai-chu's *Body-sewing* and *The Border of Centrifugation* 1
- Yu, Ming-Sheung** The Historical Memory and Trauma Representation in Post-Social Movement Narratives of Taiwan and Hong Kong Literature: A Case Study of *The Melancholy of the Tree* and *The Becoming* 24
- Chen Mu Ching** Inside and Outside the Iron Bars: Heterotopia in *Suffering and Resistance: Prison Letters of Chan Kin-man* 54
- Jo- I Chen** Historical Footprints and Diasporic Rootedness: Revisiting the "97 Narrative" through the Screenwriter Chiu Kang-chien 87

Appendices

Guidelines for contributors

Style sheet

Chung Hsing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Vol. 76

Publisher:	Zheng-Xian Wu	
Editor-in-Chief:	Kuo-wei Chen	
Editorial Board:	Yu-ting Wang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Kuo-li Pi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Hui-yin Chiu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Jian-guang Lin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Wen-huei Chou	(Tunghai University)
	Shu-chen Lin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Chia-hsing Ho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Kai-yu, Ta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Nai-nu Yang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Special Issue Editor:	Sam Lok-Man Mak	
Executive Editors:	Jun-yuan Hong	I-ling Cheng
	Kai-lin Kang	
Chinese Title Calligrapher:	Ching-chung Chen	
Assistant Editors:	Chia-hsin Luo	Yu-Ling Wu
	Yi-fang Chen	Hui-zhen Zhan
Assiatants:	Jing-chang Chen	Wei-xiang Zhang
	Yun-syuan Lin	

Chung Hsing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Formerly *Journal of t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Vol. 1~31)

Volume 76

Special Issue :
Re-articulating Hong Ko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chung, Taiwan
March 2026

Chung Hsing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Vol. 76

Publisher: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Address: 145 Xingda Rd., South Dist., Taichung City 40227, Taiwan, R.O.C.

Telephone: 886-4-22840316

Fax: 886-4-22856117

E-mail: clalib@dragon.nchu.edu.tw

Website: <http://www.cla.nchu.edu.tw/index.asp?url=41&cno=12>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GPN : 2009105233

ISSN : 1727 – 8562

興大人文學報

Chung Hsing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第七十六期
Volume 76

專輯論文：重塑香港的可能連結專輯

- 重塑連結的（不）可能：論韓麗珠《縫身》和《離心帶》的
越界想像……………黃逸朗
- 論臺港文學中後社運書寫的歷史記憶與創傷再現：
以《樹的憂鬱》、《變成的人》為例……………余銘湘
- 鐵窗內外——論《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的異質空間……………陳木青
- 歷史與根著：以編劇家邱剛健為線索重探香港電影「九七敘事」……………陳若怡



GPN: 2009105233